李鸿章传

纵横捭阖，精于自保，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晚清第一权臣的功与过

梁启超◎著　李安安◎编译



最权威通俗、客观公正的个性点评本

中国华侨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李鸿章传

纵横捭阖，精于自保，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晚清第一权臣的功与过

梁启超◎著　李安安◎编译

最权威通俗、客观公正的个性点评本



目录

上　译文部分
序例
第一章　多面李鸿章——说在前面的话
第二章　时代的巨子——放在时代中看李鸿章
第三章　乱世唤英雄——发达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四章　一飞冲霄汉——军事家李鸿章
第五章　洋务兴邦国——洋务运动时的李鸿章
第六章　东亚逢对手——甲午战争时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东方俾斯麦——外交家李鸿章
第八章　闲来自有忙——赋闲时的李鸿章
第九章　沧桑垂暮年——晚年的李鸿章
第十章　功罪任评说——留在后面的话
下　原文部分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传
晚清第一权臣的功与过

梁启超◎著

李安安◎编译

最权威通俗、客观公正的个性点评本

重读晚清政客李鸿章，看他如何突破政治、经济、外交的困局。

纵横捭阖，精于自保。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传：晚清第一权臣的功与过／梁启超著；李安安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113-3979-9

Ⅰ．①李…　Ⅱ．①梁…②李…　Ⅲ．①李鸿章（1823～1901）－传记　Ⅳ．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9958号

●李鸿章传：晚清第一权臣的功与过

著　　者／梁启超

编　　译／李安安

责任编辑／文　慧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5.5

字　　数／320千

印　　刷／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979-9

定　　价／3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

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传真：（010）64439708

发行部：（010）64443051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上　译文部分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李鸿章

序例

一、本书仿照西方的传记文体来记述李鸿章，并加以评论，使读者对他有所了解。

二、中国旧式文体记述一个人的事迹，用传，或用年谱，或用事略（叙述死者世系、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或亲友撰写，留作墓志铭或为史官作传提供依据），多记述生平事迹，不做褒贬评论，即使有也是附于文后。实际上，这种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乃司马迁首创，《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都是这样。后世缺乏识见，又不敢妄学。我虽不才，却偷偷把司马迁的手法“拿来”一用。

三、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和李鸿章有关，所以为他作传，不能不以做近代史的态度和笔法来写。我对时局稍有些看法，故不敢隐讳，目的给后人看。只可惜时间太短，身边又没一本书来参考，因此书中错误难免。望日后有机会修补。

四、关于江南之战，记述了不少湘军事迹，似乎离题了，但淮军湘军关系复杂，不如此写不能充分展现当时形势，望读者理解。

五、《中东和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全文转载。因李鸿章事迹的前因后果，与此类公文关系密切，因此冒着文章拖沓之嫌，全部收录。

六、在中国。李鸿章背负的骂名很多。我与他，政治上是公敌，生活上私交也泛泛，所以不会有意为他辩护。书中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也许与时下论调不一致，完全是本着史家之公平心来写的，绝无其他原因。否则就有失公允。

英国首相格林威尔曾不满地对他的画师说：“请你画出我的真实面目来！”我写此书，自信不会遭到这样的不满。李鸿章泉下有知，也当含笑说：“这个人是我的知音啊！”

背景链接

本书写于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又对中国新史学有开创之功，在史学理论上多有建树。他主张作史当以公平之心行之，要“画我须像我”。晚年他还说：“史家

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对自己创作《李鸿章传》，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他要求自己公允写传，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

第一章　多面李鸿章——说在前面的话

自古英雄多毁誉

天下啥人既不招誉，也不招毁，活得最安全？答案是：平庸人。一个人如果招人厌恶，他可能是非凡奸雄呢！当然，天下多是庸人，说这话的也往往是庸人。可见，以平常人的眼光评价非常人，怎么可信呢？

享誉天下的，未必真君子；招人诽谤的，未必不伟人。所谓盖棺论定，其实就是死后也有难下定论。人们往往自以为是，所以，有人被骂，有人被赞。



李鸿章特写

那么，后世学者史家如何甄别评定呢？比如有的人，他今天得到的诋毁，与当初受到的赞扬相当；他今天受到的赞扬，与当初的诋毁相当。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的回答：他们是非同寻常之人。暂不论其是非常奸雄还是非常豪杰，单看他所处的时代、位置以及其作为，就不是平庸人的见识能一语

道出雌黄的。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可看我的这本《李鸿章传》。

我佩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其见识不足，但又同情他的遭遇。李鸿章曾游历欧洲，曾问德国宰相俾斯麦："臣子想为国效力，但满朝与自己不合，百般阻挠自己，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对方回答："首先要得到皇上的支持，他支持才给你特别的权力，才能执行，这样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李鸿章又问："如果他的君主无论什么人的话都听呢？他身边的近臣和侍卫，常狐假虎威把持朝政大局，又怎么办呢？"对方回答："只要臣子忠心事君，操劳国事，君主也会理解的，否则无异于妇人了。"

李鸿章无语。由此可见其心中的郁闷块垒，不是旁人能理解的。所以，我对他是既有批评又有同情。

读后感悟

1．自古英雄集毁誉于一身。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和行为特征，非常人所有，也非常人所能理解。享誉天下，未必真君子；招毁天下，未必不伟人。盖棺未可论定。

2．梁启超开篇即以史学之眼光，以如椽之笔，点出他为李鸿章作传的视角和观点：评价李鸿章这样的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时代，着眼于他的位置和所作所为，而不是非此即彼、想当然地信口雌黄。

3．作者开宗明义，点明自己对李鸿章的评价：既敬服又同情，服其才，怜其遇。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就此意义说，梁启超可为李鸿章一知音。

4．在看这本《李鸿章传》时，在认同梁氏写作视角的基础上，注意独立思考，并联系历史和时代，才能真正有所获。

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李鸿章闻名世界，外国人都知道李鸿章，却不知有大清国。可见李鸿章的名气之大。虽然这不能说明全部，但李鸿章确实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第一流人物。读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李鸿章；读李鸿章，必须参见中国近代史。所以我这本书，也可为《同光以来大事记》了。

大凡一国之气象，与它的历史有因应关系。要评价李鸿章，就需要结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大势、中国各民族势力的此消彼长的发展方向，以及当代中外关系来考虑，如此才能了解李鸿章所处的历史地位。孟子说："知人论事"，世事纷繁，自难评论，而人又岂是容易了解的？

一些时评家，常以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绩，而

以他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其罪过。我以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俾斯麦曾对李鸿章说，他并不欣赏一国中的内乱相争，而把抵御外侮当成功绩。李鸿章平定太平军和捻军，是兄弟相残，同室操戈，兄长得胜罢了，实算不上伟绩。这些年来因受外侮，国人积愤已久，更恨那些不平等协议，于是迁怒李鸿章。李鸿章固然有一定责任，但如果不是他，是别人，就能表现得更好吗？所以，批评李鸿章者，不过是旁观者想当然的臆测，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已，而我不以为然。



李鸿章与俾斯麦

现在，李鸿章去世了。外媒评价他为“中国第一人”，有人甚至断言李鸿章的死，势必带来中国政局大变动。李鸿章是不是“中国第一人”我不敢说，但我敢说，目前清朝五十岁以上、三品以上的官员，无人可与之相匹；李鸿章的死，关涉到中国政局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中国失去一个李鸿章，如虎失其伥，是一个巨大损失，而且由此可能导致情势危急、前途堪忧、麻烦事更多。我不希望真如外国人所评价的那样，否则，我偌大一个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全靠他来支撑吗？如果这样，中国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西方有哲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李鸿章当然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平常英雄。遍观天下，各时代有其时势，遍观二

十四史，李鸿章这样的英雄为数众多。而创造时势的英雄，千载难逢。这就是中国历史古老但因循守旧，缺少创新，落后世界的主要原因。我写这本书时，这种感慨一直在内心涌动……

读后感悟

1．国外评价李鸿章为“中国第一人”，国内则对他褒贬不一，生前身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争议人物。唯其非凡，才有争议；唯其争议，才更具吸引力。

2．对某些史家对李鸿章非功即罪，或者此功彼罪的评价，梁启超予以否定，认为不过是书生之见。在他眼里，李鸿章也许不是“中国第一人”，也许不足以动全局，但确是中国最关键、关系巨大的人。

3．作为史家，在为李鸿章立传的同时，梁启超想的最多的是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希望能为老大而病患之中国找到一剂良药，故着眼既在李鸿章，又在中国，体现出一个伟大史学家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体现出一个政治失意者的深沉思考。传记中的史家和政论家的笔法，使得他的《李鸿章传》具有独特的魅力，所谓大手笔也。

4．如梁氏所说，李鸿章也许不是一个创造时势的英雄，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李鸿章时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只有审时度势，潜心修炼，抓住时代的机遇，才能发挥自己的能量，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

愿为李鸿章一知己

史家在评价汉朝的霍光时，常感叹其不学无术。我认为对李鸿章也可冠以此四字。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不通晓世界大势，不懂国与民之间相互依存的道理，不懂民生之重要性，不懂得扩充国民实力，而是苟安于现状，仅凭自己的理解，捡拾点西方的皮毛来学习，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糊纸匠”工作，这怎么能真正强大国家呢？他不自知，还要以自己的雕虫小技和外国的大政治家抗衡，怎么能抵挡得了呢？所以，他让出国家大的利益，争取些蝇头小利。

可，这是李鸿章的错吗？是他不尽力吗？不是他的错，只是他认识没到位；不是他不鞠躬尽瘁，而是他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这地步。

孟子说：“在尊长面前不顾礼节地大吃猛喝，却要求自己不用牙齿啃腊肉，这叫失大体而存小仪，顾此失彼，不知轻重。”很对呀！我认为李鸿章晚年所做事，桩桩失败，皆因为此。

所以，对于李鸿章，我们又何必追责呢？因为他只是一个顺应时势的英雄，而非创造时势的英雄。明白了此，就会理解他、原谅他。



李鸿章坐像

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会受这个社会思想、习俗以及观念的影响，甚至会受其束缚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也难脱其臼。毕竟，李鸿章生在中国而非欧洲，毕竟他生在几十年前而非——当时，并没有一个长辈或是同辈的英雄，对他引导或——当时中国能孕育出的英雄人物，充其量也就是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了。所以，我们不能把李鸿章的失败归咎于他一人，更何况他心中也抑郁不平。

所以我敬李鸿章的才干，惜其见识不足，哀其遭遇。此后，还会产生这样的人吗？

天下时势已大变，未来的英雄，自然与以往不同。希望这个英雄不要因我宽容李鸿章而不求长进，宽恕自己。

读后感悟

1．李鸿章是人杰，但不是完人，他同样有缺点，所以对他不能求全责备。

2．李鸿章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他背负着一个时代的使命而来，所以评价他要看他承前启后的历史，看他同时代的人。

3．在梁氏看来，李鸿章败在对民主民生的见识不足，看不到世界政治发展的

大势，因循于腐朽思想习俗，工作不分轻重，不能开拓一时局面，但同时又为其开脱：要做到此，非李鸿章一人之力可为。

4．在时代的洪流下，个人往往只能随波逐流，顺逆有道、成功如李鸿章者，已难得矣。他虽见识不足，但志向已够深远，工作已够卓著，功名荣耀已够高，而苦衷又怎么会少？功在盛年，罪在晚年，时耶？命耶？也许这正是李鸿章的悲哀所在。

5．梁氏在为李鸿章“开脱”的同时，不忘警醒后来之“李鸿章”们——不要因此懈怠，宽恕自己，只需做自己，不要做“李鸿章第二”。预见深远，殷殷诚诚，用心良苦，真大家风范，令人动容。

第二章　时代的巨子——放在时代中看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的

要评价李鸿章，对其所属国家和时代，要有深刻了解，否则，难以真正了解李鸿章。

李鸿章所属国家，是一个数千年来君主专制，后专制政体发展到成熟，达到极限的国家。

李鸿章所属的时代，是一个满洲人入主中原，民族杂居，统治已久，汉族权利欲日渐恢复的时代。

时评家们总说李鸿章是个权臣，不知他们标准是什么。事实上，李鸿章怎么能和两汉的霍光、曹操相比呢？怎么能和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呢？怎么能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呢？李鸿章的权利比他们要小得多。

中国古代的权臣，都是专权独断、挟持君主甚至可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却是忠诚不二的大臣，所以他不算权臣。

近代各国的权臣，他们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务，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不顾及政敌的意见，而李鸿章却因循守旧，不敢有大的举动，所以他不算权臣。

李鸿章就是李鸿章，他所处的时代，与中国古代和近代外国的权臣有根本的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妨放大眼光，纵览古今，作一分析。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政体也日益成熟，权臣们所谓的权力，这时也被统治者剥夺尽了。春秋战国时，鲁国的“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那时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们都是一层层选拔上来的。如同大树，枝桠太强大，必然会伤及树干。

两汉起，天下统一，中央集权制生成，但根基还不稳，致使外戚祸乱屡生。如霍光、邓骘、窦宪、梁冀等人相继而起，真是炙手可热，王莽趁机篡夺江山，此时贵族政治的余波还在。但如果家世门第上不去，那当权臣是根本没希望的。《后汉书》中说张奂、皇甫规等人，虽功劳盖世，权势很大，几乎可决定天子性命，但面对天子时，还是会恭敬跪拜，这就是“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的作用啊——他们感觉天子就是天

子，理应跪拜。此时贵族掌权之风衰落，如果不是贵族出身，是不敢有不轨之心的。这是第一类权臣。

董卓之后，各路豪杰纷起，曹操窃取高位，靠武功成为权臣，是从曹操开始的。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走这条道路。这是第二类权臣。

而秦朝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出身平民，凭才学得到赏识，肩负重任，实行抱负，万民俯首，一时大权在握，无人望其项背，其权势几乎与近代君主立宪国家中的首相可比了。这是第三类权臣。

另有一类权臣，层次在下，他们向主上巧言献媚，窃取大权，好事不做，却带给百姓苦难，如秦朝的赵高，汉代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都是卑鄙浅薄如强盗一样的人物，这种人不值得一提的。这是第四类权臣。

以上四类，基本把中国几千年来出现的权臣都概括进去了。

总之，古代权臣多，近代权臣少，为什么呢？与专制政体的日益发达有关。中国专制政体的发达，原因有二：一是儒家思想的教育渗透，二是雄才大略君主的个人能力。

当初，孔子目睹周朝末期贵族统治的弊端，就想着由一个贤明君主统治天下，为此他著书立说，建立起儒家思想教化民心，并一再强调其作用。西汉的叔孙通、公孙弘等人，认同孔子的思想，并加以完善并利用，从而树起君主之权威。汉武帝标榜六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教化并统治天下，从而凸显君臣的尊卑关系，人们才认识到权臣政治的弊端。



孔子

之后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就成为教化国民的主导思想，宋代学者又进一步补充、弘扬，使之更加稳固，凡官员、名流，及洁身自好的文人学子，无不以此为指导，检点言行。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人们都自觉地消除野，规范自己的言行。如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等等，都是受此思想深刻影响的人。

另外，历代君主不断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也使儒家思想日益得到完善。这样，贵族掌权的现象，到汉末几近消失。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优待功臣，却削夺其兵权；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则是设嫌治罪，甚至满门抄斩，以绝后患。虽然做法不同，但夺其兵权、巩固其君主地位却是相同的。

到近代，郡县制度实行，土地世袭制消失，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牵制，统治大权却掌握在皇帝手里。即使你当朝宰相十年，封疆千里，只要皇帝一纸诏书，你就可能被削夺官职，被擒拿关押，与平民百姓无异。身居要职的人，几乎无人可幸免。所以，他们只好追求持盈保泰，以保全身家性命。

难道说他们的性情修养比古人高吗？不是。实在是势态所逼啊！所以，志存高远又心性骄傲的人，不得不有所顾忌，谨慎言行，不露锋芒。这样，君主放心，天下就大定了。那些洁身自爱的官员，也常有如

履薄冰之感，并警示自己，不想身居要职，以避嫌疑；即使遇有国家大事，虽明白自己应坚持原则有所担当，但也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



圣旨

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于是，满朝文武，都明哲保身。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日渐形成的。

读后感悟

1．李鸿章生在中国，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几千年来的思想习俗个人无法逃避。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鸿章志向即使再大，也有难申时，其胸中有块垒也是必然的。所以说，李鸿章是中国的。

2．李鸿章不算是权臣，因为中国已经过了权臣时代，他能做到有所成就，持盈保泰已属不易。这与他个人能力有关，也与他深谙儒家思想修养和官场智慧有关。

3．梁氏对儒家思想和专制政体的剖析十分深刻，它有利有弊，发展到最后，利在统治者而非个人。与外国的民主政治相比，这种体制的弊端一览无余。但当时，骄傲的统治阶级并不自觉。

4．"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封建士大夫的一种理想人生观。其实，它与明哲保身一样，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并非符合人性的智慧。

李鸿章是清朝的

本朝（清朝）源于东北一个小部落，后来日益强大，最后入主中原。一个数十万人的少数民族，统治数亿人的汉族，这与以往大不相同，汉人开始当然不顺从。满族人为统治汉人，在云南、福建和广东设三藩，任降将为封疆大吏，但结果造成尾大难掉，造反事件不断，费老

大劲才平定，最后统一全国。

鉴于这此教训，两百年来，成为权臣的只有满人，如鳌拜、和珅、肃顺、端华等人。武力上，除定鼎中原开国那一次战争，历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都用的是八旗兵，用亲王贝勒或满人。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只处于备用的从属位置，对于国家政事，汉人更没有过问的权力。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地位尊贵，但不过是统治者利用的棋子罢了。其余百官，更是微不足道。咸丰朝以前，重要的文武官员职位，从没让汉人担任。



清朝八旗兵

洪秀全、杨秀清举兵发难时，赛尚阿、琦善作为钦差大臣，率领八旗兵去征讨，结果战机延误，致使太平军得以发展壮大。严酷的现实告诉清朝统治者：自己的八旗的战斗力下降，已不可用。这时，汉人开始被委以重任。

因此，金田战役，可以说是显示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关键战役。但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起兵于湖南湖北，已经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时，朝廷还是任用满人为钦差大臣。当时朝廷已经不得不用汉人，但并不信任。为此，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不得不亲近满人，军中每有汇报事宜，必要请满人领衔；遇有军功，必要推满人为头功；上报奏折，等满人同意了才发，其谨慎恭敬如此，内心的苦衷可想而知。

我看《曾文正集》得知，自从他攻破金陵，平定太平天国，建立大功后，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以他的学识修养，尚且如此，更何况李鸿章呢？

所以我说：李鸿章所处的地位，是远远比不上以前的霍光、张居正的，更无法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等国的权臣们相比。这是形势造成的。

说到李鸿章的地位，必须了解中国的官僚体制。李鸿章历任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表面看位极人臣——因为自雍正朝以来，实权都被军机大臣所掌握，国家政策的得失，军机大臣要负第一责任。虽然李鸿章作为总督、巡抚，有一定实权，非同于一般总督巡抚，但如果把近四十年来的政治失误，都归罪于他一人，当然是不对的。

现列举清朝“中兴”以来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

第一	文 祥、沈桂芬时代	同治初年
第二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	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一年
第四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四年
第五	刚 毅、荣禄时代	光绪二十四年至今

案：从上表中，可看出满汉权力之消长。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之前，汉人中没有实权人物。到同治年间，文祥和沈桂芬两人，始开汉人掌权之端倪。其后，又出现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徐用仪随其后。

总之，同治朝以后，汉人开始掌权，不只封疆大吏汉人已占到半数以上，就是内阁中枢，汉人的实力也迅速增强。到1898年8月以后，形势又变。这个话题，因说来话长，又与本书没直接关系，故不作详谈。

何必归罪李鸿章

由此可见，几十年来与李鸿章共事的都是什么人。对于他们的贤愚

与人品，我们不便细说，但总的来说，他们都不是与李鸿章志同道合的人。那么，李鸿章请教俾斯麦的话，也是真实可信的呀！军机大臣中确实也有只会奉旨办事，不干实事的人。所以我同情李鸿章。

我这么说，不是有意偏袒李鸿章，而是我理解他的难处——就算他握有实权，努力执行，但在这样的体制和环境中，我认为他的成就也只能达到现在的程度。

如果李鸿章为真豪杰，那他为什么不凭借自己的地位，巩固实力、广植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呢？格兰斯顿、俾斯麦等，他们的工作难道就没有阻力吗？李鸿章因为有阻力就不作为吗？



踌躇满志李鸿章

尽管李鸿章有罪不当辞的地方，但如果归罪于他一人，当然是不对的。别的内阁大臣们呢？我中国4亿人民呢？也都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吗？

正因为看到了李鸿章的这种孤立处境，所以我为他辩护。至于他的功罪和人品，放到后面讨论。

读后感悟

1．与同时代的同僚相比，李鸿章的才智显然高出一筹，也因此，他显得鹤立鸡群，更显得孤独郁闷。这也是所有英雄人物的共同点。

2．与外国当权人物相比，李鸿章缺少治国魄力，不敢有出格行为，这是他的不足，也是他的无奈。当然，也许是他的“愚忠”。

3．相对于那些只听命，不作为的内阁大臣们，李鸿章显得更为出格出风头，李鸿章能在太后和皇上的支持下，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并勇挑重担，从不推卸责任，也实属难得了。李鸿章尽力了。因此，不能把政治失误归罪于他，他应得到起码的同情。

4．但凡一个人，要想真正做点事，就不可能获得各方面的赞扬和支持，只要有支持的力量，就该竭尽全力，做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

第三章　乱世唤英雄——发达前的国内外形势

世界风云，西风东渐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亲李进文，母亲沈氏，生有4个儿子，长子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三子李鹤章、四子李昭庆都投身军旅，立有战功；李鸿章排行老二，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

李鸿章从小在一家普通私塾读书，25岁中进士。道光二十七年，李鸿章入翰林院。



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出生时，在西方，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被流放到一个孤岛死去。西欧风波平息，局势稳定，各国不再打仗，而是休养生息，但却把野心和目标投向东方。

于是，几千年来一统至今的中国，开始进入多事之秋：伊犁划界条约，在北方俄国挑衅；鸦片战争，在南方，英国人肇事。

这时的世界，也是多事之秋、各国正需人才的时候。此时，瓦特新发明了蒸汽机，大型轮船、军舰，冲风破浪，使万里之遥大大缩短，天涯之隔如在近邻。加之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使东西间的距离骤然缩短。

于是，西风开始东渐，而且，这股力量奔腾澎湃，如狂飙，如怒潮，击石拍岸，天地日月顿时因之变色，对东方的老大中国来说，这力量来得猝不及防，而且势不可当。

可见，李鸿章出生的时代，中国开始与世界发生关系，也开始了中国与世界各国难舍难分交涉的时代。

读后感悟

1．李鸿章出生的时代，正是世界风云发生变化，科技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这股改革之风势必会刮向中国，而当时中国还在天朝帝国的自我陶醉的闭关锁国中。

2．所谓乱世出英雄，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3．从历史的角度看，李鸿章一出生，也许就注定了要背负他的某种历史使命，这个使命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乱云迭起，时代唤英雄

再看中国国内形势。自乾隆朝以来，大清国开始盛极而衰，民生凋敝，官场腐败，很多麻烦事接踵而至。

乾隆六十年，湖南、贵州红苗叛乱；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势力蔓延5个省区，前后持续9年，到嘉庆九年，耗资2亿两白银，才平定之。同时，海寇蔡牵等人，又以越南为根据地，侵扰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到嘉庆十五年，才被平定。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人又起来作乱，滋扰山东、河北一带。在陕西，还传来万行五变乱的警报。



咸丰帝

道光年间，回疆张格尔叛乱，边境安危受到惊扰，官军前去讨伐，用了整整7年时间，才平定叛乱。嘉庆、道光年间，国力开始衰落，民心浮躁，满朝上下又多醉生梦死之人，一片歌舞升平。国家都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还视若无睹，有识之士为此担忧。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牺牲的历史。所谓的人才，也多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今大事，只有动乱时才出英雄，和平时则没有。一直是这种情况。

道光、咸丰末年，所谓的英雄们，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以待大显身手的时机。中国自创国以来，就没有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先例，百姓一直是被奴役的对象。当受到暴政欺压，求告无门时，反抗方法只有两个：小则罢市，大则造反，这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所以改朝换代，也被看作平常事，所谓成王败寇。

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无璋，都出身于平民，今天是盗贼，明天就成为君主，强者为王。因为有此风气，历代都有平民揭竿起义，可说是不绝如缕。其间百数十年是太平时期的，也不过是因为经历了上次祸乱，人心思平，厌恶战争，加之人口锐减，谋生不再艰难；或者君主统治有方，以小恩惠笼络了民心，得些威望，以补不足，暂时得到安稳。

而实际上，动乱或者说隐患，从来没有杜绝——一旦有可乘之机，就有可能揭竿而起。所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在是用血腥写成，用肝脑涂抹而成的。

清朝起于关外，入主中原，统治汉人。汉人向来自尊自大，蔑视他族，当然不乐意接受统治。所以明朝灭亡后，就有人组织了秘密会党，企图造反光复大明江山，200多年不曾灭绝，甚至蔓延到18个省。这些人屡屡煽动造反，但因清朝的英明君主相继出现，使动乱没有发生。

但百姓被统治压迫的时间一长，积郁一久，其造反之心就产生一触即发之势。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官场腐败，劣迹种种；政府平庸，弊政繁琐，外国入侵又纷至沓来。

面对此境况，爱国人士们一心想扫除阴霾，破旧立新；狡黠凶恶之徒想趁机夺权，这也是形势所致，时代唤英雄。

于是，一代英雄洪秀全、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便因时因事，相继出现了。

读后感悟

1．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只能产生两大阶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要么统治，要么被统治。政治清明，才可能有太平；政治昏暗，则乱民造反生。成王败寇，就是道理。历来如此。

2．在梁氏眼里，由于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百姓从没有参与政治的传统，因此就不可能有西方社会的政治民主。有明君，则百姓福，否则，奸雄出，战乱生，百姓难。

3．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由流血和牺牲换来的，乱世时才出英雄。

4．李鸿章出生的时代，清朝正由盛转衰：政治腐败，民心思乱。所谓乱世出英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个奸雄或英雄开始浮出水面。就此意义讲，李鸿章的出现，也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

初识曾国藩，早年多砥砺

最初，李鸿章作为优贡生【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以人才贡献给皇帝的意思。贡生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意谓优贡生。】客居北京。由于曾国藩很赏识他的文章，于是，李鸿章就成为曾国藩的学生。

就这样，李鸿章得以与曾国藩朝夕相处，向他学习儒家义理和经世

致用之学说。应该说，李鸿章的毕生学养，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

此后，李鸿章进入翰林院。不到三年，金田之乱爆发。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仅两年多时间，其势力就蔓延半个中国，东南部的重要城市相继陷落。真是土崩瓦解，形势危急，令清朝统治者慌乱。

此时，李鸿章正在安徽老家，作为幕僚，在安徽巡抚福济和吕贤基处参赞军事。当时，庐州已陷落，附近地区也被太平军占领，一时形成两面夹攻的犄角之势。

福济想收复庐州，但苦于不能实现。李鸿章就建议先攻下含山、巢县，断绝太平军的后援，然后攻取庐州。福济同意，并授权李鸿章，让他指挥军队。李鸿章一举就攻克含山、巢县。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名声就此传出。这年是咸丰四年十二月。

洪秀全攻陷武昌时，曾国藩正在老家丁忧守孝。皇上一道圣旨，让他组织团练，抗击太平军，曾国藩义不容辞，慷慨答应。曾国藩决心操练出一支劲旅精兵，力挽狂澜，以解国家之难，并以此为己任。湘军就此成立。

湘军，是淮军的母体。此时的八旗绿营（清朝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廷在统一全国时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单位组建，因以绿旗为标志，故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旧兵，都是些懒惰怯懦的废物，将领们也都平庸无能，不尽忠职守。曾国藩深入调查，感觉到必须消除军中的腐败作风，重新组合，另换一套班子人马，否则不能奏效。为此，他到处招募人才，统筹全局，百折不挠，改革士气。清朝兵力的恢复，从此开始了。



太平天国玉玺

洪秀全占领南京后，开始骄傲懒惰，加之内讧，太平天国迅速衰落。如果当时官兵中有得力人才，带兵来进攻，太平天国瞬间就可剿平。但无奈官军的骄横腐败，比太平军还厉害。

咸丰六年（1856年），向荣指挥的江南大营溃败；咸丰十年（1860年），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指挥的江南大营再次溃败，江苏、浙江相继沦陷，太平军气势更加高涨。

咸丰七年（1857年）丁未以来，清朝与英国开战，张国梁、和春阵亡，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

真是天时、人事皆不利，厄运交加。至此，大清传了十代的江山，虽没灭绝，但已是岌岌可危了。

曾国藩虽统兵十年，但管辖的也仅是长江上游一带，这固然与曾国藩深谋远虑、谨慎行事、不急功近利、节节进攻的战略有关，但也与朝廷对他不够信任，使他权力不够，不能充分发挥有关。所以，当湘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区时，因地方官员的牵制而贻误很多战机。这种情况屡有发生，致使他很长时间不能建立功业。

当金陵大营第二次溃败时，朝廷才认识到不重用曾国藩不行了。于

是，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朝廷任命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很快，又给他实权，并授予他钦差大臣，监督办理江南军务。

此时，兵权、财权才统一于曾国藩一身，他才得以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共商苏州、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战事，大局才开始有所转机。

李鸿章做福济的幕僚时，福济推荐他为道员，却遭到郑魁士的反对，于是他没得到此职位。当时，关于他的谣言纷纷，毁谤四起，使他不能在安徽老家立足。

后来，李鸿章虽然被授予了个福建延邵建的道员遗缺，但徒有虚名，没实际职守。

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军转战到建昌，李鸿章便前去拜访，于是留在曾国藩幕府做事。

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藩调遣抚州的湘军旧部四营，并新招募组建了五营，任命他弟弟曾国荃为统帅，到江西景德镇助剿，让李鸿章作为参谋一同前往。

肃清江西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挥部待了两年多。

咸丰十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商讨建立淮扬水师。曾国藩奏请任命李鸿章为江北司道，没获得批准；又荐举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奏折到达北京，却赶上咸丰帝到承德避难，事情就被搁置下来。

此时李鸿章已经38岁了，却怀才不遇，抑郁焦虑，只有拍腿空叹岁月蹉跎，仕途坎坷了。生命已过半，心想命该如此，不敢再谈功名了。

唉！这是上天在有意磨砺李鸿章吗？故意使他志气不得申，颠沛流离十余年，以磨砺其气量，增长其才干，为他日后担当大任做准备。

事实也是如此，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做参军的几年，正是他学习并积蓄能力的时期，也成为他终生受用的一段经历。

读后感悟

1．一个人光有能力不够，还要有机遇。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只是机遇问题。李鸿章初在老家做幕僚时，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才露端倪。真正的成功还远着呢。

2．李鸿章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军事上，都得益于曾国藩。所谓良师益友和知遇之恩，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是良师，又有一份知遇之恩。

3．曾国藩和李鸿章相继出现的时期，也是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时期。当曾国藩以实力证明自己时，也为李鸿章后来的发展机遇埋下了伏笔。

4．“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任何英雄人物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李鸿章同样如此：上天必要“苦其心志”，磨砺之，使之潦倒半生，反反复复，志不得申。然后，在历史需要他时，才让他走上舞台，大显身手。

第四章　一飞冲霄汉——军事家李鸿章

常胜军雏形：洋枪队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起，项羽称霸后，韩信出现；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起，到曹操成就霸业后，诸葛亮出现。自古伟人，其进退升迁，总有不顺，上天总要对他压制——必须要等到时机成熟，如满弓射箭，才能让他出现。冥冥中似乎有这种力量在起作用。

谢灵运说："各位虽在我之前升天，但成佛必在我之后。"我看清朝中兴各大臣，论成名，李鸿章成名最晚，但论声名之大，李鸿章却是最大的。所谓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很自然地成为时代骄子。

咸丰六七年之际，太平军达到鼎盛，清军的衰败也达到极端。朝廷决策彷徨不定，官员们互相猜忌倾轧，加上军需紧张，国库空虚，各省只能自行筹集粮饷，解决各项开支。拆了东墙补西墙，解燃眉之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爱国忠臣和雄才大略之人才出现，也不能很快地发挥作用。于是，万般无奈，清廷想到了雇用欧美军队，来帮助其剿灭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后，开始四面进攻，大肆蹂躏，18个省区，几乎没了一块净地，历经十年，太平天国之乱还不能平定，清政府的无能，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的英国领事和富商们，并不以洪秀全为造反分子，而把他视为为民权而战的革命人物，于是与太平军以礼相待，友好交往，不时提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和粮食。后来，洪秀全骄傲自大，奢侈腐化，太平天国发生内讧，互相残杀，其内政很快荒废。欧美的有识之士看到此情形，才明白太平天国所谓四海皆兄弟，所谓和睦博爱，所谓平等自由，都不过是他们造反的借口而已，其本质和中国历代出现的流寇，并没什么区别，因此认定太平天国成不了气候。于是，英、法、美等国，改变他们的对华政策，都想借兵给清朝政府，以帮助其剿灭乱党。他们向朝廷请示，表达此意，这是咸丰十年的事情。俄罗斯也要派遣海军小舰队，运载了士兵，逆长江而上，来帮助剿匪，俄国公使伊格那还拜访了恭亲王奕䜣，以示友好。

案：当时，欧美各国刚与中国通商，他们当然不想中国处于动乱之中。所以，当两军相持对战、历年胜负不决时，他们感觉有必要站出来帮助一方以结束

战争，使局势归于稳定。但清朝政府之腐败让西洋人十分厌恶，于是寄希望于太平天国。

当时欧美各国，帮助官军则官军胜，帮助太平军，则太平军胜。两军胜败不定。如果洪秀全果真雄才大略，有远见卓识，加强内政，外结友好，与各国通商，签订和约，借助外力平定中原，那么说不定天下就归于他手中了。可惜他没认识到，太平天国内讧腐败，外面又交恶，为自己树了敌人，所以最终被消灭，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名声，也因此得以成就。

当时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虽然和约已签订，但彼此并不信任。所以，对于向外国借兵剿匪，恭亲王不敢作主，于是他一面向热河方面请示，一面征求江南江北的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袁世凯之父）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人的意见。

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极力反对，说百害而无一利。薛焕也不赞成向欧美借兵，却建议用印度士兵，以防卫上海及周边地区，并请示任命美国人华尔、白齐文为队长。

曾国藩也表示认同借用外国兵力，又上奏折申明，说眼下官兵衰疲，外国人既然有相助的美意，就不好拒绝，所以一面答应其好心请求，但要延缓他们出师会合的日期；一面利用其兵力，以起到剿匪的实际作用。朝廷批准，但谢绝各国派兵助剿，命令曾国藩聘请外国军官来训练新军，这就是“常胜军”的产生。而李鸿章开始建功立业，就与此事有关。

华尔，美国纽约人，毕业于美国陆军学校，因犯罪逃到上海。咸丰十年，太平军侵入江苏，苏州、常州陷落。上海的候补道杨坊，认为华尔深沉有才，于是向布政使吴煦荐举他。吴煦向美国领事馆申请，赦免了华尔的罪过。他让华尔招募几十个美国自愿兵，又增加了几百个中国人，让华尔训练，以保卫苏州、上海。



华尔

后来，这支部队屡次与太平军交战，常能以少胜多，所向无敌。于是，官兵、太平军都称之为“常胜军”。常胜军成立，其实在李鸿章来上海之前就有了。

读后感悟

1．时势造英雄，而在英雄出现之前，总要有一些人和事的铺垫，为之作陪衬，以此显示这个历史人物出现的必然性。李鸿章崭露头角之前，同样有这样的征兆：清朝军力败落，外国兵力凸显，其间出现的所有人和事，似乎都在为李鸿章的出现做准备。

2．作者看来，李鸿章在清朝的“中兴”大臣中，资历不算深，成名不算早，但功业最巨，名声最大。无论后世如何评价，李鸿章作为时代骄子是无可置疑的。

3．中国的很多农民起义，因其起初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开始往往是一呼百应，但发展到后来，往往又背叛了初衷，落后于时代，最终被打压下去。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因其狭隘的农民意识。洪秀全功败垂成就是典型的一例。当然，正因洪秀全的失败，才成就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中兴”之功名。

4．外国入侵中国，虽然积极宣传其民主思想，但根本还是为了利益，为此，他们参与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西方先进的思想，为老大中国注入一股鲜活的力量。迫使闭关锁国的

天朝帝国，开始反思自己，并开始艰难的外交工作。而这些，似乎都在呼唤着李鸿章的出现。

5．本节交代清朝兵力败落，不得不借助外国势力的趋势，引出常胜军，为李鸿章的出现做伏笔。

临危受命，崛起于淮军

说到李鸿章的战功，不妨先从他立功的地方及其形势说起。

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财政税收的主要省份。可以说，没有江、浙，国家就没法生存。说到兵家必争之地，非武汉莫属；说到粮饷之地，非江、浙莫属，懂兵法的人都知道。

因各地官军的声势日高，洪秀全不敢再轻视官兵，加之安庆已被官兵收复（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收复），南京将被孤立，形势危急，不得不及时行动。

洪秀全派李秀成、李世贤兵分两路进攻江苏、浙江，以牵制官兵。李秀成的部队英勇善战，接连攻破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战死，江苏各地也被李秀成的部队侵入，逃难的百姓都涌往上海。



淮军士兵

克复安庆后，湘军的声望高涨。中央和地方大员中，原来与曾国藩

不和的，或死或被贬。这样，剿灭太平军的重任，就完全落到了曾国藩的身上。

朝廷传旨，让曾国藩移师东进，收复苏州、常州、杭州等失地。五天之内，连下四道谕旨，语气不容商量。曾国藩上奏推荐左宗棠，让他一人负责浙江军务。

十月，江苏绅士钱鼎铭等人，乘船来到安庆，拜见曾国藩，请求他派遣部队支援江苏。并说吴中地区有可乘之机，将不能持久，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当地团练，二是洋枪和火轮船，三是埋伏下的内应；还有三座城池，虽没陷落，但也将守不住，它们是镇江、湖州、上海。言辞恳切，曾国藩动容。但当时粮饷缺乏，兵力不足，左宗棠的楚军也抽不出兵力。于是，曾国藩就与李鸿章商议，约定来年二月由李鸿章带兵前去支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下旨，向曾国藩征求支援江苏部队的统帅人选，曾国藩就推荐了李鸿章，并请示酌情调拨几千军队，由李鸿章带领，迅速奔赴长江下游，支援助剿。

于是，李鸿章回到庐州，招募淮人勇士。他到安庆后，曾国藩又帮他制定营规军制、武器军械的配备、军饷口粮的分配等制度，都按照湘勇的章程制定，同时参照了楚军的营规建制，对淮勇进行训练。

之前，淮南屡次遭到太平军和捻军的入侵，百姓被围困其中。自从咸丰初年，合肥的志士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就开始组织当地民兵团练保卫家乡，筑起堡垒，驻扎警卫，当安徽全省几乎都遭受战乱时，只有合肥还算安定。

李鸿章招募淮军，就是在乡里团练的基础上招募的，所以二张、二周、潘、刘等都随他参了军。

安徽人程学启，原来一直是曾国荃的部下，官至参将，智勇双全，是湘军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曾国藩把他调出来，让他跟随李鸿章。后来，此人因勇敢善战，闻名一时。

淮军成立之初，曾国藩把湘军的几个营划拨给淮军，从中选出一名优秀军官做统帅，也归李鸿章指挥，这人就是郭松林。

这样，淮军的名将，算起来主要有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淮军正式成立，共有8000人，计划沿长江而下，从太平军的营垒旁冲过去，以支援镇江，但一时没作决定。

二十八日，上海的官僚、士绅筹集白银18万两，雇了7艘轮船，来

安庆迎接淮军。于是，李鸿章决定兵分三路，奔赴上海。三月三十日，淮军全军抵沪，圣旨下来，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任命原来的江苏巡抚薛焕为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外交事务。

此时，上海常胜军的军制还不完备。外国将领华尔指挥着这支500人的军队，守卫着松江。这年正月，1万多太平军进攻松江，把华尔及其部队包围了几十层。华尔带队奋力抵抗，最终击败太平军。

李鸿章到达上海时，华尔带领他的新军归到李鸿章麾下。接着，李鸿章又招募了一些中国人，继续由华尔训练。常胜军的待遇，比湘军和淮军都要高，且高出很多。

从此，常胜军的作用，开始得到大大发挥。

读后感悟

1．时势造英雄，是真英雄自有时。当江苏、上海的战事吃紧时，李鸿章的机会终于来了。果然，他临危受命，创建淮军，接手并开始壮大常胜军，从此大展身手。

2．在一个人还寂寂无声时，有能力、有机遇还不够，重要的还要有上级的支持。李鸿章受命时，正是曾国藩地位稳固，大权在握时。没有曾国藩的推荐和支持，李鸿章纵有才能，也难以施展。可见，地利、天时和人和缺一不可。

3．所谓英雄，可以生于平凡，但成就其功名的必然是非凡的事业。这个非凡事业非他莫属。当时，克复苏州成为最艰巨的任务，也成为李鸿章及其淮军的非凡事业。李鸿章就这样受命于危难之时，担负一项艰巨的事业。这对于半生坎坷、准备多时、几近无望的李鸿章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应该说他人生的所有赌注都在此一举了。

上海得救，解围雨花台

松江府，在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是当地最高武官的驻扎之地，为江苏重要交通要道。太平军急于攻下松江。

李鸿章命令常胜军和英、法防兵（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门屯在上海自保租界）合兵一处，攻打松江南部的金山卫和奉贤县；命令淮军的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攻打松江东南的南汇县。

太平军拼死作战，英法联军抵挡不住而撤退，嘉定县陷落。太平军乘胜进攻上海，程学启率军拦击，大败太平军。南汇的太平军将领吴建瀛、刘玉林等人，开城投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的1万多太平军又来进犯，刘铭传坚守南汇县，大败太平军，收复了川沙厅。但太平军的气势很盛，一队围攻松江青浦，一队又屯集在广福塘桥，集中主力在

泗滨，对准新桥。

五月，只有程学启一支部队守卫新桥，抵挡众多太平军围攻。连日来被围困，情况危急。

李鸿章得知后，亲自带队支援，在徐家汇与太平军交战，击败太平军。

程学启远远看见李鸿章的帅旗，率军出营两面夹击太平军，大获全胜，消灭3000太平军，俘虏400人，1000多人投降。驻扎在松江府外面的太平军，得到此消息，全军震惊，急率队北撤。于是，新桥解围，上海形势得到缓解。

淮军初到上海时，洋人看他们衣帽简陋，轻视他们。李鸿章曾从容地对将领们说："能否打仗，要看军服吗？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军的实力！"当洋人看到淮军将领勇敢坚毅，部队纪律严明，都改变了态度，对他们肃然起敬。原来不服他的常胜军，也开始对李鸿章心悦诚服，顺从其指挥了。

当时曾国藩担负着剿灭太平军的重任，无人可代，也无人可牵制他。他命令李鸿章负责平定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平定浙江，曾国荃负责平定南京。

南京，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攻下它需要与江苏、浙江两省通力合作，形成强大的势力。所以，首先要肃清江苏的太平军，才能围困南京；同时还需要包围南京的太平天国巢穴，否则也无法剿灭江苏的太平军。

淮军到上海时，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等人，计划水陆并进助力淮军，以击破长江南北两岸的太平军堡垒。

四月，曾国荃从天平府出发，顺流而下，接连攻破金柱关、东梁山营寨、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

五月，曾国荃率军到达南京城外的雨花台。这实际上得益于李鸿章对松江的解围。所以，在谈到这场战役的功绩，湘军能攻克南京，歼灭大敌，并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际也得益于李鸿章等人消灭太平天国的外围势力，断其兵饷，使南京陷入孤立，根枯树亡。淮军能平定全吴和苏南，也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际得益于曾国荃等人捣毁太平天国巢穴，使太平军精锐部队产生后顾之忧，战斗力下降，成受困之势。

苏东坡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年、二年之际，中国出现的正是这种豪杰并立的局面。

李秀成，这位李鸿章的劲敌，是太平天国将领的后起之秀。洪秀全起兵造反时，同党中的杰出将领有：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人称“五王”。

后来，冯、萧战死在湖南；杨、韦在南京争权，互相残杀；石达开别有远大志向，别树一帜，转战于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这样，“五王”实际不存在了。

咸丰四、五年间，官兵最是萎靡不振，而江南太平军的气势也在衰落。

李秀成出身于普通小兵，地位低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他还是杨秀清手下一个小侍卫。但他十分聪敏，心有谋略，胆气超群。所以到太平天国晚期，他得以扬起太平天国的余力，以翻江倒海之势，使官军疲于奔命。

最后，太平天国历时六七年才最终平定，应该说全靠李秀成和陈玉成两人之力。陈玉成在长江上游驰骋，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扬起飓风狂飙；李秀成出没在长江下游及入海口地区，在苏州、杭州、常州、扬州激起万丈波涛。

陈玉成战死后，洪秀全能依靠的人，也就只有李秀成了。李秀成不仅智勇过人，而且胸怀宽广，宽仁厚待部下，深得人心。所以，当时官军虽收复了安庆，但下游的太平军气势仍十分高涨，形势不容乐观。

当曾氏兄弟合围南京雨花台之后，江苏及南京方面的大小战役仍在持续，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了心力，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才取得成功，这都是因为李秀成。

所以，说到李鸿章，必须说到李秀成。

南汇一战后，李鸿章的根基渐稳，于是打算与南京的官军配合，以牵制太平军，于是制定进攻之策。这年七月，李鸿章命令程学启、郭松林等人突袭青浦县城，收复之；派遣另一支军队驾船渡海，攻打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收复之。

八月，李秀成让谭绍洸带领十多万士兵进攻北新泾（在江苏地界，离上海只有几里地）。刘铭传半路截击，大败之，太平军退守到苏州。



李秀成

同月，淮军与常胜军一同进入浙江，进攻慈溪县，收复之。此役中，常胜军统帅华尔胸部中弹身亡。依其遗嘱，为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安葬。美国人白齐文代替华尔统率常胜军。

同年夏秋之交，江南瘟疫流行，不少官兵传染致死。李秀成想趁机解围南京。于是在闰八月，李秀成挑选苏州、常州的精兵十多万人奔赴南京，包围了曾国荃的大营，调用数十门西洋大炮，集中火力轰炸，连续十五昼夜。湘军拼死抵抗，毫不示弱。

九月，李秀成令李世贤从浙江带领十多万人过来，合围南京，加强进攻。曾国藩得到战报，心怀担忧，忙从别处调集援兵。

这次战役，是两军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时太平军有20万大军，而陷于重围中的官军才3万多，且官兵病死、战死和负伤的有一大半。曾国荃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团结关爱如同一家人，所以三军将士愿以死相报，抵御住十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从而成就功业。

李秀成看不能为南京解围，又因为江苏官军的气势日益高涨，怕江苏失守而南京也不能自保，十月，就带兵撤退，雨花台解围。

案：此役后，洪秀全大势已去。在敌人坚固的城池下驻军，乃兵家大忌。向荣、和春，都因此两度失败，所以曾国藩对此十分警觉慎重。之前，曾国荃曾屯

兵雨花台，曾国藩就多次告诫他。等到这次战役时，外有十倍于自己的强悍敌军，内有困境中殊死抵抗的流寇，官军处境之危急，可说前所未有。然而太平军明知官军势单力薄，且伤病惨重，却终不敢奋力突围，决一死战，抓住机会建立非常之功业，却功亏一篑，引兵退去，致使进退失守，进而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因为当时太平军将领们也多富贵已极，骄奢淫逸，恋生畏死吧，所以失败灭亡。这也是官军始料不及的。

曾国藩说："军队最怕萎靡不振，缺乏士气。"道光、咸丰之际，官军开始不思振作，而太平军则朝气蓬勃；同治初年，太平军开始士气下降，而官军士气重振。

看来，失败的关键，真是全在于此啊！以李秀成的才干，尚不能避免失败，像洪秀全那样快入土的人，更不值得一提了。

所谓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并非秦国；灭秦朝的，是秦朝自己，并非天下。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不能不以此为鉴。洪秀全以一介平民，一朝崛起，没几年势力就席卷半个中国。但他不能抓住时机乘胜前进，用武力打下江山，却苟且偏安于一隅，把南京当成安乐窝，筑起深宫高宅，真是连陈胜也不如啊！致使最后在一座城里，坐以待毙。

所以，当初向荣、和春的溃败，不是因为洪秀全有多少本事，实在是他遇到的对手，与自己水平相当，所以洪秀全得以苟延残喘，勉强撑了几年。

唉！曾国藩、洪秀全一兴一亡，是天意，还是人为所致呢？君子说：是人，是人事造成的啊！

又案：此役是湘军和淮军立下功劳的最关键战役。不包围南京，就不能牵制江苏、浙江，李鸿章的淮军新成立不久，难以立即取胜；如若不进攻江苏、浙江，就不能解南京之围，曾国荃的军队已经疲惫，强攻也不能完保。读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李秀成包围南京时，让他的副手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谭绍洸等人率十多万太平军，分道从金山、太仓东进，淮军抵防，两军在三江口、四江口交战，互有胜负。太平军又沿运河安营扎寨，横亘数十里。又在运河及其支流上架起浮桥，来进攻黄渡，包围四江口，情势危急。

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下令进攻太平军大本营。太平军强悍善战，淮军难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人身先士卒，士气大振，大败太

平军，俘虏斩首1万多人，四江口解围。

读后感悟

1．淮军新创，就投入南汇一战，解围松江、上海，淮军初试锋芒，就显示出不凡的身手，令中外刮目，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就此打下坚实基础。淮军为什么一改清军颓废气象，充满战斗力？究其原因，当然与李鸿章有关。

2．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外围对太平军的牵制，就不可能解雨花台之围。由此可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统一指挥下的协同作战能力。一个人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真正的成功不是一个人能达到的，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可能成功，真正的成功往往是上下通力合作的结果。

3．“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洪秀全、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风云起，英雄生，你方唱罢我出场，正是大显身手时，看谁是真正英雄。李鸿章要战胜的，又何止是太平军呢？

4．李秀成无疑是李鸿章的一个劲敌，无论聪明智慧，还是胸怀人品，李秀成的优秀都堪称一流，而作者以他为李鸿章的劲敌，也可见对李鸿章的重视。他们都壮志凌云，都年富力强，踌躇满志，怎么可能是行将就木的洪秀全可比的呢？

5．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及洪秀全败在丧失了士气。士气源于志气，说到底还是源于其眼光不足。志气不足，则易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则导致士气衰落；士气衰败，结果自然是失败。太平天国失败，清朝中兴；洪秀全的败亡，则成就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

罢免白齐文，显外事手段

常胜军统领华尔死后，副手白齐文接任。白齐文为人贪鄙狡猾，当时他见官军处境窘迫，就私通李秀成。十月，白齐文暗暗计划在松江城为李秀成做内应，威胁上海道台杨坊，索要巨额军费，杨坊拒绝，他就殴打杨坊，掠夺白银4万两，逃去。

李鸿章听说此事，大怒，立即与英国领事馆交涉，罢免了白齐文的职务，并要他偿还所掠钱财，让英国将官戈登接任常胜军首领。时为同治二年二月。

这实际上是李鸿章与外国进行交涉的第一件事，他表现出的果敢而强硬的作风，令人交口称赞。

李鸿章罢免白齐文后，本要杀他，因美国领事馆阻拦，才放了他。白齐文就投到李秀成的帐下做参谋，参与策划了一些战役，却成效甚微。他建议李秀成放弃江苏、浙江，掠夺当地桑茶，烧其村舍，然后集中兵力北上，占据秦晋齐豫（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中原地带，以挟制东南。因为这里是官军水兵能力所不

及处，可以成就大业。但李秀成没采纳。白齐文还为太平军购买武器，偷窃汽船，偷了官军的几门新式大炮，献给李秀成，致使官军在宝带桥一战中牺牲了数百人。后来，白齐文在李秀成处也不能得志，就跑到漳州太平军将领帐下，最后被郭松林抓住杀了。

读后感悟

1．李鸿章接手常胜军时，这支西洋人统领的洋枪队瞧不起他，不服他管束，直到解围松江后，李鸿章才让西洋人刮目相看。

2．李鸿章在白齐文问题上的果断强硬处理，初步展露出他在外交事务上的手段和智慧。李鸿章在外交上初露锋芒。他在外交上有没有天分不敢说，但时代由此一步步把他推到外交岗位上，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

3．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对外软弱卖国，事实上，李鸿章是一位传统而爱国的中国人，他从不崇洋媚外，也不会轻易低头。从罢免白齐文一事，可看出他的这个特点。

平定苏南，淮军威名扬

曾国藩抓了一个太平军的间谍，得到洪秀全给李秀成的一个手谕，说湖南、河北及长江以北地区，现在兵力空虚，令李秀成带兵20万，先攻下常熟，然后一面攻打扬州，一面逼视安徽。

曾国藩令人把信息报给李鸿章，让他先发制人，赶快拿下太仓州，干扰常熟的形势，牵制李秀成，使之不能到达长江以北。李鸿章也正有此意。

同治二年二月，李鸿章命令常熟守将死守，等待支援，派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等，率各部驾船赶赴福山，与太平军数十次交战，都取得胜利。李鸿章另派程学启、李鹤章攻打太仓昆山，阻断太平军，而命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一起攻打福山，攻克之，常熟解围。

三月，攻克太仓、昆山，擒拿太平军7000多人，程学启功劳最大。戈登从此更加佩服他。

五月，李秀成从无锡出发，和他的5个部将一起，率领水陆大军数十万人支援江阴，占领常熟。

李鸿章派遣他的弟弟李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分路阻击太平军。刘铭传、郭松林与太平军先锋相遇，打败之。然而太平军来势凶猛，每次战斗双方死伤相当。当时太平军在运河两岸筑起连营，北自北漍，南到张泾桥，东自陈市，西到长寿，纵横六七十里，还有上百个堡垒，都扼守在运河的险要位置。太平军还把桥梁拆毁，在河上备置了船

炮，水陆呼应配合，一时形势紧张。

李鹤章与刘铭传商量后，暗里收集木材造浮桥，半夜渡运河袭击太平军，击破北澛的敌营32个。郭松林发起猛烈进攻，击破南澛的敌营35个。周盛波带领部队，击破麦市桥的敌营23个。

太平军陷入大溃败，死伤数万，致使运河堵塞；擒拿头领百余人、马500匹、船20艘，兵器弹药粮食无数。从此，顾山以西太平军被消灭，淮军士气高涨。

六月，吴江的太平军望风投降。

程学启率领水陆大军1万多人，与刘铭传一起攻打苏州。攻入苏州，打下花泾港，守将投降，驻扎在潍亭。

七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收复太湖厅。然后向苏州进发，令刘铭传攻打江阴。太平军的强将陈坤书，调集了湖南、湖北、山东等四股十多万人的庞大军队，合力支援江阴。李鸿章、刘铭传亲自勘察敌情，见太平军大小军营堡垒星罗棋布，西自江滨，东到山口，便决定猛攻。太平军拼死抵抗，两军相持不下。后来，江阴城内有人发动兵变，开门投降，于是江阴收复。

当时，程学启驻扎在苏州附近，连日奋战，前后数十战都取得胜利，太平军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等十多处的营垒都先后失陷。

郭松林率队在新塘桥也大获全胜，斩杀太平军伪王两名，死伤1万多人，夺得数百艘轮船，大挫太平军水师。李秀成为此痛哭流涕，悲痛欲绝。从此淮军威名天下。

太平军经此巨挫之后，李秀成又大举反攻，以图恢复失地。李秀成命令手下集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地8万多人，1000多只船，从运河口出发。他亲自率领几千精兵，占据金匮援助苏州，互相配合策应，与官军连续作战，互有胜负。

十月十九日（同治二年），李鸿章亲自率军，以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攻苏州。经过激战，攻破苏州外围防护。李秀成和谭绍洸等人退回内城，宁死不屈。

后来，官军水陆并进，联合起来三面围攻苏州，此时，城中粮断，人心惶惶。李秀成的部下郜云官等人，生了二心，私下沟通程学启，想投降官军。于是，程学启与戈登亲自登上小船，到城北的阳澄湖，与郜云官等人谈判，订下投降协约，让他杀死李秀成、谭绍洸，献上他二人

的首级来，答应赏给他二品官衔，戈登做保人，让郜云官等人放心。但郜云官终于不忍心杀害李秀成，只答应杀谭绍洸，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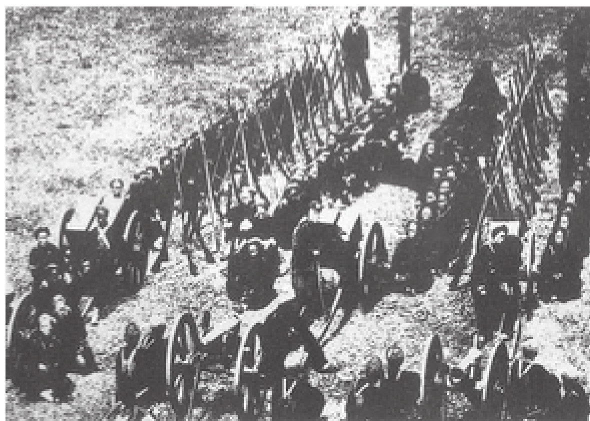
李秀成早已料到谋杀自己的阴谋，但事已至此，已是无可奈何，于是连夜（十月二十三日夜）逃出城。

二十四日，谭绍洸召见郜云官，郜云官和汪有为怕事情泄露，一到军帐中，就先杀了谭绍洸，并灭其亲信部队1000多人，于是开城投降。

二十五日，郜云官等人献上谭绍洸的首级，请程学启进城验收。现将投降太平军将领列举如下：

一、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这8位将军在城中的部队还有十多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曾许诺给他们总兵副将的职位，他们要求履约。但程学启看这8人都是心狠手毒，恐日后难以控制。就和李鸿章密谋杀之。在军舰上大摆筵席款待他们，只等炮令一响，伏兵就出来全部杀之，并杀了他们手下抵抗的1000多人，其余投降。



洋枪队

苏州平定，李鸿章因功被授予太子太保。

当初8人投降时，戈登是保人，后听说李鸿章食言杀了他们，大怒，要杀李鸿章。于是，他揣了短枪来找李鸿章。李鸿章避而不见，不敢回军营。几天后，戈登怒气才消，杀李的念头才放下。

案：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应有惭愧之心。杀降者本为君子所不耻，更何况与投降者事先有约，还有保人呢？此事李鸿章有三罪：一是，杀降者，违背公理；二是违背约定，食言杀降；三是背信于戈登，有失朋友之信义。戈登为此愤恨以至于要杀了他，也在情理之中。

李鸿章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如苗沛霖、李世忠等人降后叛乱的事情发生，也许有其不得已，但他一生中喜好玩弄小聪明、小伎俩，由此可窥见一斑。

苏州平定，成为平定江南的最关键战役。当初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江南，深入军事重地，彼此不能联系配合，所以各自力量单薄，处境危急。

拿下苏州后，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乘胜攻入浙江，和曾国荃、左宗棠相接应，以便合力进攻，这是官军致胜的第一因素。

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攻克之，擒拿守将黄子潍父子。

于是，李鸿章把淮军分为三支部队：甲队，自己带领；乙队，程学启带领，进入浙江，攻克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逼近嘉兴府，左宗棠也来配合，攻入杭州地界，攻下余杭县，屡次大败太平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带领，与常胜军一起攻打常州，大获全胜，平定了宜兴、荆溪，擒拿黄靖忠。李鸿章又令郭松林进攻溧阳，守军投降。

当时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带领10多万人，占据着常州府，并进攻官军背后。李鸿章与刘铭传迎战，太平军气势旺盛，官军失败。陈坤书又偷偷迂回攻入江苏腹地，出没在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因此戒严，加强防备，江苏以西因此受到影响。

李鸿章令刘铭传抵挡常州的太平军，令郭松林放弃金坛，日夜赶路去支援苏州。又令李鹤章回去守无锡，令杨鼎勋、张树声率另一支部队扼守在江阴的青阳、焦阴，断绝太平军后路。

当时太平军包围了常熟，情势危急，官军连日苦战，才勉强支撑。太平军合力包围无锡，李鸿章奋力守护，几乎要筋疲力尽了。几天后，

郭松林带领援兵赶到，大败太平军，才解无锡之围。郭松林因功被授予福山镇总兵。

当时程学启急力猛攻嘉兴（同治三年正月开始），城中的太平军，气势也很威猛，两军伤亡惨重。二月二十九日，程学启激励战士，要加速攻克，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穿越浮桥，爬上云梯，与太平军肉搏。城上敌兵奋力死守，发出的弹丸如雨。突然，一颗流弹击中程学启的头部左边，倒在地上。部将刘士奇当机立断代替主将，继续战斗，登上城楼。一时士气大振。潘鼎新、刘秉璋等人，也赶过来，水陆并进，一举攻克嘉兴。

程学启受伤后，卧床几十天，不见好转，三月十日去世。太平军人马连夜从北门逃走。

三月二日，左宗棠带兵进入杭州，从此苏军与浙军（李鸿章的部队和左宗棠的军队）的联络打通，兵力开始集中。

程学启死后，李鸿章让他的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带领他的部队，与郭松林会合，从福山镇出发进攻沙山，连续作战，攻克之。到三河口，又消灭了太平军2万人。

李鸿章命令各支军队合力围攻常州，令刘铭传攻击常州西北，攻下；郭松林进攻陈桥大营，攻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榭等人袭击河边20多个敌营，攻下。太平军败走，想撤回常州城中，却被陈坤书挡住，许多人死在城下。

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的部队逼迁常州城，炮轰城池，城墙倒塌数十丈。于是组成一个数百人的敢死队，爬云梯登上城楼。

陈坤书骁勇善战，亲自率精兵抵挡，修补城墙，官军死亡数百。李鸿章大怒，令将士增强攻城器具，筑起长围，连日猛攻，两军伤亡相当。相持10多天，李鸿章亲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人，身先士卒，奋勇战斗，登上城台，太平军大乱。陈坤书还不屈服，与部下费天将率领精锐，大声怒喝，展开巷战，郭松林奋力战斗，生擒陈坤书，费天将也被周盛波擒拿。刘铭传大喊：“放下兵器者赦免！”立时投降1万多人。官军也死亡好几千。

常州收复，为四月六日。至此，苏军与金陵军（曾国荃军队）的联络打通，江苏省，除南京外，全部克复。

自同治元年二月开始，李鸿章率领8000人东下到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战各地，大小战役数十场，开始于松江保卫战，终止于嘉

兴、常州攻坚战，总共两年，到同治三年四月，终于平定苏南。



戈登

案：李鸿章平定苏南，固然由于淮军各级将领的骁勇善战和坚忍不拔，但华尔、戈登的帮助也不少。当时李秀成智勇过人，其部队用的也多是西式武器，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等将领，虽然善战，但也不过凭借其勇气谋略，并不懂新式作战方法。所以在作战初期，淮军与太平军交手屡败，吃尽苦头。李鸿章考虑到此，让他们向常胜军学习，并用了不少常胜军的武器装备。左宗棠平定浙江之功，也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等人处得到不少帮助。

所以，清朝的起死回生，应该说也有不少英法人的功劳。他们愿意帮助清朝，是想维护东亚的和平稳定，以利于他们经商。不料直到今天，清政府还不能自觉，不思振作，将来恐怕难免战乱。

读后感悟

1．平定苏南，不仅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重要战役，也是李鸿章从军立功的重要战役。这次战斗，使李鸿章及其淮军威名远扬，权位高升。其中体现了他的军事韬略，更显示了他驾驭千军万马和与其他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也因此成就了李鸿章的军事家角色。

2．在某种程度上，苏南的战斗，表面看是淮军、常胜军和太平天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实际上是李鸿章与李秀成的战斗。这是两大英雄之间真正的交手。

3．两军交战，不杀降者，但李鸿章却杀了8名降将，为他的军事生涯涂一抹

灰色。此举虽然是作为一个指挥官在权衡利弊后顾全大局的必须决定，但在作者看来，这也许就是李鸿章贯使小阴谋伎俩的表现。

4．梁氏看来，李鸿章平定苏南的胜利，固然由于他的领导有方，由于他手下部将的英勇善战，但也有戈登的洋枪队及其新式武器的功劳。这正是李鸿章善于“借力”的表现。

5．透过李鸿章，透过战争，作者看到的是中国相对于西欧国家的落后和不足，心忧清政府的不觉悟，实在是思虑深长，用心良苦。

链接

1864年5月，官军在苏南的胜利已成定局，李鸿章就想裁撤常胜军，此时戈登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李鸿章立即愉快答应。1864年5月31日，常胜军在昆山被解散，全体外国军官辞去在清军中的职务，其精锐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入淮军，进一步提高了淮军的实力。从对“常胜军”的利用、处置，可以看到李鸿章“请神”、“送神”的现实和老辣。

李鸿章要代表朝廷送戈登一大笔钱，戈登婉拒。李鸿章又上书为戈登请功，清政府授予戈登提督之位，赏赐黄马褂、顶戴花翎等，戈登接受了。据说这是帮助清政府平定叛乱的洋人中，唯一一位受此厚赐的人。

李鸿章划拨白银1500两在上海建立常胜军纪念碑。纪念碑原在外滩花园北门外，重建公园围墙时划入园内，纪念碑以正方形大理石为基座，基座上为三角锥形碑，碑上镌刻汉文“得胜”二字，共刻有48名阵亡的外籍常胜军官兵姓名，因华尔列居首位，因而又被称作“华尔纪念碑”。

收复金陵，居功不傲

曾国荃水陆大军并进，包围南京已有两年，到同治三年正月，攻下钟山的石头堡垒。

太平军失去这个险要据点，官军外围才开始围合过来，太平军内外不通，粮饷断绝，南京城内也要断粮了。

洪秀全明白败局已定，于是，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自尽。手下将领拥立他的儿子洪福继位。

当时官军并不知这种情况。朝廷屡次令李鸿章，率领得胜之师到南京助剿。

曾国荃以为南京城中的敌军筋疲力尽，粮食弹药断绝，胜利在望，所以不想让李鸿章参与进来，李鸿章也很知趣，不想分功，就谦虚回避，借口盛夏不便用火器，拖着不到南京。朝廷不解其意，再三催促。曾国荃听说了，很是忧愤，于是从五月十八日起，督促将士们不分昼夜猛攻地保城（即龙膊子，山阴之坚垒，第一险要地），攻克之。又半夜

挖地道，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十五日，打通十多条地道。严令城外各营，做好战斗准备，另外贴出告示，重赏敢死队员，一旦看到城墙有缺口，就冲锋上去。

当时李秀成在城里，洪秀全死后，所有号令都出自他一人。李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施，很得人心，将士们对他忠心耿耿。

五月十五日，李秀成亲率敢死队员数百人，从太平门的缺口突围而出。又让敢死队员穿上官兵的军服，冒充官兵，从朝阳门突围而出，冲入曾国荃的军营，放火喧哗。当时官军已很疲惫，缺乏战斗力，遭此突袭，几乎瓦解，幸亏彭毓橘等将领率领新兵火速赶到，才解除危机。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中装的火药爆炸，声如雷鸣，天地为之一震，南京城墙被崩坏二十多丈。

曾国荃的部队呼喊着奋力登城，太平军死命抵抗，弹丸如雨，外围的400名太平军士兵当场死亡。官军更加振奋，踩着尸体冲过去，蜂拥进城。

此刻，李秀成决心以死报太平天国，他把自己的爱马送给幼主洪福，让他逃命。

李秀成亲自带兵与官军展开巷战，连续三天三夜，直至被生擒。太平军大小将士战死烧死3000多人。天王宫被烧，火焰三天三夜才灭。城中忠诚跟随洪秀全的十多万士兵和百姓，无一投降。

自咸丰三年洪秀全占据南京，到此灭亡，共12年，最终被平。

案：李秀成，真是人杰啊！在太平天国生死存亡之际，在全城人命在旦夕之时，他还能带领精兵，突破重围，竭力死战，气势如虹，毫不亚于官军。五月十五日这一天的战斗，曾国荃的军队没有灭亡，也许是天意吧！

到南京城告破时，李秀成把爱马留给幼主，自己却慷慨赴死，心怀与国家同存亡的志向。回顾历代的名臣儒将，不过如此。回看项羽和文天祥的最终失意，是天意？还是人为呢？

据说李秀成离开苏州时，苏州百姓，男女老少，无不痛哭流涕。而他礼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优待降将，很有文明之国的大将风度。南京城内十多万百姓，无一人投降。就像齐国的田横，和他礼遇的500名宾客，志向相同，生死与共。而说到魄力，李秀成超过前人百倍，实为古来少有的现象啊！

如果李秀成处在洪秀全的位置，那么今天的中国，还不知是谁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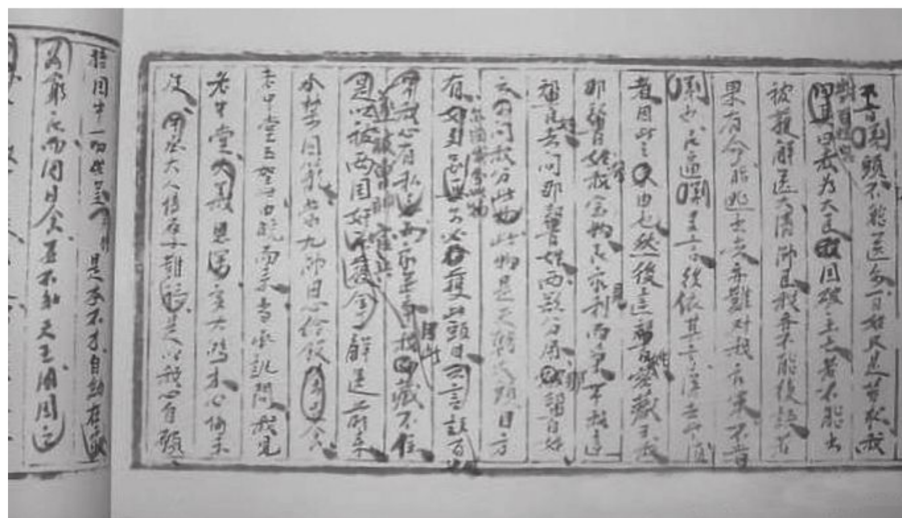
李秀成被擒，从六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三天之内，他在站笼中壮怀激昂，破指为笔，奋力疾书，写下洋洋数万言的供状。后来虽经官军方面的删节，没能完全流传下来，但至今读来，仍可见其凛然不屈的豪迈气概。

唉！刘邦得了天下，项羽被骂。成败论英雄。今天，有谁会为李秀成说句公道话呢？百年之后，自有定评，未来史官作史，怎么会私心妄评呢？然而毕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氏兄弟，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同样是人杰啊！

南京收复，清政府论功行赏。加授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都被封为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都有不同层次的赏赐。

曾国荃收复南京，立了一大功，各派将领都妒忌他。于是，诽谤谗言，纷纭而起。连有贤人君子之称的左宗棠也不免对他有妒意，只有李鸿章，不道一句是非，还竭力帮曾国荃说话，维护其功绩。

案：这也是李鸿章之所以有“文忠”这个谥号的原因了，圣旨传令让他会合曾国荃的军队剿敌，他却不愿在功败垂成时分功，到事成之后还不怀嫉妒心，向主上推荐标榜其功绩，他的这种德操和胸怀确实有过人之处。名不虚传，不是随便就能留名的。



李秀成亲供手迹

读后感悟

1．苏州克复，收复南京指日可待。朝廷催促李鸿章到南京助剿，但李鸿章出

于回避抢头功之嫌疑，借口推托，按兵不动。由此可见他的官场修养和智慧。

2．李鸿章的从容，不仅在于他对战局的把握，更在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在苏州，他是主角；在南京，他是配角。无论出于对恩师曾国藩的尊重，还是出于对曾国荃的成全，他都需要适可而止。

3．如果说李秀成有什么失败的话，也许是他跟随太平天国的失败。而他的“愚忠”，也许是他在报答洪秀全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许这是上天给他的使命吧。也许这正是他作为英雄的可悲之处。

4．李秀成忠勇可嘉，信义并存，其才能品质堪称完人，但因其所跟非人，人们对他并没一句公道话。作者为此惋惜，希望史家们还他一个公道。

5．从来功利面前有纷争，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之际，也是人事纷争最激烈的时候，在这方面，李鸿章很聪明，他既不居功骄傲，也不妒忌抢功，更不参与到人事和口舌纷争中去。我们看到，随着阅历的增加，李鸿章已显示出他为人为官的城府和老道。



曾国藩庆祝太平宴

链接

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

——李鸿章

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像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李鸿章）、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

——戈登

捻军乱起，临危又受命

南京收复，中国的战争平熄了大半。但捻军的叛乱还在继续，所以清廷还是担忧。

捻军之乱，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到咸丰三年，洪秀全攻陷安庆、南京，安徽全省大惊。捻党趁此机会，在宿州、亳州、寿州、蒙县等地造反，横行于安徽、山东、河南一带，所到之处，大肆掠夺，官军无法控制；每次上面派人来剿，都遭到袭击，因此捻党势力日益猖獗。到咸丰七年冬天，捻军的骑兵已侵扰到直隶大名府等地，北京形势紧张。

现将李鸿章平捻之前，朝廷所派平捻统帅列表如下：

人	官	任官年份	屯驻地
善禄	河南提督	咸丰三年	永城县
周天爵	钦差大臣	咸丰三年	宿州
吕贤基	工部左侍郎	咸丰三年	安徽
陆应穀	河南巡抚	咸丰三年	开封府
袁甲三	钦差大臣	咸丰三年	宿州（周天爵卒代之）
舒兴阿	陕西总督	咸丰三年	陈州
英桂	河南巡抚	咸丰四年	开封府
武隆额	安徽提督	咸丰五年	亳州
胜保	钦差大臣	咸丰七年	督江北军
史荣春	提督	咸丰八年	曹州、兖州
田在田	总兵	咸丰八年	曹州、兖州
邱联恩	总兵	咸丰八年	鹿邑
朱连泰	总兵	咸丰八年	亳州
傅振邦	总兵	咸丰九年	宿州
伊兴额	都统	咸丰九年	宿州
关保	协领	咸丰九年	督河南军
德楞额	协领	咸丰九年	曹州
胜保	都统钦差大臣	咸丰十年	督河南军，关保副之
穆腾阿	副都统	咸丰十年	安徽（副袁甲三）
毛昶照	团练大臣	咸丰十年	河南
僧格林沁	蒙古亲王	咸丰十年	
曾国藩	钦差大臣	同治三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避难热河，捻党乘机侵入山东，在济宁大肆掠夺。德楞额与捻军交战，大败而回。蒙古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带军追剿捻党，还算骁勇善战。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头目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人与捻军联合。捻军头目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人率数万人，出没在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地，来往迅速，如暴风骤雨，难以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一股捻军进入湖北，在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地大肆抢劫。舒保战死，僧格林沁的军队也屡次被打败。僧格林沁勇敢有余，但不学无术，军纪不严，所到之处奸淫掠夺，残害百姓，和太平军、捻军没什么区别，因此湖北的百姓对官军十分不满。

当时南京已收复，几万太平军余党加入捻军，转战到河南、山东一带，扰乱当地。同治四年春天，僧格林沁决心扫除乱党。他率领轻便骑兵，追击捻军头目，日夜飞驰三百里。到曹州，他的不少部下起了怀怨背叛之心。

四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中了捻军之计，大败。僧格林沁奋勇作战，落马而死。朝廷震惊，表示哀痛，急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的军务，令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做后勤保障。



僧格林沁行猎图

以前，官军追剿捻军，就知道追击，劳而无功，偶尔围堵一下，也是拆东补西，解救一时之急。总之，无论攻守，不是苟且作战，让捻军

壮大了实力，就是有勇无谋地贸然进攻，挫伤兵力，没有一个全局的规划和战略，因此追剿捻军十多年，却不见成效。

曾国藩受命以后，开始制定了一个包围捻军、牵制其活动的战略规划，就是先把捻军围堵在一处，然后聚集优势兵力围歼。后来李鸿章也是继承了此方略，得以平定中原。

曾国藩是位君子。他向来以谨慎小心、持盈保泰、急流勇退的低调态度自勉。收复南京后，他平生的抱负已得实现，便想功成身退。

当僧格林沁战死，捻军猖獗，直逼京城的危急时刻，曾国藩又受命于危难之时，于是义不容辞地担起重任。但他看到湘军的士气已日益消沉，恐不能胜任战斗，于是逐步遣散湘军，只用淮军。

开始受任时，曾国藩就想到把这个重任交给李鸿章，以成就他的功业。

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托病辞职，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曾国藩恢复两江总督之职，为战事做后勤保障。

李鸿章的剿捻方针是：根据捻军已经成为流寇的情况，追堵逼迫，控制其流窜，然后集中兵力围歼之。这是最好的办法。明朝孙传庭曾说：追剿流寇要把其驱逐逼迫到绝境，在其困顿时围攻；否则，在枪林弹雨中争胜负，纵使打了胜仗，也不能彻底荡平流寇。李鸿章深刻领会此策略。同治四年十一月，李鸿章上奏称，要将乱党追逼到深山环水的复杂地带，然后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兵力，从三面或四面围困之。李鸿章后来的成功，实得益于此策略。

读后感悟

1．清朝嫡系军队的腐朽在僧格林沁的部队中可见一斑，他的身死，更代表了八旗子弟兵的无能，满洲纵使是骑兵也已经风光不再、今非昔比了。而此时，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汉族军队的实力已超过满人，清政府不得不用了。

2．向来能者多劳。因为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当捻军四起，以流寇的性质危及京师时，清政府再次想到曾国藩，曾国藩此时虽已是名利双收，但也不得不临危受命。对别人而言，也许是机会；对他而言，也许是一个负担。

3．曾国藩可说是李鸿章生命中的贵人，每每给他机会。以前是，这次又是。可见，人生中有贵人相助是多么重要，英雄如李鸿章者也不能避免。当然，这个成就他功名的机会，意味着更大的考验和使命。

4．无论是学问修养，还是作战方略，李鸿章都深得曾国藩的衣钵。可见，两人既情同父子，又相契如知音。这种相遇实在是人生中难得的相遇，可遇而不可求。就此意义说，李鸿章是幸运的。

5．李鸿章的身上，有很多曾国藩的影子。但可贵的是，李鸿章能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和作用，尤其在外交上，他青出于蓝，既师出有门，又有开创之功，也正是李鸿章的了不起之处。

破东西捻军，威名再涨

同年（同治）五月，任柱、赖汶洸等大举入侵山东。李鸿章令潘鼎新、刘铭传全力追击，想逼他们到登莱海边，然后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设法围困，使其向北不能窜入京畿地区，南不能跑到淮南。



刘铭传

六月，李鸿章亲自率军到济宁，视察战局。他感到任柱、赖汶洸等各军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还有一些游兵散勇和有煽动力的老兵，狡猾剽悍，不可轻视。如果兵力不足就想包围，追逼他们太紧，包围圈过小了，就会让其看穿计划，着急突围，趁官军不备逃走，对全局不利。

于是，李鸿章制定策略，先在运河上设防，断绝捻军退路，再在胶、莱两地设防，阻断其交通。

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一心想把捻军驱出山东，对李鸿章的这个策略不以为然，十分抵触。

七月，捻军突袭潍河，山东守将王心安驻扎在戴庙，竟然放纵捻军偷渡过去，导致胶州、莱州的防线崩溃。

此时，各界对李鸿章的诽谤纷纭而起，朝廷也责备下来，甚至要弃用李鸿章的策略。李鸿章上奏坚持己见，认为运河东、南、北三面，捻军来往流窜，官军分路追截，当地百姓可能受到侵扰，但不过几个府县而已。如果任由捻军驱入运河以西，那受害的就是好几个省了，其害无穷。同是中国领土和百姓，不能有偏废，顾此失彼。

朝廷准奏，照旧依李鸿章的策略。

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邱和潍县的交界地带和捻军交战，获胜。二十四日，刘铭传追击捻军到赣榆，和骑兵统帅善庆协同作战，击毙了任柱，东捻军势力大减。

二十八日，潘鼎新在海州上庄与捻军交战，击毙很多强悍捻军。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抄袭捻军一昼夜，捻军军心动摇，很多人投降。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等人也频传捷报，战无不胜。到二十九日，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等人，追击捻军70里，到寿光的弥河，开始与捻军交战。战斗打了十几个回合，又追杀捻军40多里，消灭近3万人，捻军的武器、车马、辎重等丧失殆尽。

李鸿章上奏朝廷说："我军士兵回到军营，我亲去抚慰，他们都辛苦疲惫，面无人色。"

弥河一战战败后，赖汶洸落水没死。于是他又纠集了1000多骑兵，冲出六塘河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人，带领水、陆、骑兵，随其后追剿，紧追不放，直到赖汶洸只剩下数百骑兵，被逼迫到高室水乡。

之前，李鸿章派出的淮军"华"字营统带吴毓兰正在扬州运河防守。于是，各支官军合力战斗，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活捉赖汶洸。东捻军消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五省的东捻军也都被消灭。

李鸿章报捷的奏折中，附带陈述说各军自剿捻以来，奔波数省，长年转战各地，日行百里，饥寒交迫，还要担忧外人的指责讥讽，此乃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困苦啊。

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多次申请离

职，李鸿章也为他们请求，想让他们休养一下。刘铭传积劳成疾，李鸿章代他请假3个月。

同治七年正月，张总愚率领西捻军，从山西渡过黄河，向北流窜，势力直逼北京城下。北京政府为之大惊。

初七、初八日，朝廷多次下令刘铭传、善庆等人，带领骑步兵，赶赴河北剿杀西捻军。

因为刘铭传在病中，李鸿章不忍惊动他，于是率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11个营骑兵，潘鼎新的“鼎”字军全军，善庆、温德克勒西的骑兵，陆续进发，由东阿渡过黄河。命令郭松林、杨鼎勋整顿人马，随后跟进。

剿灭西捻军，比东捻军更难。原因是：一因黄河以北，千里平坦，没有高山大河限制其活动。张总愚狡猾多端，又知兵法，他们流窜到北方平原，掠夺马匹，如狂飙般往来迅速，瞬息百里。这种地势，想设一个圈子围困之，难以实行。而且张总愚吸取任柱、赖汶洸的前车之鉴，一听说被围，就立即死命突围而出，不给官军构筑围堵工事的时间，这是第一难题；二因淮军士兵多是南方人，和黄河以北风俗不同；南北性情口音不同，吃米吃面的习惯不同。而且骑兵力单，草料不足，这是第二大难题。

李鸿章奏请施行坚壁清野（坚固壁垒，清除郊野，使敌人既攻不下据点，又抢不到物资。）的策略，他说：

之前，任柱、赖汶洸的东捻军，流窜在中原数省，害怕城寨多于害怕官兵。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民风强悍，因受乱党侵扰已久，百姓自己修起的堡垒城寨随处可见，城池很多，致使东捻军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来只有湖北、陕西一带，受捻军侵扰厉害，因为那里没有堡垒和城寨，临时修筑又来不及，所以乱党在那里流窜并大肆掠夺，势力嚣张。河北、山西一带，一直没受到捻军侵扰，那里民风淳朴软弱，也没修筑堡垒城寨。

张总愚本就狡猾多端，又是末路的流寇，南面有黄河作屏障，势必纵横驰骋，到处流窜，百姓受此惊扰，到处迁徙，何时能结束？真是可悲可叹……

自古用兵，必须对比双方实力，以此作为决策的标准。捻军未必比我军强大，但他们骑兵多于我军，自有我军不能比的气势；他们可随处掠夺粮草，而我军只能就地采购粮草；他们能吃饱，而我军常挨饿，这是我军不能比的。现在要想断其粮草马匹，只有下旨河北的士绅百姓们修筑堡垒城寨，加强防卫，一旦有捻军入侵的警报，立即收起粮草车马，这样既可保自家安全，又能置流寇于绝

境……

如此等等。西捻军最后得平定，实有赖于此策略。

四月，李鸿章又奏请由刘铭传总领各军，朝廷准奏，敦促刘铭传立即赴任。李鸿章命令淮军和河北、山东的民兵，沿着黄河和运河，修筑起长墙、深沟来围困捻军；并抽调各军，轮流进攻，轮流休息。让疲惫休息的将士们在运河东岸选择险要地势屯集驻扎，一旦捻军流窜而至，立即迎击，改剿为防。派张曜、宋庆分别驻扎在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驻扎在陵县、吴桥一带，为防守在运河的部队做掩护。

左宗棠也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带部队来，自连镇以北到沧州一带减河东岸分别驻扎，与杨鼎勋等互相策应。布置妥当后，才下令开始围剿。

五月，西捻军流窜到西北，各路官军分路拦截阻击，接连获胜。

李鸿章趁黄河正在汛期河水上涨时，缩小包围圈。以运河为外围，将恩县、夏津、高唐的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内部的包围圈。逼迫捻军到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官军连连获胜，捻军势力大衰，纷纷投降流散。

六月十九到二十二日，官军乘胜追击，每战每胜。二十三日，张总愚渡河，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从平原县逃到高唐县。二十五日，潘鼎新追击120里，冒雨到高唐县，流寇已逃向博平、清平县一带，企图攻运河。而官军早在马颊河西北岸筑起数百里长墙，足以围堵捻军。捻军不知已入圈套，越是逃往狭窄地方，离死期越近。

此时，官军各部因长时间追击也疲惫了，李鸿章派刘铭传率战斗力强盛的骑兵助战，前线士气大振。

二十八日，捻军被包围在徒骇河、黄河和运河之间，刘铭传调集骑兵和步兵迎击，追杀好几里远。此时，东面来的郭松林率骑兵正好挡住捻军的去路，加之河道交错纵横，地湿路滑，刘铭传、郭松林两军五六千骑兵，合兵一处，纵横追杀，杀死捻军无数。张总愚带领几十个骑兵往北逃去，很快无路可逃，投水自尽。

西捻军被荡平，中原恢复安定。八月，李鸿章奉旨进京。

读后感悟

1．李鸿章受任剿灭捻军时，由于初战不力，针对李鸿章的诽谤纷至，朝廷也

怪罪下来。据说李鸿章被连降三级，但他还是坚持己见，说服朝廷仍用他的策略。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他用实力再一次堵住了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的嘴。由此可见李鸿章的坚忍不拔。

2．李鸿章在奏折中，专门提到手下将士的辛苦劳累和内心苦衷，可见他爱兵如子的大将风度。而这些苦楚，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隐痛呢？毕竟当时他已经声名显赫，正是遭朝廷嫌猜，遭同僚妒忌时。

3．平捻战斗与剿灭太平军毕竟不同，李鸿章采取灵活机动又全局掌控的战略，显示出了一个成熟军事家的韬略。

师承曾国藩，用兵如神助

李鸿章用兵打仗，先制定谋略再行动，料敌如有神助，所以他从军15年，从没打过败仗。虽说这很幸运，但不也是因为他个人的努力吗？

李鸿章剿灭太平军时，以3个小城池为据点，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荡平苏南的太平军；剿灭捻军，面对着横行十多年的强悍敌人，在众将束手无策时，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歼灭捻军，好像有天助一样。

李鸿章对待属下将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同家人，所以属下都愿效命，真不愧为统率将领的人才啊！

虽如此，李鸿章的从军生涯，实际与曾国藩有密切联系，而不只是曾国藩推荐他而已。他平定苏南时，曾国藩统筹全局，肃清长江上游的太平军，曾国荃又合兵包围南京，牵制敌军，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李鸿章才有机可乘；他剿杀捻军，同样秉承了曾国藩的战略，之所以有充足的粮草，也是因为有两江总督曾国藩做后盾。才使他没后顾之忧。

不只这些，李鸿章曾在军中跟随曾国藩数年，从中得到磨砺，接受道德学问的熏陶，学习用兵打仗。

总结李鸿章一生，他的身体力行、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他治军带将开诚布公、团结将士的方略，无不得益于曾国藩。

所以说，先有曾国藩，然后才有李鸿章。李鸿章对曾国藩像对父母一样，尊之如神明，不也是应该的吗！

读后感悟

1．李鸿章从军15年，几乎没打过败仗，一年剿灭苏南太平军，一年剿灭捻军，用兵有如神助，真算是一个奇迹。幸运加上个人才能，使之在特殊时期脱颖而出，一举成为清朝的“中兴”大臣。

2．李鸿章不仅头脑灵活，当机立断，能抓住有利战机；军纪严明，爱兵如子，而且他善于借力，有能力领导洋枪队常胜军，这在当时中国人普遍排斥外国

人，与外国人搞不好关系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能力，也体现出李鸿章带兵的“洋”气。

3．曾国藩对李鸿章不仅有一份知遇之遇，更是他的授业恩师，在学问和军事上对他启蒙并产生深刻影响。无论是剿太平军，还是剿捻军，没有曾国藩的直接支持和帮助，李鸿章是不可能成功的。

链接

任何曾为剿灭太平军和捻军效力的李鸿章的下属一旦遇到困难，李鸿章都会施以援手，下属去世后，李鸿章也会极力为死者争取哀荣，让家属得到安慰。

——《李鸿章传》（英）罗伯特·道格拉斯　李静韬等译

第五章　洋务兴邦国——洋务运动时的李鸿章

所办洋务知多少

“洋务”二字，虽不是李鸿章的专用词。但为他作传，就不能不以“洋务”二字来概括他人生中20多年的事业。

因为洋务，李鸿章被读书人唾骂；也因为洋务，被世人崇拜。我对他的推崇、责备和惋惜，也因为洋务。

李鸿章不懂洋务吗？我看他比中国一般的洋务人士都懂；说李鸿章精通洋务吗？为何别的国家可洋务强国，而独我国不能呢？我总结了一句话作为原因：李鸿章自以为懂洋务，却不懂国家事务，以为洋人所为，与他办的洋务一样。

现把他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后，和日本交战之前所办的洋务列表如下：

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二年正月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
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十月
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
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年四月

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
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五月
设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
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遣使日本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设洋学书页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鴫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元年十二月
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三月
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二年十一月
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二月
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七月
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八月
请开铁路	光绪六年十二月
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四月
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六月
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七年十一月
筑旅顺船坞	光绪八年二月
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八年四月
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一年五月
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十四年
设医学堂于天津	光绪二十年五月

李鸿章所办洋务，大体就是这些。它们分为两类：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其间也有兴学堂，派学生到外国学习等，但都是为军事服务的，要不就是为外交培养翻译人员。李鸿章所认识到的洋人的长处，也主要在此。

读后感悟

1．李鸿章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卫道士，但他同时善于向西洋学习，开明开放，兴办洋务，以期强大中国。无论结果如何，李鸿章办洋务的这个初衷都是好的。

2．对于李鸿章的争议，源于洋务。李鸿章大办洋务，开一代新风，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在作者眼里，李鸿章在当时算是最懂洋务的，而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自以为是，只看到了表面，而没联系到国家民生。



江南制造总局

3．李鸿章虽向洋人学习，但据说他并不崇洋媚外，他甚至瞧不起外国文化，总以中国文化自豪。在他眼里，他认为西洋人的优点就在于其技术、军事和商务。他没有看到西洋民主政体和民众的力量，这是他的短见，也许是他作为朝廷重臣的局限吧。

链接

当英国领事前来拜访时，李鸿章最初关闭了他衙门的正门。李希望领事自旁门进入，而旁门本是用来让官阶较低的清朝官员出入的。当英国领事对此提出抗议时，李的辩解是，根据条约，领事与道台同阶，而中国的道台都必须从旁门通行，因此领事也不应当期望衙门的正门为他敞开。

——《李鸿章传》（英）罗伯特·道格拉斯　李静韬等译

倾力建设水陆两军

陆海军事，是李鸿章下功夫最多的事业。他以知兵善战闻名，而这和他利用洋人及其先进武器有关。

功成后，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兵力平定内乱可能有余，但要抵御外侮就不行了，所以他把加强国家兵力作为重要事情来抓，其眼光不可说不高，他在此投入的精力也最多。中日战争前，李鸿章手下兵力大体如下：

北洋海军兵力表

分职 队别	船名	船式	吨数	马力	速力	炮数	船员	进水年份
主战舰队	定远	铁甲	7，335	6，000	14，5	22	330	光绪八年1882
	镇远	铁甲	7，355	6，000	14，5	22	330	光绪八年1882
	经远	铁甲	2，900	3，000	15，5	14	202	光绪十三年1887
	来远	铁甲	2，900	5，000	15，5	14	202	光绪十三年1887
防守舰队	致远	巡洋	2，300	5，500	18，0	23	202	光绪十二年1886
	靖远	巡洋	2，300	5，500	18，0	23	202	光绪十二年1886
	济远	巡洋	2，300	5，500	18，0	23	203	光绪九年1883
	平远	巡洋	2，200	1，500	14，5	11		
	超勇	巡洋	1，350	2，400	15，0	18	130	光绪七年1881
	扬威	巡洋	1，350	2，400	15，5	18	130	光绪七年1881
	镇东	炮船	440	350	8，0	5	55	光绪五年1879
	镇西	炮船	440	350	8，0	5	55	光绪五年1879
	镇南	炮船	440	440	8，0	5	55	光绪五年1879
	镇北	炮船	440	440	8，0	5	55	光绪五年1879
	镇中	炮船	440	750	8，0	5	55	光绪七年1881
	镇边	炮船	440	840	8，0	5	55	光绪七年1881
练习舰	康济	炮船	1，300	750	9，5	11	124	光绪七年1881
	威远	炮船	1，300	840	12，0	11	124	光绪三年1877
补助舰	泰安	炮船	1，258	600	10，0	5	180	光绪二年1876
	镇海	炮船	950	480	9，0	5	100	同治十年1871
	操江	炮船	950	400	9，0	5	91	同治五年1865
	湄云	炮船	578	400	9，0	4	70	同治八年1869

附：水雷船

船名	船式	吨数	速力
左队一号	一等水雷	108	24
左队二号	一等水雷	108	19
左队三号	一等水雷	108	19
右队一号	一等水雷	108	18
右队二号	一等水雷	108	18
右队三号	一等水雷	108	18

直隶淮军练勇表

中日战争爆发时，直隶淮军练勇有2万多人，大概如下：

军队	营数	人数	将领	驻地
盛军	18	9000	卫汝贵	小站
铭军	12	4000	刘盛休	大连港
毅军	10	4000	宋庆	旅顺口
芦防淮军	4	2000	叶志超 聂士成	芦台 北塘 山海关
仁字虎勇	5	2500	聂士成	营口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倾注全部精力经营海陆两军建设，心中很有把握。



清军演习图

光绪八年，法国入侵越南，滋扰我广西边境，朝廷商议筹资加强京畿防卫，李鸿章上奏说：“我用10多年时间练兵，购买新式武器，但苦

于经费紧张，不能完全实现愿望。但临阵杀敌，还不至于让皇上担忧……”由此可看出他的自信。

但李鸿章怎么也没料到，一旦中日开战，自己辛苦经营的艨艟战舰或伤或沉或被日军缴获；淮军和新军屡战屡败，使其声名一扫而光。所剩武器装备，后来在溏沽与八国联军一战，也大多随同罗荣光、聂士成化为灰烬了。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30年来所积蓄的战争资本，就此烟消云散，如昨天的梦魇。临死时，他精心培植的天津大本营，还没收复。

唉！李合肥啊李合肥，我想你在九泉之下也难瞑目啊！

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半因群臣的牵制，一半因他自己所为。从他个人原因讲，一半因其用人不当，一半因其见识不够。他立下战功，声名显赫时，自视太高，傲视一切。对他的副将和老部下，顾念私情，包庇重用，并不考虑其是否胜任，结果往往把事情搞坏，贻误大局。

李鸿章只知练兵，不知兵之来源；只知筹集粮饷，不知粮饷来源，所以他只能做些零碎事情，终无所成，这也是原因，下文再细说。

读后感悟

1．李鸿章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得益于常胜军，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与外国的差距，于是战后，致力于新军和新式武器的建设，加强军事力量，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进步的。

2．李鸿章认识到海军建设对抵御外侮的重要性，从而建立起中国最早的海军，而且是亚洲一流的海军。虽然中国海军在中日战争中毁于一旦，但这并不能降低李鸿章的首创中国海军之功。

3．李鸿章的淮军，在创立之初，就比别的官军更先进、更洋气，可以说就是一支中国的新军，这支新军南征北战，立功无数。战后，李鸿章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显示了他强兵强国的伟大梦想。

4．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卖国”，但他最初建设水陆两军，都足以说明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爱国情怀。

商务得失在哪里

李鸿章办商务，也没看到明显成效，咎其原因，还是由于官督商办，有所牵制所致。

中国人做买卖的才能是天生的。如果国家能制定商法，搞市场经济，保护商人权利，就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节约成本，国家富强指日可待。但现在每开发一个新项目，必须向上请示，还有大臣督办，即

使所派大臣很得力，但还是会产生越俎代庖的效果，对办事的人还是有牵制。而且这些官员奸滑贪财，狐假虎威，掌控着局势，那些入股的人怎能不寒心呢？那些准备入股的人怎能不观望呢？所以，中国的商务不能发达，可以说由李鸿章推行的官督商办的政策所误导。



清代开平煤矿

我用一句话总结：李鸿章实在是个不懂国家事务的人。他不懂国家之本质，不懂国家与政府间的关系，不懂政府与人民间的责权关系，不知大臣应尽的责任。他不知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反认为我国的政治、教化、传统、风俗等，无不优越于别国。他认为我国只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等不如人家，只需学习这些就够了。

这是近来全国上下的一致论调，但李鸿章是其中的一个老前辈。无盐效仿西施的笑容，寿陵人学习邯郸人走路，真是越学越丑，适得其反，所以终无所成，这是必然的。

读后感悟

1．梁氏认为中国人不是不会做生意，但李鸿章开启的官督商办，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有官员的牵制，就会滋生腐败，就不可能产生西方社会那样真正物尽其用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的商务不能发达，可谓深刻呀！今天的中国，又何尝没有这种牵制呢？

2．作者认为李鸿章的失败在于他没认识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不能深刻领会西方富强的真正原因，只片面地认为只需“拿来”西方的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等表面的东西，而不知西方政体和文化的某种先进性。有一定道理，但这岂是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所能超越的？

3．李鸿章学习西方的一些“皮毛”，但在文化上自视很高，对西方不屑一顾，虽然有些固执迂腐，但这不正是他尊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的表现吗？事实上，在文化的博大精深上，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但对于文化的创新问题，也许依然值得我们探索。

毕竟是用心良苦

即使如此，李鸿章的见识，还是远远超出常人的。我曾看到他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第二次上奏，商议不可裁撤制造轮船的奏折：

我认为欧洲各国，百年以来，从印度到南洋，从南洋到中国，闯入我边界，这是史上没有记载的。自古以来，没通关和贸易的国家，都来拜访我国，请求通商互市。我皇上有天朝上国的气度，一概与之立约通商，以笼络他们。如今，全球东西南北，遥隔万里的国家，都跑到中国来了，这是三千年来没有的。西洋人靠坚船利炮在中国横行，我们的武器敌不过，所以受制于他们。现在有人说驱之出境，不过一句空话罢了。即使想保全和平，守住疆土，没先进武器也不行呀……士大夫们限于道德学问，对此懵懂不知，苟且偷安而忘却二三十年前的创伤。以后用什么来安内制外呢？这就是有些人提出要停止制造轮船的所谓原因吗？我以为国家的其他费用可省，唯独在养兵军费上不能省。如果省，其他就更不必要了，国家将无以立足，永远不能强大起来。

光绪元年（1875年），因台湾事变起，李鸿章在筹备建立海防的奏折中说：

这是总理衙门汇报的6条主张。它把当前最紧要的事与长远规划，概括说明，没有遗漏，应该说是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

其中不容易立即办好的，就是找优秀人才难，经费筹措难，意见分歧化解难，消除陈旧风气难。如果因循守旧，不加改变，纵使每天设防，也是画饼充饥，徒劳无功。



轮船招商局

当务之急，就是努力破除成见，做些实事。为什么呢？历代的边防守备，重在西北，对强弱势力的分布，主要次要的划分，各代差不多，而且与外国有固定界限。

现在东南沿海一万多里的土地上，允许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他们还分布在北京，以及各省会城市。他们借友好往来之名，私下想吞并我国。一个国家闹事，其他各国跟着煽动，这实在是前所未有。轮船电报的迅猛威力，更是数千年来不遇的强大对手。外来侵扰不断，变幻迅速，而我们还在用老办法抵制，就像医生看病，不问症状，统统开旧处方医治，实在没疗效啊。

186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日渐指向内陆，那些对外国人鄙夷不屑的文人士大夫们，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说要驱之出境。但这不过是局外人的非议，因他们根本不知当事人的艰难，要问他何以自强，如何抵御外侮时，他们却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办洋务也很久，经历和见识也不少，对于敌我之间的优劣长短，认识得较深刻。环顾我们现在的人、财、物，各方面实在不足，多拘泥于既有观念，受口舌牵制，想做点事业却无从下手。

《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如不变通，那无论是战是守都不可靠，光靠讲和也不能持久。

李鸿章又说：

近来，迂腐守旧的读书人，大多以办洋务，与外国交涉为耻；心怀功利机巧的人，把回避洋务当成终南捷径，以此提高自己的声望。

如果朝廷不下大力气开辟新风，破除陋习，以实务富国强民，那危局将无法挽回。今后人才会更缺乏，偌大一个中国，将无自强自立之日，这就不仅令人担忧，更令人感到耻辱了。

可见，李鸿章明白当下时局，知道苟安现状不能长久；他在为中国的百年社稷着想，寻求安内制外的良方，知道老处方已不能医新病；他知道如果不变法维新，是战是守都不可靠；他知道分歧不解，陋习不除，将一事无成；他甚至也知道日后中国将更缺乏人才，偌大一个中国，将没有自强自立之时。

李鸿章说得沉痛，读来使我热泪盈眶。

那么，以他如此的忠诚，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又长期身居要职，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是这些，原因何在呢？

这是因为他只知有军事，不知有民政；只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只知责备他人，自己却不知反思自己；只知抱怨分歧难以化解，陋习不除，却看不到自己辖下的分歧陋习。所以，李鸿章与那些人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不知今天世界各国的竞争，不在于国家而在于国民；不知西方各国能化解分歧，消除陋习，施行新政富强国家，原因就在于一股源于基层的力量。而要让这股动力激发，就必须有一两个有先知先觉、能激发人力量的先行者。由他引导人们前行，鼓舞大家；新风形成后，再因势利导，利用下层百姓的力量，那么事情就必然能成功。

李鸿章如果不知这点，不担忧，也就算了。而他既然心中明白，并为此担忧，却无所作为，真是遗憾。以其声望地位，对上可打动皇上，指使官员；对下可制造舆论，号召全国人民，可他没能做到。

所以我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他是被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造时势的英雄。

虽然如此，事情换了环境就会不同，人换了时代也不一样。我等生在今天的人，以此指责李鸿章，他一定不肯接受。他所说的旁观者不知当事人的艰难，显然是说自己心里也有无奈和不为人知的痛苦。



晚清贵族

如果援引《春秋》责备圣贤的说法，李鸿章自然难辞其咎，但是，试问今日中国4亿人中，又有几人有资格这样攻击他呢？

我对李鸿章虽然也有不满，但我同样不能原谅那些守旧，拘泥于辞章的儒生和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小人，更不允许他们附和我，对李鸿章妄加评议。

简要说，李鸿章不失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不幸的是，偌大一个中国，继李鸿章之后，却没有一个哪怕是无名英雄的人出现。所以，李鸿章在一跃而起后，终没能取得更大成就。对此，我又对他表示遗憾和同情。

本章后，李鸿章的得意历史告终，失意的历史开始。

读后感悟

1．从李鸿章的奏折中，我们看到他的忧国忧民和高瞻远瞩。他放眼全球，进行中外优劣实力的对比，得出学习外国技术，强大军事国防的结论。虽然不免流于形式，但毕竟他已经观察到，想到并在努力做了。他的这种眼光和用心，是他的同僚们所不能比的。所以，他才倾力大办洋务，实在是用心良苦啊！

2．一个人想做点事情，总是会遇到阻力，更何况李鸿章位高权重，想扳倒他的大有人在。无论是儒生们事不关己的妄议，还是渔利小人别有用心的诋毁，都不能动摇李鸿章做事的决心和魄力。李鸿章向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而在梁氏眼里，这些人的评论和行为，更是可鄙而微不足道的。

3．对于老大之中国的种种病症，李鸿章是知道的，并一直寻找医治的良方，但他毕竟是有局限的，不仅由于他眼光的局限，更由于他身份的局限。所以，对

于民众力量，对于民主政体，终是他个人无法超越的。

4．作者对于李鸿章的认识到了，但无所作为，表示批评，所以说他终是不学无术之人，只能算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但同时又对李鸿章表示一份理解：想到他背后的压力，想到他无法实现理想的痛苦，想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同情他，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客观和公正。

第六章　东亚逢对手——甲午战争时的李鸿章

三大失误引发战争

中国维新运动的启蒙，自甲午战争始。李鸿章的名声，在此战争中被淹没。

可惜啊！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鸿章刚过完70岁生日，就病了，但病而没死，结果就遭遇这场战争，一个接一个，真是祸不单行。经历了8年难熬的耻辱岁月后，现在死去。天啊！之前你怎么那么宠爱他，后来却为何让他遭此厄运，对他如此残酷呢？写到此，我不禁停笔喟叹。

中日战争实源于朝鲜，追溯其源头，应该说是李鸿章外交上的一大失误。朝鲜本是中国的属国。最初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日本与朝鲜不合，日本派使者到中国交涉。朝鲜既是中国的属国，那它的外交理应中国为它做主，这是国际公认的法则。但中国当局因害怕多事，就答复日本说："朝鲜的国事，我朝向来不干涉，听凭贵国与朝鲜处理。"

日本又派使者到朝鲜，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两国签订条约，第一条是："日本以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它和日本一样，拥有独立自主的主权。"

光绪五年，英、美、德、法等国，先后来要求与朝鲜互市通商，朝鲜政府感恐慌，犹豫不决。李鸿章就密函给朝鲜太师李裕元，鼓励他与各国签订条约，又上奏朝廷说借此可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人，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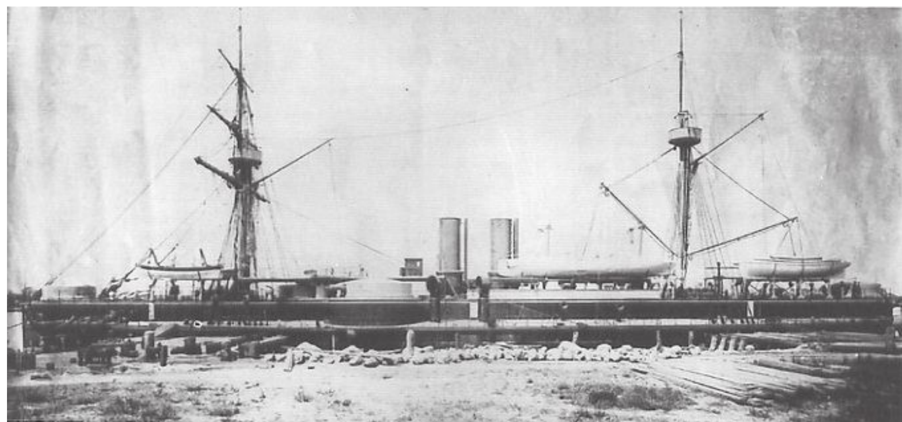
光绪六年，驻日本使臣何如璋提议中国应主持朝鲜的外交事宜，应在朝鲜派驻办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对朝鲜秘密地保护更方便些，否则朝鲜也未必愿意服从，还可能得罪别国，万一哪天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恐怕引起战争，等等。

光绪八年十月，皇上的侍读张佩伦上奏，建议派通商大臣到朝鲜，帮朝鲜办理外交事务。李鸿章还是坚持原来意见。因为李鸿章对"藩属国无外交"的国际公法不熟悉，图一时省事，不能明确立场，最终给人以口实，实在是外交史上的一大遗憾啊。此后，各国不再把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与伊藤博文签订条约，明确

约定，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日两国如果派兵，必须事先相互通知。于是，朝鲜似乎成了两个国家共同的属国，真是不可思议。后来两国各执一理，纠缠不清，最终酿成战争，祸根就始于此。而这个祸根不能不说是由李鸿章引起，这是他的第一大失误。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东学党发动叛乱，气势猖獗。当时袁世凯驻扎在朝鲜。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他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派兵到朝鲜助剿，并鼓动朝鲜国王向清朝求援。



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

五月初一，李鸿章派海军“济远舰”、“扬威舰”赴仁川、汉城，并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淮军1500人开往牙山，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日本随即也派兵前往。到五月十五日，到达朝鲜仁川的日军已达到5000人。朝鲜震惊，请求中国先撤兵，以让日本撤兵。日本既派重兵来，自然不退，就商议与中国共同干涉朝鲜内政，双方信函往来，言辞激昂，战争一触即发。

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属国有叛乱，人家又请求派兵支援，作为宗主国，自然有助剿的责任，所派兵前往；对日本来说，朝鲜既然已成独立国家，现在中国派兵来平叛，一定有目的，所以也派兵来干涉。两国各执一词，都自以为是，有凭有据，说起来都有道理。

但也有疑点，中国还没派兵时，袁世凯屡次致电李鸿章，说明朝鲜的东学党十分猖獗，朝鲜没能力平定，之后朝鲜国王发来求援文书，乃袁世凯指使。但为何五月初一才发兵，而初十已传来叛乱平定的消息呢？当时中国军队还在路途中呢。可见，朝鲜叛乱根本不必请中国助

剿。不必助剿，而中国却出兵了，所以日本怎能不疑心呢？所以要说日本没道理，日本国当然不能接受。有人说袁世凯想借此邀功，所以夸大其词，制造事端，却没料到日军却紧随其后。果如此，一己私心，使十多万百姓遭难，破坏千年古国的体面尊严，他袁世凯就难辞其咎了。可是，听凭亲信之言的李鸿章，不是也有知人不明、用人不当的罪过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多次与中国商议共同干预朝鲜内政，中国不同意；中国多次要求双方同时撤兵，日本不同意。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于是寄希望于俄国和英国出面调停。北京、伦敦、圣彼得堡3个城市间电报和信函往来传递，俄国、英国也愿意帮忙，却暗里坐收渔翁之利。

拖了些日子，还没做好战争准备。五月下旬，日本派驻朝鲜的军队已达1万多人。本来中国兵力就不如日本，临时交战，又准备不力，步步落后于人，重要战略地点都被敌人占据了，所以还没开战，胜负结果就可知了。这是李鸿章的第三大失误。

读后感悟

1．中日开战，源于朝鲜内乱，而祸根是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失误。什么失误？态度不明确，胆小怕事，藕断丝连，结果造成麻烦。

2．作者总结中日战争李鸿章的三大失误：态度不明，用人不当，贻误战机。也算深刻了。

3．李鸿章刚刚因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而建起的名声，因为中日战争，一落千丈。也许这也是上天的安排，让李鸿章品尝失败的滋味，以便打击他的骄傲自信，让他今后担当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海军大受挫

三大失误无法挽回，战争就打响了。

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命开战。他派总兵卫汝贵统领“盛军”的骑兵6个营，进驻平壤，令提督马玉崑统领“毅军”2000人进驻义州，他们由海路到朝鲜的大东沟登陆；令叶志超带军到平壤，他们都是淮军，乘坐英国的三艘商船分批前往，由济远舰、广丙舰两艘军舰护卫。

二十五日凌晨，遭到日舰袭击，济远舰舰长方伯谦，见日舰临近，吓得躲到铁甲最厚处。随即，济远舰遭到炮轰，船舵被毁，方伯谦竟挂起白旗请求停战，然后逃回旅顺港。

“高升号”被击沉，死亡700多人。二十七日，通告各国，饬令中国

驻日公使汪凤藻撤下国旗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撤回平壤，却谎报打了胜仗，声称在二十五六七等几天内，共歼敌5000多人，朝廷下旨，赏给2万两白银，各级军官都受到赏赐。此后，中国海军、淮军的威望，开始衰落。

当时正在五六月间，日舰聚集在朝鲜海面，穿梭如织。中国的各个军舰却躲在威海卫，悠闲自在，直到北京方面有人上奏弹劾，才假装着派出一支辅助舰队，开出军港，有时行驶30里，有时行驶50里，从起航出港，大约五六个小时后，就又迅速返回军港，然后拍电报给北洋大臣，说某船巡逻到某处，并没看到日本兵等言语。

如此种种，可笑可叹。八月上旬，北洋大臣接连接到前线电报，要求增加兵力。于是就雇用5艘招商局的轮船，载着士兵粮食，由军舰护送前来。铁甲船、巡洋船各6艘，水雷船4艘，合成一队同行。中秋节抵达鸭绿江口。5艘运兵船鼓起轮帆，直接驶入鸭绿江，浅水兵船和水雷船护卫着一起进入，其他船舰驻扎在离江10里或16里的地方。

当时锅炉的火还没灭。十六日晨，望见黑烟升起，估计日舰临近。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成“人”字形阵，镇远、定远两舰排在“人”形阵的顶部，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排在“人”形阵两翼，另用号旗招呼鸭绿江中的各个战船都出来助战。

一会儿，日本的舰队靠近，排成“一”字形，扑过来，总共有11艘，敌军巡洋舰的速度很快，转眼间变成太极阵，把中国舰队的“人”形阵包围起来。中国战舰开炮示威，但因距离日舰有9里远，肯定打不中。炮声还没停，敌舰已经聚集过来，与定远、镇远舰相距6里多，他们怕中舰的重装甲和重炮，而且这个距离中国的大炮打不到，而日舰的大炮却可以打到中国军舰。日舰离中国“人”形阵最末端的两艘军舰较近，而且炮小装甲薄。一会儿，日本军舰就切入中国舰队的“人”形阵脚，致远、经远、济远3舰，被隔在“人”形阵之外。致远舰被孤立后，船身接连受击，快要沉溺了。

致远舰长邓世昌，开足马力，向日舰撞去，要与之同沉，但没做到，全舰沉陷，舰中250人全部遇难。整个甲午之战的死难者中，以邓世昌最为悲壮。

同时，被孤立在阵外的经远舰，刚离开主队，就突然失火，舰长林永升，一面开炮，一面泼水灭火，紧急中依然有条不紊。远看一艘日

舰，好像受伤，他立即开足马力追击，却被日军所放的水雷击中，躲闪不及，轰然炸毁，殉难者共有270人。

惨烈啊！济远舰舰长方伯谦，即七月护送高升号军舰到牙山的那个人，中途遇日舰而逃回旅顺港。两军刚一交战当天，他就挂起白旗，示意主将他的军舰受伤，后来因为企图逃跑，也被日舰隔出阵外。当致远、经远两舰与日军激战时，方伯谦却全然不顾，只顾自己，如丧家犬一样逃跑，却误入浅水区。当时扬威舰在此处搁浅，不能转动，被济远舰猛撞开一个大口，沉没，死难者150多人。方伯谦惊恐万分，飞逃到旅顺港。

第二天，李鸿章发电令：捆绑方伯谦到军前正法。同样的，还有广甲舰，只顾防备身后追击，不顾前路，也失误撞在海岛的礁石上，被日军的水雷击碎。

中国的整个“人”形阵中，经远、致远、扬威、超勇舰沉没，济远、广甲舰逃跑，能与日本军舰相抗衡的只有7艘军舰。这次战斗，虽然日本舰队也受到伤害，但并没丧失一艘军舰，而中国却失去5艘。

中国海军在大东沟几乎被消灭，同时，中国陆军在平壤也战败。平壤是朝鲜重镇，西、南、东三面环海，北面是崇山峻岭，整个城市背靠山崖，城东的江水，绕过山崖曲折西流；西北角则无山无水，是直达义州的通道。

中国的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6员大将，统领精兵34个营，七月中旬在此地会合，他们都是李鸿章的部下。他们从牙山出发时，副将聂士成曾建议，应趁日军还没进入朝鲜境内时，先派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同时让海军占据仁川港，使日本军舰无计可施，以两地的海陆大军，共同牵制日军，然后，让驻在平壤的大军南下。李鸿章却没采纳。七月二十九日，牙山失守，这个策略自然作废。

日军进入朝鲜时，正当酷暑，道路崎岖不平，行军艰难；沿途村庄贫瘠，无处筹粮。朝鲜向来惧怕我军，中国军队到了，就提供粮食，有求必应，而不给日军。所以，日军进攻平壤时，只能吃干粮咸菜。此时，如果我军通晓兵法，趁日军疲惫时出兵袭击，必能获胜。但他们只采取了以逸待劳的策略，自以为凭借平壤的坚固堡垒，足可御敌，这是最大的失误。李鸿章八月十四日所下的军令，主要在防守而不是进攻。中日战争都是被此策略所误导。

按李鸿章的部署，马玉崑率领所部“毅”字军4个营绕出江东，与其他部队形成两面夹攻之势。卫汝贵、丰升阿率两支部队共18个营，驻扎在城南江岸，左宝贵的6个营驻在北山城，叶志超、聂桂林率军据守在平壤城中。十二、十三、十四等几天内，日军已陆续集结在平壤附近。开始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到十五日晚上，日军完成部署，以右翼部队攻陷大同江左岸桥里的炮台，再渡江进攻平壤城的正面，以师团长所率主队为后援；以左翼部队从羊角岛往下渡过大同江，直接冲击我军右翼。十六日，日军在大同江岸与马玉崑所率军队展开激战，日军死伤很多，其炮台失陷。

当时左宝贵已退守牡丹台，拥有7连发的毛瑟枪和快炮等枪械，在战斗中很起作用，但日军接连发射开花大炮，左宝贵受伤阵亡，军队大乱。午后4点半，叶志超急忙中挂起白旗，请求停战。当晚，全军士兵纷纷撤退，从义州、甑山兵分两路，却被敌人堵截，阵亡2000多人，平壤失陷。

这次战役，李鸿章20多年所培植、自以为强兵劲旅的部队，也基本被报销了。中国在军事装备上的懈怠，本为外国所熟知。唯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向来以西洋的方法练兵，也是李鸿章一生苦心经营的部队，其赫赫威名令日军也胆寒。战后，日本的将领还说这结果始料未及。

淮军所以失败，一因将帅愚蠢又不称职，甚至还有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叶志超谎报军情，欺骗皇上邀功的，就这样的人上前线，怎能不败？二因6个统帅官职、权限都相同，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指挥，致使军队管理涣散，配合不力。这次战役是李鸿章在用兵上失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名声，也一扫而光。

久经训练的军队，尚且如此，其他仓促间新近招募、军纪不严、军械不完备的部队，就更不值得一提了。自平壤战败后，朝廷决策更加犹豫，军事上的责任，不只在李鸿章一人身上，这里列出其中的重要将帅如下：

依克唐阿	奉天将军	满洲马队	以光绪二十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宋庆	提督	新募军	以光绪二十年（？）派总统前敌各军
吴大澂	湖南巡抚	湘军	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刘坤一	两江总督	湘军	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还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骑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人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人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的桂勇；郡王哈咪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的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团练的津胜军；某蒙员所带的蒙古兵。其间有的归李鸿章节制，有的归依克唐阿节制，有的归宋庆节制，有的归吴大澂节制，有的归刘坤一节制，丝毫没有规矩，也不统一。有识之士早预料到战败的结局了。

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岫岩、海城、旅顺口、盖平、营口、登州、荣城、威海卫、刘公岛先后失陷。海军提督丁汝昌，带领战败的舰队，投降日本，于是，中国的海、陆军兵力全部被摧毁。

这里，将李鸿章生平下大力气经营的海军列一表，以纪我对李鸿章末路英雄之感慨：

经远	铁甲船	沉	黄海
致远	钢甲船	沉	黄海
超勇	钢甲船	沉	黄海
扬威	钢甲船	火	黄海
捷顺	水雷船	夺	大连湾
失名	水雷船	沉	旅顺口外
操江	木质炮船	夺	丰岛中

来远	铁甲船	沉	威海卫
威远	练习船	沉	威海卫
福龙	水雷船	夺	刘公岛外
靖远	钢甲船	沉	刘公岛外
定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镇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平远	钢甲船	降	刘公岛中
济远	钢甲船	降	刘公岛中

其余还有康济、湄云等木质小船，镇北、镇边、镇西、镇中等4艘蚊子船，还有水雷船4艘，炮船3艘，在刘公岛海湾内或伤或完好无损的船只，大小共有23艘，全被日军缴获。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

丙、广乙3艘军舰，或沉或降。

从此，中国北部数千里的海面上，几乎再也看不到中国军舰的影子了。

读后感悟

1．大东沟一战，中国海军几乎丧失殆尽。据说当时中国海军在亚洲是一流的，将士们不可谓不英勇，何以如此不堪一击？这结果不仅日本没料到，大概李鸿章自己也没想到吧？日本历来向天朝伏拜的，封闭的天朝也从未把小日本放在眼里。虽然今非昔比，日本明治维新国家实力大涨，天朝已然落后但经济实力还属世界一流，怎能想到会败得如此突然而惨痛？

2．平壤之战中，李鸿章指挥失误，贻误战机，致使战败。当然不只因为李鸿章一人的失误造成的，更因为整个军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

3．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多年辛苦经营的海陆大军毁于一旦，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天朝帝国走向悲哀和末落的必然命运。这里，李鸿章个人的命运，也成为一个国家命运的体现和缩影。

军事声名一朝损

中日战争，李鸿章被指责，成了众矢之的，被骂得体无完肤，人人都想杀死他。

客观地说，李鸿章的确有难辞其咎的一面。开始，他错误地劝告朝鲜国王与外国定约，却不懂国际公法，这是责任一；

既然已与日本签约，默认朝鲜为独立国家，却又派兵干涉，授人以话柄，这是责任二；

日本派兵到朝鲜，有进无退，李鸿章不抓住先机，却还依赖别国的调停，致使战机延误，这是责任三；

聂士成建议趁日军没到时进据韩城，以牵制敌军，李鸿章却不采纳，这是责任四；

高升号军舰被击沉之前，丁汝昌曾请示带北洋水师与日军作战，李鸿章也没采纳，致使日军反客为主，给日军以喘息的机会，我军处境日益危险。这些都是由于李鸿章害怕与人交战引起的，以为谈和即可，而不知道中日早已成为敌对国，而非友好邻邦了。错误地把外交政策用到军事中，这是责任五；

李鸿章也许会说，这是考虑到我国的兵力不如日本，所以苟且忍让，害怕战争。即使如此，身为北洋大臣，带兵打仗20年，怎么连一战

都打不了呢？这是责任六；

李鸿章可能辩解说：朝廷牵制，经费不足。虽如此，这只是兵力不足而已，为何现有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向来久经训练的部队，也如此脆弱呢？而且克扣军粮、奸淫掳掠，无视军纪，这是责任七；

要么枪不好，弹药不好，子弹与枪不匹配，枪支弹药不协调，却说以前管理军械局的人都廉明，谁信呢？这是责任八；

平壤之战，军队没统帅，此兵家大忌，李鸿章却重蹈覆辙，这是责任九；

始终防守为主，被动受敌，受制于人，而不是牵制敌人，害怕敌人如老虎，这是责任十；

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这是责任十一；

旅顺港地处天险，西洋人说就是让几百人守护，只要粮食充足，3年也难攻破，如今却任用一个鄙陋懦弱的亲信守护，临事就望风而逃，这是责任十二。

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罪过。

甲午年九、十月以后，清廷上下，到处可见盲目无知却指手画脚的人，他们闭门造车，道出多门，号令也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战败的责任自然不能归咎李鸿章一人身上。

我认为那些指责李鸿章的人，应负比李鸿章更多的责任。这次战役，没有一个将帅不辱国，这是自然的。但相对说，海军比陆军表现优秀，李鸿章部下的陆军比其他军表现优秀。在大东沟一战中，中日海军激战5个小时，令观战的西洋人啧啧称赞。虽有方伯谦这种败类，但其他舰船的表现也算好的，即使敌军也肃然起敬了。

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只有海军是日军的对手，陆军没对手。刘公岛一战，弹尽粮绝，或投降以保全性命，或殉国以保全名节。先后死难的有：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是不同的死，价值不同，但都有一股男儿气概，所以他们的死令人敬佩哀痛。他们全是北洋海军中的重要人物。

再看陆军，都是些没有心肝的人，其无能不值得一提。然而在平壤之战中，还是有左宝贵、马玉崑等人连续激战，他们也是李鸿章的部下，敌我伤亡相当。后来想收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到防御盖平，前后几次与敌人激战，虽然没能成功，但也竭尽全力了，指挥这次战斗的，是宋庆，也是李鸿章的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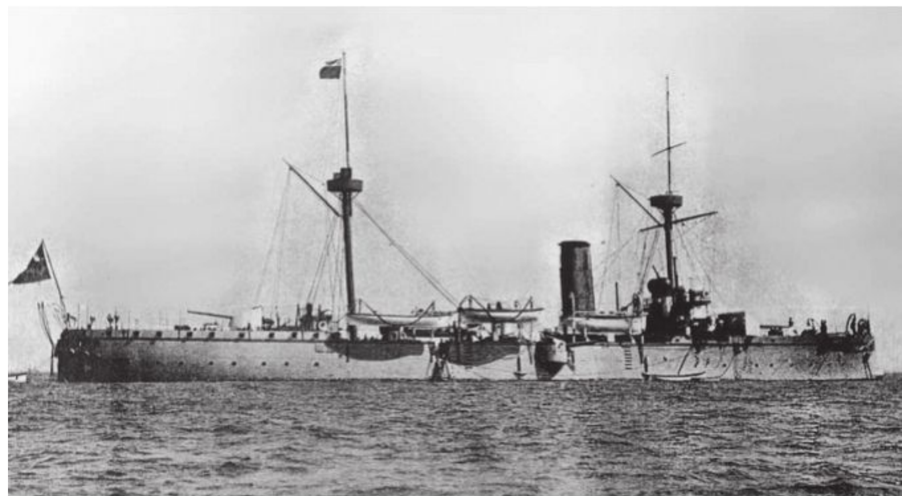
这些虽不足以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人的罪过。但比起吴大澂贴告示劝降日军，不战而逃的表现如何？比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的表现如何？

所以，说中国军队腐败可以，但说李鸿章的淮军腐败，不合适。

但满朝有一股浮躁骄横之气，以为杀了李鸿章，就万事大吉。然后，那些道貌岸然、指手画脚的官绅们，就可气吞山河，任意妄为了。尤其是湖南人，气焰最为嚣张。于是，重新起用湘军的说法产生。但总体看，湘军还不如淮军。

唉，这些人真该羞愧呀！我这不是为淮军和李鸿章辩护。我看这次战争，本来不想原谅李鸿章和淮军，但更讨厌那些骄狂奸诈的人，不负责任地在背后挑剔，飞短流长地道人是非，图一时口舌之快，却不知如何改进，所以这种人实在是败坏国家。李鸿章纵有责任，但是这些人可以指责的吗？

这次战争，李鸿章失误不少，但即使他没失误，中国也不会获胜。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间的战争，其胜负在开战前就可预料。为什么呢？社会越文明，优胜劣汰就更加明显。谁有实力，谁就能获得胜利。无论政治、学术、商务、无不如此，军事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30年来，苦心经营，上下一心，造就出一支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强大军队，然后孤注一掷地向我军进攻，如果没有自信，敢这样吗？所以失败后，才明白原因，这是愚蠢的人；或者失败了还不知原因，这是麻木死人。但只加罪于李鸿章一人，不应该吧？



西方有媒体评论说：日本不是在与中国作战，而是与李鸿章一人作战。此话虽有些过头，但也近于情理。看行政大员，只知道自守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认为中日战争就是直隶省或满洲的事，所以没看到他们出点粮食或出点兵力来救急吧？即使有，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有最可笑的，舰队在刘公岛投降时，当事人还写信给日军，请求放还广丙舰，说此舰属于广东，这次战役与广东无关等语。别国人听说，无不感觉可笑。他们不知，这话实际代表了各省封疆大吏各自为政的思想。就此意义讲，日本的确在与李鸿章一人作战。以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李合肥啊李合肥，虽败也荣了。

从此，李鸿章军事上的声誉消失，外交上的困难又开始了。

读后感悟

1．作者历数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12宗罪过，但同时又考虑到整个朝廷和军队的腐败，所以战败的责任不应归咎于李鸿章一人。

2．中国虽然战败，但李鸿章所辖的海军和淮军，在整个战争中还是表现得最为英勇壮烈，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至少我们可以说，李鸿章所辖的军队，风气还是正一些，腐败还是少一些，还是敢于并能够打硬仗的。

3．李鸿章及其军队纵然再英勇，但面对其他官军缺乏战斗力，面对其他各省大员各自为政，面对满朝腐败的局面和形势，又能怎样？只能是徒劳空叹，难以挽救大局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日本全国上下，团结齐心，所以说，李鸿章是一人在和整个日本作战，怎么可能战胜呢？

第七章　东方俾斯麦——外交家李鸿章

天津教案，显外交手段

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很大声誉，因为外交，李鸿章在国内受到严重的诽谤，也是因为外交。简单说，李鸿章的一生，就是外交的一生。所以要论其功罪，必须把他的外交生涯特别叙述。

李鸿章所办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就是天津教案。当时刚平定完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内忧刚除。突然又发生天津百姓杀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一事（同治九年即1870年）。法国人借此要挟，联合英、美两国威逼清政府。

曾国藩刚就任直隶总督，他深知中国一方理亏，但各国得理不饶人，提出要求太过分，随便不能应付解决。于是委婉地与之周旋，镇压天津百姓，处死了8人，20多人被依法治罪。但法国人还不满意，还要巨额赔偿，要求给天津知府、知县治罪。

此时，曾国藩应付这些外国人已很疲惫，还遭到朝廷内部顽固党的攻击，说他是卖国贼，弹劾他的奏章纷纷扬扬，恨不得要杀了他似的。通商大臣崇厚，怕事情闹大，就奏请皇上罢免曾国藩，让李鸿章代替他。

圣旨下来，让李鸿章到天津赴任。这是李鸿章外交生涯的开始，时为同治九年八月。

那时的李鸿章，是天之骄子，事业一帆风顺，可谓一日千里，忽接此任，似乎上天又安排他这一位置，以成就更大功名。



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刚任直隶总督，普法战争就爆发了。法国人匆忙回国自救，无暇顾及其他。欧美各国也开始奔走相顾，忙得不可开交，去研究解决西方的大问题，天津的这点小事，几乎没人理会了。于是天津教案，就此不了了之。当时的中国人，没人了解世界大势，对普法战争也熟视无睹，还以为是李鸿章的作用呢，都认为他比曾国藩高明。于是，李鸿章的身价猛增。

天津教案后，中日开战前，李鸿章办理的涉外事务有十几起。最重要的，就是法国安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

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在越南挑衅，对我国虎视眈眈，想得到更大利益。本来两国之间早有约定，但法国为挑起事端，撕毁条约，于是中法开战。

法国水师提督格鲁比，计划着先由海军夺取海南，再占据台湾，然后直捣福州，歼灭驻在那里的中国海军；让法国陆军从越南的东京出发，进攻云南和贵州。如此水陆进攻，必将大获全胜，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就可和英国相匹敌了。

于是，格鲁比一面电报本国，要求提供军需物资，增派军队；一面趁福州没有防备，炮轰我船厂，破坏我兵船；一面派法国陆军进迫越南东京。

当时的中国南方，可说是风云惨淡，笼罩着战争的阴霾。为此，李

鸿章实行软硬兼施的政策，让英国和德国牵制法国。当时，曾纪泽刚担任驻英公使，就办理此事，虽然没成功，但法国因为顾忌英国，往中国增加兵力和军费的方案在议会遭到否决。

格鲁比正攻打台湾淡水，越南的陆军又被黑旗军所阻挡，使他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忽又接到方案被否决的报告，差点气死。于是，法国先向我国提出议和。经过此番中法交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开始被欧洲人所关注。

读后感悟

1．李鸿章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都与曾国藩有着密切的关系。就任直隶总督也是如此，他接替年迈的曾国藩，义不容辞地接手天津教案。似乎上天也格外眷顾他，对于别人这是棘手的事情，而对于他，则是对自己潜力的发掘——他的外交才能由此脱颖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真是李鸿章生命中的贵人啊！

2．虽然，作者认为天津教案的顺利解决有时机和侥幸的成分，但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才能确实由此显现，并从此走上外交之路。

3．在对待法国的问题上，李鸿章以夷制夷，以英国和德国来牵制法国，迫使法国就犯，显示出他软硬兼施的外交智慧，也因此引起国外对他的关注。

4．据说在天津教案中，外国人要求对知府、知县给予解职的处罚，以对20多位死亡的外国人负责，但李鸿章委婉回绝说：如果死者中有领事，那就对官员即行解职；如果死的仅仅是外国传教士和商人，那么解职就过于严重了。可见李鸿章的斡旋智慧。

马关谈判，一生至痛

法国的事刚平息，朝鲜又发生了袭击日本领事馆的事件，中国及朝鲜的部队准备行动。

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为了实现独立自主，长期以来和中日两国抗争。纠纷还没解决，日本趁我国处于多事之秋，派伊藤博文来天津交涉。

伊藤博文刚到天津时，法国已向中国请求讲和，此时的李鸿章，正有些得意——因为凶残的法国，都对自己俯首求和了，一个小小日本，还能做出什么事来？所以，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态度就未免傲慢些。后来，伊藤博文在与张荫桓、邵友濂议和时，曾私下对伍廷芳说，以前在天津见李鸿章，他那威严不可犯的神情，至今想来，还心有余悸。这也是他得意时渲泄一下自己曾经的不满情绪吧。

伊藤博文的这次天津之行，没能达到目的，只签了个约定：如果有

一天朝鲜发生战事，甲国派兵，必须知会乙国。即《天津条约》。

虽如此，这个条约日后还是成了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失策，前面已经说过。正因此，《天津条约》转为《马关条约》。

唉！庄子曾说：“开始时很小，结果往往变成巨大。”擅长棋艺的人，就是闲暇也不会放下。后来人不能不慎重。

中日战争打到甲午年冬天，中国除了讲和，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正月，中方派张荫桓、邵友濂去日本讲和。日本以这二人地位低，说话没分量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派李鸿章前往。

二月，李鸿章启程，伴同的参赞有李经方等人，二十四日抵达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第二天，双方先讨论停战条件，日本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3处为抵押。双方讨论很长时间，互不相让。于是先搁置停战条件的讨论，直接进入议和。伊藤博文说：“这样，你们必须撤回停战协议，以后不能再提。”双方磋商，一时无果。



签订《马关条约》

到二十八日开完第三次会议，李鸿章在回宾馆的路上突然遇刺，刺客一枪击中他的左颧骨，子弹射进左眼下面，李鸿章一下子晕死过去。



李鸿章遇刺血衣

日方闻讯后，纷纷前来探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也亲自慰问，恭敬致歉，神色忧虑。日本天皇及人民也深表同情，于是同意在中国提出的停战协议上签字。谈判中靠口舌不能争取到的，靠这一颗子弹得到了。

李鸿章遇刺时，日本天皇派御医、军医来为他看病，医生说要取出子弹，伤才能好，还需要静养些日子，不宜再劳神。李鸿章慷慨说："国家现在举步维艰，促成和约刻不容缓，我怎能拖延时间误了国家大事呢？"拒绝取出子弹。

遇刺第二天，有人看见李鸿章的鲜血沾满官袍，说："这就是报国之血啊。"李鸿章潸然泪下："倘若我丢了性命而有利于国家，我在所不辞。"他慷慨忠愤的报国气概，令人起敬。

李鸿章遇刺后，朝廷下旨让他养伤，让李经方全权代理谈判，但实际还是由李鸿章决策。虽受伤严重，必须卧床疗养，但他还是口授机宜，令医生们为之担忧。

三月初七，伊藤博文等人把拟定的和约底稿送来。十一日，李鸿章准备答复，将条约分为四款：一、朝鲜自主，二、割让土地，三、赔偿军费，四、通商权利。除第一条外，其余都极力驳回。十五日，又另拟和约送到日本方面，就是请求赔偿军费1亿两白银，割让奉天南部四厅县等地，日方也驳回。十六日，伊藤博文等送来改过的底稿，要求稍减轻些，这就是《马关条约》大体内容。

这天，李鸿章的创伤痊愈，到春帆楼和日方全权大臣面谈。反复磋商，丝毫不让步。日本方面只好发表声明，如果3年内还清欠款，就免去利息，减少一半威海卫的驻军费用。现将条约摘录如下：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和约，使两国及其臣民重修于好，共享幸福，并且杜绝将来可能的纠纷事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彼此检查了上面所下达的谕旨和任务，认定都准确无误，一起谈判商定了和约条款，列出于下：

第一款　中国承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所以凡是所有有损独立自主国体的行为，如朝鲜向中国的进贡和上拜的礼仪，以后全部废除。

第二款　中国将下列地方的管理权，以及这些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工厂、以及一切公共设施，都永远转让给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的奉天省南部地区，从鸭绿江口，上溯此江到达安平河口，再从此河口，到凤凰城、海城及营口为止。折线以南地区，所有城市、乡镇，都包括在所划界线之内。该线抵达营口的辽河后，就顺流到海口停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奉天所属的各个岛屿，也都在割让的范围之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治东经119度起，到120度止，北纬23度起，到北纬24度之间的各岛屿。

第三款　上一款所记述的，以及附加在本条约后的地图，所划定的疆界，等本条约批准互换后，两国应各选派两名以上官员，作为共同划定疆界的委员，实地勘察，确定该划的界线。如果遇到条约所定的疆界，在地形或是治理上，有所阻碍和不便实行的情况，各方委员们，可根据实情，妥当研究决定。双方委员，应当从速办理此疆界事务，委员赴任后，限定一年内完成。但如果遇到双方委员，对划界有所更改，又并未经两国政府认准同意之前，应当以本约所定的划界为准。

第四款　中国将国库白银二亿两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该款分为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为六次，逐年交纳，方法如下：第一次平分逐年之款，在两年内交清，第二次在三年内交清，第三次在四年内交清，第四次在五年内交清，第五次在六年内交清，第六次在七年内交清。年度划分以本条约批准互换以后开始算起。第一次赔款交清后，还没交的赔款，应按年份加上每年百分之五的利息。但无论何时，应将赔款或一次性交清，还是分成几次，都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如果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部交清，除了将已付的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到两年半，在应付本金中扣除外，其余的全部免除利息。

第五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以后，限在两年之内，日本允许中国割让地内的中

国人民迁出居住，随便变卖自己所拥有的所有产业，搬出割让地之外。但如果两年期限结束，还没搬出的，都将被视为日本的国民。又台湾省，应在本条约批准互换后，两国都要立即派出官员到台湾，限期在本条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完毕。

第六款　中日两国之前所定各种条约，因此次甲午战争，都自行废除。中国约定在本条约批准互换后，立即派出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的全权大臣，一起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本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在此新订约章还没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的官吏、臣民，以及商业、工业、海陆交通、通商等，都享受最惠国待遇，所有礼遇和照顾，一律不能与别国有差异。中国答应将下列所让给日本的各项，在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之日起，在六个月后，立即照办。

第一，除现今中国已开通的通商口岸之外，应添设以下各处，作为通商口岸，以方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居，从事商业、工业制造。所有新添设的口岸，均按照以往通商口岸的相关规定，或已有的内地市镇的相关章程，一样办理。所有应得的优惠和利益等，也要一律享受。这些通商口岸是：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可以派遣领事到各开放口岸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可以驶入下列各口岸，搭载行人，装卸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上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在中日两国还没经过商定行船章程以前，在以上各口岸行船，都务必依照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办理。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的货物，自己生产的，或是将进口货物，在运往中国内地时，要想暂时存货，除了不用缴税和被摊派的一切费用外，可以暂时租赁客栈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和城镇，随便从事各项工业制造，还可以将各项机器，随便装运进口，只交纳所规定的进口税即可。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的一切货物，其在中国内地的运输税、营业税及各种摊派的杂费，以及在中国内地客栈寄存货物等，都按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货物，一体办理。至于应享受的优待豁免，也无不相同。之后如果有因为以上事情而应增加些规定章程的，就载入本条款所称的“行船通商条约”之内。

第七款　现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应在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必须按照条约的第二款所规定的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条约内所订的条款，允许日本军队暂时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在中国将本条约所订的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也经批准互换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余款和利息的抵押，日本此时应撤回部队。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确定抵押办法，那么在没有交清最后一次赔款之前，日本仍然不会撤回部队。但通商行船约

章在没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了赔款，日本仍可以不撤回部队。

第九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各自手中的所有俘虏，都全部放还。中国对于日本交还的俘虏，不加以虐待，或对其治罪。中国将逮捕的认为是军事间谍的日本人，全部释放。并答应对在这次战争中，所有与日本军队有关的中国臣民，予以宽待，不得让有关部门擅自逮捕。

第十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双方应按兵停战。

第十一款　本条约奉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

看李鸿章这次议和，就像春秋时齐国的佐出使晋国，1870年法国的迪亚士出使普鲁士。在别国军队大兵压境时，只好说出忍气吞声的话，此情此景让人看了心酸，更何况是身处其境的李鸿章呢！

回想十年前在天津签订《天津条约》时的意气风发，如昨天的梦境！唉！千年之龙落入井中，蚂蚁把人困住，年老的千里马趴在马厩，被劣马耻笑，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让人无奈气短吗？

当时，纵有苏秦、张仪的辩才，也没用武之地；纵有贲、育的勇力，也不能施展。除了低声下气地乞怜，还有什么办法？有人把和谈迅速成功当成李鸿章的功劳，这是不对的。即使没有李鸿章，日本方面也照样议和；有人把责任都归于李鸿章一人，视他为秦桧、张邦昌一类人。却不想如果把自己放到李鸿章的位置，那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简单说，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无功也无罪。他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外交手段无处施展。平心而论，李鸿章的误国行为，主要在前面说的12宗罪，这次和谈，不过是其结果罢了，不必多说。

读后感悟

1．李鸿章在与日本签订《天津条约》时，刚在外交上打败法国，正是心高气傲时，所以面对日本的伊藤博文，当然就庄严高傲些。伊藤博文作为小日本，面对天朝大国的重臣，当然就心虚气短些。李鸿章创立的中国海军也是亚洲一流的，谁又能想到会有后来的甲午战败呢？

2．外交使臣的尊严和面子，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面子。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较量，实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较量，今非昔比，面对马关签约时的尴尬处境，李鸿章不再有当年的意气风发，他内心的苦楚又有几人知道？

3．《马关条约》是在中国战败的情形下签订的，中国请求人家停战，李鸿章自然气短，高傲不再，但纵使在遇刺受伤后，李鸿章那种不轻易低头的尊严，也足以代表天朝帝国的尊严，而他那种为了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的慷慨忠义，令

人肃然起敬。

4．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自然是中国的屈辱，但责任不全在李鸿章，如果我们了解到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签订的条约，了解到他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就会感同身受，不会再对他冠以“卖国贼”的称呼了。

5．作者理解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的无奈和苦衷，说明这是时势所逼，不是他一人之错，也不是他一人能扭转的。所以说他此次谈判无功也无罪，而那些攻击李鸿章为秦桧的言论，更是无稽之谈。如果说李鸿章有罪，也是他之前的决策失误。

辽东紧张，中俄密约

19世纪末，中东革命爆发，犹如18世纪末爆发法国革命。法国革命创建了19世纪的欧洲，中东革命开创了20世纪的亚洲。譬如红日将升，雄鸡先唱；风雨欲来，月晕先起，有识之士早有预知。

中日战争以前，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不过是传教和通商而已。到战后几年间，东西方关系紧密了好多倍。到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与欧洲同体相连，想分也分不开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半由于中国内政失策，一半由于外交失策。爱国人士们如果看看中国十年来的中外交涉史，令人泪下沾襟。

甲午战争前，中国请英、俄来调停，实质成为别国干涉我内政的开端。当时日本多次说，东方之事，希望由我们两个国家来处理，不要让别国参与进来。但当时我国政府积怨已久，不能忍受，就想利用西洋人的武力来威胁日本。俄国公使答应出力帮助，现在还不是时候。可见俄国已经是处心积虑，只待时机成熟就行动，早有预谋的。

1895年3月，李鸿章要出使日本，走之前与各国公使会谈。俄国公使喀希尼说：“俄国有强大力量可抵抗日本，保全中国，但中国要在军防和铁路上给予俄国便利，以作为回报。”李鸿章和喀希尼在俄国使馆密商了好几个日夜。欧洲力量的向东发展，就此埋下种子。

当时，中国想借助欧洲的力量来抵抗日本，不只李鸿章一人，还有更厉害的，如当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曾发电反对议和，说：“如果把贿赂日本的钱转给俄国，那损失不到一半，就可转败为胜。恳请总理衙门及出使大臣，与俄国订约，如果俄国肯帮我攻日本，威胁日本废除全部和约，就可商量划分出一块新疆的土地给俄国作为报酬，答应与俄国开展商务活动。如英国肯帮我们，报酬也一样……等等。”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外交家，其眼光手段，就是这样，令人感叹。

《马关条约》签订不到一个月，俄国就与德国、法国合议，逼日本交还我辽东半岛。俄国帮我国要回辽东，不是为我国着想，而是为自己着想——他们想以此地为势力范围，预谋已久了，所以他们不希望日本插手，坏了自己的好事，于是唆使我国用3000万两白银代替他们从日本人手中买下辽东半岛，先施给我国一个恩情，然后慢慢收回。俄国人的外交手段，真不可思议。李鸿章的误国之罪，这个最大。这实在是他外交上的一大失败。

买回辽东半岛后，喀希尼就要求将之前和李鸿章秘约的事，以公文形式向总理衙门提请实现。此事一经公布，造成轩然大波，皇上大怒，李鸿章被罢职，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俄国暂时延缓此要求，等待时机。

1896年春，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加冕，各国派公使前去祝贺。中国也按惯例，要派王之春去朝贺。喀希尼抗议道："皇帝加冕，是俄国最重要的礼仪活动，充当朝贺使臣的，必须是中国最著名、在各国有广泛影响的才可以。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以当此任。只有李鸿章能胜任。"于是，朝廷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又贿赂慈禧太后，威逼利诱，说还辽之事，必须有报酬，请求让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来办理此事。李鸿章临走前，太后召见他，谈了有半天，联俄的密谋，就此敲定。

李鸿章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后，开始和俄国方面商议喀希尼事先拟定的草稿。到俄皇加冕之日时，双方才议定画押。开始讨论条约时，俄国人为避人眼目，不用外交大臣和李鸿章谈判，而是让户部大臣办理。就这样，在各国使臣前来道贺的盛大典礼时，俄国来这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一手。这样一件关系全球局势的大事，几天内，就在觥筹交错中搞定了。俄国人在外交上的彪悍，令人可佩可怕。时为1896年4月。

此次密约，极为保密，除中俄两国的几个当事人外，无一人知道。但上海的《字林西报》，竟在李鸿章还没回国时，得到密约的原文，翻译登报。据说是花重金从俄国宫庭内监手中买下的。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之前，即在中日战争之后，受大俄罗斯国大皇帝仗义相帮，并愿将两国边疆及通商等事宜，对两国彼此有益的，妥当商议，以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因此特派大清国钦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作为全权大臣，会同大俄罗斯国钦差出使中国全权大臣一等伯爵喀希尼，在北京商定条约，将中国东三省的火车道

连接俄国西伯利亚省的火车道，以促进两国通商往来的迅速，及坚固沿海的边防，并议定专项条款来答谢俄国替我国要还辽东半岛的情义。

第一条　近来因俄国西伯利亚的火车道即将完工，中国允许俄国将这一火车道由俄国的海参崴延长修建到中国的吉林珲春城，又向西北延续到吉林省城为止。另外，允许俄国将境内某城市的火车站延续修建到中国黑龙江的瑷珲城，又向西北延续到齐齐哈尔省城，又延续到吉林伯都讷，再往东延续到吉林省城为止。

第二条　凡是延续建造到中国黑龙江及吉林的各条火车道，都由俄国自行筹集资本建造，其铁道的一切章程，也均按照俄国的铁路规章制度执行，中国不能参与意见。至于管理权，也暂时均由俄国管理，以三十年为期限。期满后，准许中国筹集资金估价将该火车道并一切火车、机器厂房等赎回。只是如何赎法，以后再行商定。

第三条　中国现有的火车道，计划从山海关延续修建到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续到吉林的这条线路。如果中国日后不便立即修建此铁路，准许俄国筹资由吉林城代替修建，以十年为期限赎回。至于铁路应从哪条路开始建起，都按照中国已勘定的道路接续到盛京和牛庄等地为止。

第四条　中国计划修建的铁路，从奉天到山海关、到牛庄、到盖平、到金州、旅顺口及至大连湾等地方，均应依照俄国的铁路轨道，为中俄两国彼此往来和通商提供便利。

第五条　以上俄国自己修建的铁路所经过的中国各地方，应得到中国文武官员的照常保护，并应优待铁路各站的俄国文武官员，以及一切工匠人员等。只因该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多半是荒凉偏僻的地方，恐怕中国官员不能随时提供周详的保护，所以应准许俄国专门派遣几支骑兵和步兵驻扎在铁路各主要站点，以妥当保护商务往来。

第六条　自各条铁路修建完成后，两国彼此进出口的货物，其纳税章程，都按照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陆路通商条约来缴纳。

第七条　黑龙江及吉林长白山等处所生产的五金等矿产，向来有禁忌，不准开挖。自这个条约签订之后，准许俄国人及本国商民随时开发，只是必须提前禀报中国地方官，开具许可证，并按照中国内地矿务章程，才准许开挖。

第八条　东三省虽有新式练军，但大多数军营还是按照古老的制度和方法训练。如果日后中国想把东三省的军队改由西式方法训练，准许向俄国借请熟悉军务的军官来中国整顿一切，其章程与两江总督所聘请的德国军官的管理办法一样。

第九条　俄国向来在亚洲没有全年不结冻的港口，一旦亚洲有军务，俄国在东海及太平洋的海军行动有诸多不便，不能随时航行。有鉴于此，中国情愿将山东省的胶州地区暂时租给俄国，以十五年为期限。俄国所建造的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准许中国在期满后估价筹资买下来。但如果没有军事方面的紧急

情况，俄国不能在那里屯兵占据，以免引起别国嫌疑。其租赁的款项的办理办法，日后另有附加条款酌情商议。

第十条　辽东的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处地方，历来就是险要的军事据点，中国应迅速行动，整顿军防等事宜，以及修理各要塞炮台等诸事，以防不测。此条约定立之后，俄国承诺将此二处互相保护，不准别的国家侵犯。中国承诺，将来永远不能让与别的国家占据。只是日后俄国如有军务，中国准许将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处地方，暂时让给俄国水陆军营停泊屯集，以方便俄国进攻防守。

第十一条　旅顺口、大连湾等处地方，如果俄国没有紧急军备，就由中国自行管理，与俄国无关。只有东三省的铁道，以及开挖的五金矿诸事务，准许在换约后立即便宜行事。俄国文武官员及商民等所到之处，中国官员应格外优待保护，不能阻挡他们游历各个地方。

第十二条　此条约经两国皇帝御笔批准后，各自按照条约执行。除有关旅顺口、大连湾及胶州诸条款外，全部通知各地方官遵照执行。将来换约，应在何处，另行商议。从签字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限。

《中俄密约》以后，局面就不同以前了。近年来，外国列强在中国索取利益，用的都是新方法：一是租借土地；二是某地不许让给其他国家；三是替中国修建铁路。这些都是由《中俄密约》开始的。

《中俄密约》的第九条租借胶州湾，为之后租借胶州、威海、广州、旅顺、大连开了头。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借给其他国家，成为以后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开始。在东北修建铁路，也是在断送这块清朝祖宗的发祥地，加速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一开始即挑起各国为利益而纷争，不用多说了。唉！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把全国的“铁”聚在一起，也不能“铸”成如此大错，在这件事上，我无法原谅李鸿章。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有人说，这个密约由慈禧太后做主签订的，督办军务的王大臣也是协助支持的，并非李鸿章的本意。虽如此，莫斯科的草稿，不是出于李鸿章之手吗？

自从条约被登报后，各国报社，电报书信往来，半信半疑，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无不震惊失色。李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纷纷问及此事，李鸿章一味支吾应付。当年七月，在莫斯科签字后的草纸传到北京，喀希尼就拿着它与总理衙门交涉。我国皇上和总理衙门竟不知道有此事，惊怒异常，坚决不答应。喀希尼贿赂慈禧太后，软硬兼施。太后责备皇上，命令交由督办军务的大臣办理，不经过总理衙门。公元1896年9月30日，皇上流着泪批准了密约。

读后感悟

1．对于李鸿章来说，无论是中日开战请英国和俄国来调停，还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与俄国秘密签约，最初都是想利用外国的力量来牵制敌国，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也暴露了在无法自立自强情况下依赖他人的无奈和愚蠢，致使外国列强乘虚而入，留下无穷后患，不能不说是李鸿章外交上的一大失策。

2．应该说李鸿章看到了当时的世界形势，看到了中国的劣势，想以夷制夷，让各国列强们自己斗去，但没料到失去主见，就会失去主权。别国不可能义务为你服务。李鸿章的这种外交手段虽是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但也暴露了其软弱和短见，没有预见到其危险的后果。

3．在没有通知皇上和朝中各大臣的情况下，李鸿章只在太后的单方面授意下与俄国秘密签订条约，让全国上下都感觉到一种被蒙蔽的屈辱和义愤。这应该是李鸿章外交史上最不道德光明的事了。无论当时出于什么原因，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都让人无法理解和原谅。

访欧风采，应对列强纷争

李鸿章到俄国祝贺沙皇加冕，并游历欧洲，这都是外交上的正常交往。如果说有什么对外交涉，那就是签订中俄密约，商议增税这两件事而已。中国旧税法规定，凡是进口货物，要按5%的税率收税。这次因为赔款，要把税率增加到7.5%。

李鸿章先与俄国商议，俄国同意。再与德国、法国商议，德、法说等待英国的意见。李鸿章到了英国，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起此事。当时中英关系正处于低谷，而且因《中俄密约》，英国对李鸿章的用心不信任，沙士勃雷就借口与上海的英国商人商量一下，委婉拒绝。增税事就没能成功。



李鸿章出访西洋

李鸿章游历欧洲，各国对他都很客气，德国表现最积极，他们以为李鸿章此行定会购买大量军火武器，以及能得到通商方面的种种优惠待遇呢，于是热烈欢迎李鸿章。但李鸿章什么也不买，令德国人大失所望。李鸿章到德国拜访了俾斯麦，到英国拜访了格兰斯顿，都相见甚欢，他们都是19世纪世界级的巨人。

八月，李鸿章从美洲回国。九月十八日，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此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实际是李鸿章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时期。期间，德国占据胶州，俄国占据旅顺口、大连湾，英国占据威海卫、九龙，法国占据广州湾，实际上，此时也是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的时期。

要回辽东，最初是俄国提议，德国和法国赞同支持的。俄国与中国签订密约后，在中国北方得到很多利益，正是踌躇满志时。法国也在光绪二十二年春夏之交，得到云南、缅甸、越南三国交界处的瓯脱地区，又得到广西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只有德国毫无所得。光绪二十三年春，德国向总理衙门索要福建的金门岛，遭到拒绝。于是，十月，胶州事件就发生了。

这次事件中，德国人的蛮横无礼，有目共睹。虽如此，中国的外交官们也难辞其咎。如果最初就不依赖外人，也就罢了；既然已经依赖于人，又不能不酬谢人家。能做到一个也不谢，也就算了；既然酬谢了甲、乙，那么对丙也应有所酬答。

三个国家帮助要回了辽东半岛，只有德国没得到回报，怎会不生气，不闹事？而且，《中俄密约》中说，胶州湾租借给俄国人，这样俄国的权利不只在东三省，而且直接侵入山东。在当今各国列强竞争的优胜劣汰时代，别的国家能不嫉妒吗？所以德国无理地挑起事端，也是中国造成的。1897年10月，山东爆发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中国人杀死。德国得知后，立即发动兵船，开进胶州湾，拔掉中国旗帜，树起德国旗帜，总兵章高元被抓。

警报传来，总理衙门就和德国公使商议。德国公使海靖恐吓中国，对哀求和委婉沟通，一概不理会。想向别国乞求援助，但没一个国家仗义为中国说句公道话。拖了两个多月，中国只好忍气吞声答应德国的6个要求，就是将胶澳（青岛）附近方圆百里的地区，租借给德国99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都归德国承办，等等。

胶州事刚平，又生一大波澜。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规定如

果3年内能还清赔款，就免除利息，而之前所付的利息，也可还给我国，这样就可省下威海卫驻军的4年军费，一共可节省白银2325万两。现在3年期限将满，政府想了结此事，打算再向外国借款。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俄国人答应借款给我国，但要求在北方各省建铁路，并罢免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听说，立即抗议，也表示借款给中国，利息又少，他们的要求是：一、监督中国的财政；二、从缅甸开通铁路到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给其他国家；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都免除厘金税。

当时总理衙门想答应英国，但俄国、法国极力反对，说如果向英国借款，就是破坏各国均等势力的局面，日本也粗言相威胁，总理衙门的官员苦不堪言。

正月，总理衙门回绝各国，不向任何国家借款了，而和日本商议，想延期20年偿还所欠军费，想以此缓解一下困难。不料日本不答应。

当时真是山穷水尽，进退无路啊！于是，总理衙门通过赫德周旋，向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借款1600万英镑，吃很大亏，才将事情了结。

胶州湾在《中俄密约》中本是被划进去的，现在德国要抢夺到自己手里，俄国本就很气愤，加上英国、德国又阻挠俄国借款给中国，俄国就更加愤怒了。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月之间，俄国又起事端，索要旅顺、大连湾。

李鸿章作为签约人，想办又没法办，想推诿又没法推，最后就和俄国公使巴布罗福又签订一条约：将旅顺、大连湾及其邻近相连的海面，租借给俄国，期限为25年；准许俄国在营口和鸭绿江之间建铁路，直到海边任何地方。

看到俄国占据旅顺、大连，英国就借口保持均等势力，索要威海卫。

当时刚还清日本的赔款，日军刚撤走，英国就援引俄国为例，要租借威海卫，以25年为期，条约按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

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反复辩驳，对方竟斥责他说：“你跟俄国说去，不要和我说；俄国公使同意，我就同意。”李鸿章无言以对，狼狈之极，可怜可叹。如果说还得到点同情的话，就是约定：如果日后中国重建海军，可借用威海卫停泊船只。仅此而已。

到此，中国割地给外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当俄、法、英为借款相冲突时，法国借助俄国的势力，索要广州湾，将此地作为南方的海军

基地。当时英国刚逼迫我国政府开放西江一带通商口岸，想要垄断这一带的商务权利。法国看事情紧急，就仿效德国的伎俩，直接闯入广州湾，而后再谈租借，以99年为期。中国无力抵抗，只好答应。

英国又以势力均等为说法，请求租借九龙湾来抵制法国，期限也是99年。在签字的前一天，李鸿章与英国公使窦纳乐激烈辩论，李鸿章说：“可租借九龙湾，但不能在九龙山上筑炮台。”英国公使愤然拍桌子道：“不要再多说！我国请求租借此地，是因为贵国把广州湾租借给了法国而对我国的香港造成了威胁！如果你能废除广州湾的条约，那我们今天的请求立刻撤回。”李鸿章只有吞声流泪而已。时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到五月，英国与俄国又发生激烈纷争，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起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立了借款条约，规定在次年阳历一月交付第一笔借款。德国占领胶州后，该公司忽然违背条约，称除非改变条约，否则无法提供借款。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商量，重新签订了一个条约。而新约把比利时的公司当成了一个傀儡，实权却在华俄银行的手里。华俄银行实质相当于俄国的政府银行。因为此条约，黄河以北的地区全由俄国控制，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

英国对此十分嫉妒，就提议英国承办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这样就会把俄国的铁路截断。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表示强烈反对，英、俄两国几乎要开战了，形势危急，都把中国政府作为出气筒。

各种难题，都集中在几个外交官的身上。当时皇上亲政不久，百废待兴，皇上痛恨李鸿章联合俄国误了国家大事，七月二十四日，皇上下诏解除了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行走的职务，于是李鸿章外交上的风波暂平，外交官生涯就此结束。

读后感悟

1．李鸿章出访欧洲各国时，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衰落，但作为天朝重臣，李鸿章还是获得优待，风光无限。而且，李鸿章本人也以他特有的外交智慧和魅力，征服了外国人，从而扬名世界。

2．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行走时，是他专门办理外交时，俄、德、法、英，等列强正瓜分中国。当时的中国外患最多，外交事务也最多。应该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李鸿章也在积极寻找着解决的办法，但纵使他有再大能力，很多事情也是他个人难以把控的。他的责任只不过是把损失降到最小而已。

3．此时的李鸿章，在政治舞台上风光无俩，但应该也压力巨大，痛苦万分。风光在他是朝廷重臣，是奔走于国内外的风云人物；痛苦在他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却无力反抗，被迫屈辱地签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人，可能既羡慕他的风光，又忌恨他的“卖国”。这样的结果，也许李鸿章早就料到，或者视若无睹。只是，他有多少苦和累？他是怎么排遣这种巨大的压力？外人却不得而知。

4．皇上无法接受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于是悲愤中罢免了李鸿章的职务，也暂时结束了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满心期望却换来失望？还是辛苦费力却不讨好？试想那情境，无论是皇上，还是李鸿章，应当是五味杂陈般的痛苦难受吧？

我恨我怜李鸿章

西洋人说李鸿章是有手段的外交家，又说他是惯用小伎俩的外交家。

手段狡猾，并不能说明外交家品德恶劣。世界各国并立，有生存就有竞争，所以只有唯利是图。西方哲人曾说：个人要有道德，而国家可以没道德。试看各国的大外交家们，哪个不是以狡猾而出名呢？

虽然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是一流的，但要放在整个世界，就排在后头了。李鸿章的手段就是，联合某个国家牵制另一个国家。而所谓的联合，也并非平时友好，不过是临时唆使利用人家，这里有《战国策》的思想。看他在法越战争中的做法，就是唆使英国、德国来牵制法国；在中日战争中，唆使俄国、英国牵制日本；在胶州湾一战中，唆使俄国、英国、法国牵制德国，最终没一个有效，却因此失去更多。割让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等，都是这个策略的结果。所以说，天下没有依赖别人而能生存的。

西方的外交家，也曾积极地与别国结成联盟，但前提一定要在自立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压制别人而不是受制于人。现在中国所谓的联合别国，不管人家是否想联合，即使想，跟做人家的奴隶没什么区别，被人鱼肉而已。

李鸿章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没办法而已。总之，不修内政，外交也难维持。以中国现在的实力，即使有外交才能高过李鸿章十倍的人，也只能隐忍迁就。也因此我又同情李鸿章。我看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主要体现在《中俄密约》上，却造成不少严重的后果。真是自作自受，所以我又不想同情他。

读后感悟

1．西洋人评价李鸿章惯用外交手段，而梁氏认为他所谓的外交手段就是借用一国来牵制另一国，但是依靠别人是没有出路的，别人也不是白白依靠的，前提是必须独立自强，否则只能受制于人，失去自我。这是李鸿章的糊涂处，也许是他的无奈处，但他又何必解释？那不是李鸿章的性格。

2．作者认为李鸿章的利用别国的所谓外交手段，结果只能是自作自受，自欺欺人而已。主要体现在《中俄密约》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恐怕是他本人都没有想到的，这是李鸿章用手段，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也因此他广受诟病。

3．李鸿章眼光开放，思想开明，他的外交手段，应该也是他审时度势后的权宜之计，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那么简单——面对形势，也许他只能如此。所以，作者在指责李鸿章自作自受的同时，又对他予以理解和同情，同时指出他背不起全部的罪。

第八章　闲来自有忙——赋闲时的李鸿章

监理河防也不凡

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二十七年，40年中，李鸿章都处在重要位置上。对他来说，所谓清闲的时候，也就是1895年3月到1896年3月这一年，以及1898年8月到1900年8月这两年时间而已。

1898年到1900年间，李鸿章奉命治理黄河，不久就任商务大臣、两广总督，对别人来说，这差事很不错了，但纵观李鸿章的一生，这只能算是他的闲职了。最清闲的，就是1895和1896年间在内阁办事，以及1898年8月到11月退出总理衙门，期间没什么可说的。至于他治理黄河，总督两广，其工作方法也和常人不同。本章说一下，也是史家的责任。



李鸿章和儿孙们

中国的黄河，有名的难治理。历来的政治家，都把治理黄河作为一大问题。如果不用西洋人治理密西西比河的方法来治理，就不能根治。

1898年8月，李鸿章正闲着，于是朝廷就让他治理黄河，于是，李鸿章在治黄史上也加上了小小一笔。现将他任用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勘探黄河的奏折抄录如下：

一、雒口至盐窝沿河情况

河身问题。黄河在河南龙门口改道后，急转直下，由北向东，直入山东，入大清河，汇入大海。黄河河流一开始就东奔西突，人力难治。只能等两年后河流位置相对固定了，才可修筑堤岸。因河流曲折，所以堤岸应随之曲折修筑。等河流又变迁了，堤岸却不能随迁。离水远近不同，但堤岸对它全没有保护，任凭水流。现在的小水河面，大约宽九十丈到一百五十丈，深浅不一，有的河面最宽处，水深只有四五尺，不便行船；有的河面忽然又变窄，水深达到三丈。河流早晚变化改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河流所到的堤岸，就被冲刷，被带到水流缓慢处，又淤积河滩。地方官员和百姓也不管，一直以来没好的治理方法，只知道在危险处救一时之急，在决堤处添堵缺漏。常常看到在沿河两岸，大约有四五尺高地方，有塌陷进水的现象。隆冬时节，水流变小流速缓慢，尚且是这个样子，等到开春河水解冻后，汛期来临，水流变大流速迅急时，那该会怎样呢？黄河下游低岸处尚且如此，那上游土山一带，可想而知。难怪黄河泥沙之多，是五大洲众多河流里最多的。

汛期来时，堤内的沙滩被淹没，因河底深浅不一，河身高低不等，所以流速不同。而且下游土地平坦，每里地间的高低差距，不到五寸，水流速度缓慢。能蓄水的地方，日益变得狭隘，淤泥越垫越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因此堤外有的地方，比堤内的河滩，有低一尺的，也有低到七八尺的。我监工路过杨史道口时，曾测量河面，水面宽一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处二丈三尺，流速约为每秒钟四尺。按此计算，每秒钟流过的水量，大约在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容水面积约一万三千六百八十方尺。监工在盐窝上游测量，此处水面宽只有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一丈二尺，容水面积约九千一百八十方尺。此时杨史道口还没合拢，大部分水流通过决口，不进盐窝，这个还可取得一致说法。到河水大涨时，流过的水量，各人说法不一。按照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示的河流报告，杨史道口的容水面积为三万六千一百八十方尺。盐窝的容水面积应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方尺。因水势过猛，流速无法统计，导致无法统计得到准确的水流量。但如果不知道水流量，就必然难以确定河面宽窄、堤岸远近等数据。从雒口到盐窝大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问题。河边的堤坝，称为民埝，由民间修建、政府负责看守的，是现在黄河防水的最重要堤坝。民埝距离河水，远近不同，有筑于河边的，有离河水三四里远的，当时修建时，随意修建的，并没一定之规，甚至堤坝的弯曲程度令人不解。其高低厚薄，各处不同，有高过现在水面九尺的，有高到一丈五尺的，高过沙滩五尺到八尺不等，高过堤外陆地也九尺到一丈五尺不等，其堤坝顶部有宽

二丈四尺的，有宽三丈六尺的，新建筑的堤坝较厚些。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它们的收坡角度也斜直不同，各个不同。看守、维护堤坝也不大周密，被水冲刷的地方很多，但并没及时修理，积年累月，几乎没有不濒于决口塌陷的。堤坝都是用很松软的淤泥修成的，并没焦泥，地基也不深。即使有焦泥的，也很容易被水冲刷出来。堤坝上可行大车、坐车、手车，车辙印痕已很深，过路人要么从堤坝上翻越，要么从堤坝的低处翻越。我们查阅欧美各国的情况，他们在堤坝上种草，不断研究不怕费力，不惜花费巨资，因为草根最能保护堤坝。而我们这里的堤坝，都不种草，只一两处偶尔可见，也被当地百姓割除干净了，甚至连根拔起。据说都是拿了去烧火做饭，或是喂养牲口，却不知没了草根，堤坝就难保了，堤坝难保水患就会接踵而至。愚昧的百姓认识不到这点，他们的行为应得到鄙视。耙草的器具，最能损坏堤坝了，所以应该严令禁止，这也是保护堤坝的一个方法。因为草一旦被铲除，堤坝泥土变松软，大风一吹，堤上尘土飞扬，堤坝顶逐渐变低，堤身也逐渐变薄，这种工具所造成的危害，不也很大吗？沿河的堤岸，种植的柳树已成绿荫，有新栽的，才只有一尺多高。柳树根最能加固堤坝，所以应在沿河堤岸处一律栽植柳树，并设法保护，不准攀折。还可以种植藤，更坚固结实，柳条藤条，还可编织成护堤防水的埽，用来修筑堤岸，比杆秸料要坚固得多，还可就近取材，无需另外出资采买，一举两得，莫不过此，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大堤的问题。大堤，一般为政府修筑，距离民埝很远，远近距离各处不同，而且多弯曲，这也令人不解。现在这种堤坝虽有若无，虽大没用。堤上所住居民鳞次栉比，全成了村落，因取了堤上的土来建筑他们的房屋，致使堤坝残缺不全。而且过路之处，都已被磨得与地面一样平，甚至形成一个巨大缺口。堤坝的坡上，也多半被种上了麦子，很可能损坏堤坝。汛期来临，大水上涨时民埝还会决口，大堤就更没有不崩溃的了。大堤的宽处，其顶部还有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到一丈六尺不等，但完整的很少。听说杨史道口河水冲破民埝，河水竟能流入小清河，淹没了村落，给当地百姓造成危害，是由于大堤的原有缺口没及时修理，致使河水有机可乘。问当地的治河官，为什么不修大堤的缺口呢？他们的回答是，当地居民不愿意，若要修堤，就会有上千个村的百姓群起攻之，等等。可见修筑大堤非但没好处，还涉及民意，对当地民生不利。大堤之外，所住居民很多，有数百的村庄，还有四五家自立门户的，或者筑起围堤以自卫，或者建起高坡而居住，大多目的是用来防水患的。村庄周边的土地，十分肥沃，百姓也用来耕种，用来维持生计。此外还有斜堤拦坝，都是用来保护村庄田地的，然而它们的残缺头部也与大堤相同。如果民埝出现险情，这些都是靠不住的。

险工问题。即危险处的工程。沿河一带，凡水流冲击最厉害的地方，或者已决口之处，都有工程。这些工程都以磨盘和埽等圆柱形的防水工具为主，多数用秸料，上面盖上泥土，一层层地垒起，形状犹如磨盘，有的紧贴在河岸上，有的与堤坝相连，它们的形势各有不同，高低厚薄，每个埽也不同，每埽错落参差，

也互不相连，中间仍然有水通过，以致三面受敌，不知是什么意思。依我之见，各个埽之间应一气呵成，使中间不留缝隙，这样既可省工，又可加固堤坝。而且料埽进入河水中，壁立如削，不会形成斜坡，正好可用来阻挡水流冲击，不让河水流过，但这似乎也不是好办法。至于秸料也不能经久耐用，因为它们中间是空心的，质地如同灯草，最能吸水，使得秸料更容易腐烂，一旦腐烂它们就会与沙土一样，丝毫没有力量了。我监工时曾看到几处旧埽，虽然形势相连，但根基已坏，一旦河水上涨，必然会漂流起来，那百姓修筑的小堤坝必定会遭殃。有人说秸料是当地所生产的，用途广泛又价格低廉，除用此没别的材料可用。果真如我前面所说，多种植藤柳，几年之后，便可足够使用，更无需以巨额资金来建筑这些不能经久耐用的工事。有人又说料埽原本用来引挑水流的，一两年后，水流改道，料埽即使腐烂，也没什么可担忧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如果不改弦更张，恐怕抢险就是养痘遗患了。当今之计，虽然没有别的料可用，但埽的施工模式应先行改变。依傍在河岸的让它们连成一片，修建入水的斜坡，以引导水流，并且必须多使用木桩，将埽牵连在河岸上，以坚固的麻绳挽系好，为护埽所抛的石头，也应加大增多，放置的位置要得法，才能抵御河水冲击的力量。我曾看到有把石块排放在埽上的，镇压着秸料，不让它们被风吹走，这是何等可笑。此外还有石堤，如北镇一带，还可说稳固，而盐窝的石堤，则已经根基空虚了，之所以还没立即坍塌，是依赖有石灰的粘连，但也不能持久了。

二、盐窝到海口尾闾的情况

黄河尾闾已经由盐窝改道三次，首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现在仅将这三处的情形依次介绍一下，还有新挑引的河流一条，也附带介绍。

铁门关海口，这个地方是大清河的末端，黄河改道山东以后，由此入海，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韩家垣决口，河流从东北流向正东。现在铁门关这一水道，前半截已经淤积了很高的淤泥，河身成为平地，不能辨认出来，左右两堤岸，都布满了村落。铁门关以下，堤坝已没有，一片黄沙，土地贫瘠。大约距离铁门关下游八里的地方，河流形状才又重见，有河水直接通入大海。河边的土地，虽是沙滩，但沙子下面不深处，便是混合的泥土。河中的水，平时深度约有两尺，在汛期时可涨到三四尺，可到达萧神庙。如果东北风大作，可增高到五六尺不等。从三沟子起，就可见有船只出海，与烟台相往来。此次因河流冻结地面潮湿，不能出海勘察，只到三沟子以下十里处看看，满地芦苇杂草，是大潮所经之处，就返回来不再向前。据当地人介绍，再往下八里地，就可见海洋的潮汐；再往下十二里，便是海边，海口有拦门沙，退潮时，只有二尺深。此片沙地的面积没再勘测，估计一定不会很小。从盐窝到铁门关，入海口大约有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自韩家垣决口，黄河的末流，在此取道，已经持续八九年了，最近又改道向东南流去。韩家垣一带，已不见黄河踪迹，只有从新萧神庙往下，距离大海约六十里的地方，又看见水流形状，中间也可见有河水，是在最低洼

处，积水不消。听说离大海大约十一里处，这条河分为两溜，形状像燕尾一样，但是也不深。入海口也有拦门沙，当潮水退去时，直接堵塞在入海口处，阻碍了河水泄出。这片拦门沙露出水面，大约二里宽。根据调查，韩家垣一带并未筑堤。从盐窝到韩家垣海口，大约有一百里长。

新挑引河，这条河是在韩家垣决口之后，特别在口门之下，挑挖的一条水道，以便引水到萧神庙旧槽入海。然而当时这条河深只有四五尺，宽只有三丈，现在还没有这个尺寸。这条河的河道弯曲处很多，河道长四十里，如果取直，长度共有二十五里，大概是循着原来的水道挑挖，为节省工费的缘故。在萧神庙和韩家垣两处的河底，挖深三尺，便会有泥土出现，也有显露在地面的泥土。周围各村庄，均有水井，深一丈一尺，就可看到水，泥土在水中，不很深。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的烧窑。此处的土质，大概由此就可看出。

丝网口海口，现在的黄河就是由此口入海，水流散漫在地面上，并没形成明显的河道。大多数时候存水量较少，水也不深，水中央有沙滩，中间的水流处，水深也只有三四尺，有一两处最深，也不过一丈。将近海口时，就只有一尺四五寸，此处水面很宽，大约有三百多丈。听说海口处并没拦门沙，想来因为水流缓慢，河床较浅，沙子都已经淤积在地面上了，没有可流入海里的了。调查北岭决口时，还可见上游有三处开口，所以丝网口的河水流速并不大，北岭子门被水淹没的树，至今仍竖立在水中，还有一座古庙，也是巍然屹立着，它们可作为流速缓慢的明证。如果说辛庄等处，房屋被河水冲走漂流，是因土屋不坚固，不是河水力量的汹涌造成的。在北岭子以下的河流北岸，并没有修筑河堤，只用一个铁门关起南面的堤坝作为北岸，以此来保卫村落而已。南岸则从盐窝开始修筑起了新的堤坝，每个堤坝距离河水大约有二里远，从盐窝到丝网口海口大约九十里。

三、根据实际情况治理黄河

治河犹如治病，必须先找到病根。而要找到病根，就必须先把脉，才知病根在哪里，然后才可对症施治。不仅可治疗重病，而且还能永无后患。但如果只是按疮敷药，不问病毒起因，这不是好医生的做法。黄河在山东引起水患，但病根不在山东。如果只就山东治理黄河，与按疮施药有何区别呢？虽然可一时止住病痛，但不久旧病又会复发。因为病毒没有根除，病根没有拔掉。水性犹如人性，起初本是善良的，如果不对其引导调教，其本性必然会迁移。上天创造了水，原本是用来养育人，何曾是用来害人的呢？因为人不知道它的性格，不注意对它的变化加以防范，使它到处肆虐，成为暴虐的水患，百姓困于水灾，国库为之空虚，却始终不能制止。推究其缘故，就是因为治理水患只在一个小范围内，不从全局来统筹考虑。如此一误再误，恐怕徒劳无功。想要一劳永逸，应先找到根本原因。

从山东来看黄河，那黄河只在山东。从整个中国来看黄河，那黄河还有不在山东境内的。怎么就知道黄河在山东的水患，不是从别处的黄河引发的呢？所以就全国范围来治理黄河，黄河水患才可根治；如果就山东本地来治黄河，那黄河

的治理永远是个难题。请允许我详细道来。

上溯黄河源头，它源于星宿海，然后聚首甘肃，流入蒙古沙漠，中间改道多次，开始到达山西，这时已挟带流沙了；等黄河流出陕西，和渭水汇合，水质变得更加浑浊；然后再穿过土山东流，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到之处，随处流散，水质更加浑浊。这就是黄河的病根所在。下游的病就源于此，所以主治应先在病根上考虑。因为下游淤积的泥沙，都是从上游拖带而来的。上游地势高，形势犹如高大建筑上仰盖的瓦，而且两面有山约束，水流极快，泥沙不能停驻，等到一过了荣泽一带，地处平原，水势逐渐变缓，泥沙自然停积下来，泥沙停积造成河流淤泥，淤泥过高，河水开始改道，很自然的道理。以往情形，都可为证。只要有一条河流改道，百姓就要遭殃，只好逃难，奔波迁徙于沟壑之间，被饥寒所迫，往往死于非命，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次这样的灾祸了。而黄河南迁北转，为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行开辟了一条半径之路，在扬子江北部大约一千五百里宽的扇形地带，任意穿越，即使是齐鲁的各大山峰，也难以阻挡抵制它。河水所经过的地方，泥沙聚积，河滩形成，百姓为之所困，防不胜防，到今天还没有好对策。只好补缺漏洞，救一时之急，劳民伤财，这种灾难比起瘟疫和战争更猛烈。然而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水患，虽然并非易事，但并非人力不能解决。那么怎么办呢？回答是，向数学学习。

说到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法，当然不那么容易！黄河漫延于中国境内，共计有一万多里长。地势的高低，河流的曲直，水性的缓急，含泥沙的多少，并没一个详细的考察，也并没有图表可说明。问黄河边的居民，也没人能答上来。现在要想治理，应先办理的事情有三方面：一、测量整个黄河的形势。河身的宽窄深浅，堤岸的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的深浅，都必须详细记录下来；二、测绘河图，一定要详细，丝毫不能有遗漏；三、划分河段，派人查看不同河段的水性，比较测量水力大小，记载到水志上，勘探泥沙量，并随时查验水力大小，停积的泥沙量。凡是水性和沙性，偶尔有所变化迁徙，必须要详细记录，以作为治河的参考资料。以上三件事情，都要求精细，而且最关键，不如此，就不能了解水性，不能决定应做的工作，没办法疏导黄河的水流，无法预防河水的上涨，没办法防患于未然。这三件事不办，所有的工程，最终难以见效，即使能稍微缓解一下目前的紧急情况，不久就会水患重来，前功尽弃。如果测绘详细，反复考究检查，把握全局，便可讨论研究出该进行的工程项目，以此谋划出功在未来的蓝图。另外还需要流经各省的黄河，有一个统一治理的官员来领导。才能使黄河的各河段一律得到统筹保护，永绝后患。但照此办理，要耗费一笔很大的资金。然而要想一劳永逸，就应先筹划计算每年的治河费用，堵漏修筑堤坝的费用，蠲免钱粮的费用，赈济灾民的抚恤费用，财产淹没的费用，百姓受灾死亡多少，加上解除弊端后能收多少利益，累积若干年共计多少，相比所耗费的资金，哪个轻哪个重，哪里有损失，哪里有收益，如此才不至于决策犹豫。

按图志中所示，可知某处的水性和地势，从而确定这一段黄河的河身。由河

身，可限定水流的速度，不让它变更，水面的高低，也不让它随意涨落。凡是河底的深浅，河岸的坚脆，工料的松固，都可确定下来，不必担忧发生意外。这都是算术中的精微之处，不能主观臆测。确定河身是最难的事情。必须知道河水大涨时水高出多少，水性如何，停积在河底和河滩的泥沙有多少，河水上涨的高低，流速都不相同。确定河身必须了解速率变化的区间，才能使河水无论涨多高，其速率都足以把沙子冲流到海中。由于河形弯曲，以致造成不少危险的工事，这个也要酌情改选，然而不是件容易的事，不经详细谨慎的推算不能奏效。裁弯取直，可让河水走捷径，路途短河水落差变大，地势高低的差距就增大。落差增大则流速也增大，流速增大则水流量也增大，在河水大涨时，尤其应该把上下游统一进行推算后，才能裁去河身的一个弯曲处。因为裁截河身的弯曲处，可能会造成其他危险，所以必须周全考虑，不是只凭眼力就可解决的事。

河堤是用来约束水流的，必须将它与河身一并推算。即进入河水中的斜坡，都必须加固，以防异常情况下河水猛涨，才不致误事。至于河堤的高低厚薄，则要看土质的松实，料质的坚脆。至于应如何建造，则必须看水线的高低，水势的缓急。河堤所需的材料，总要以能够防御河水冲击的材料才好，不必都用石堤，也不要都用料埽，等土堤筑造结实了，再用柳树和草片来保护，也足以抵御平常的水力。查阅各国防护河水的堤坝，多数是用土筑造的，并没全用石头的。但需要推算合法，位置得当，看守不懈怠，不能任意践踏。石堤料场，只在险要处使用。

总之，能省的地方就省，不能省的地方不要省，然而不测算精细不能行。我在监工时曾画了两种堤坝样式，大概对黄河还合适，在何处用哪种堤坝的样式，则要到现场临时勘查，因地制宜，并非整个黄河的堤坝都要改造。只是无论用哪种材料，都必须采购质量上乘的才能持久耐用。河水大涨时河流到达堤坝根基，小水流时河流在两岸中间。而河堤与河岸上的都是松软的泥土，常常被急速流动的河水冲刷裹挟而走，随即化为泥沙，到水流缓慢处，就淤积成了高高的泥滩，日积月累，逐渐造成危险。令人忧虑，但还有更让人担心的，就是上游的各个土山随时都会坍塌在河水中，泥沙随水流到下游，造成更大祸害。所以应设法保护，在水流经过的两岸，都修筑斜坡，先用泥土封护，再种植上草皮，并且多栽树木以夯实基础。在有危险的地方，则应在堤岸的根基处打上木桩，用树枝编织成筐，用泥土填成块，再垒上石墙，或砌个石坡，并且把大石头抛进水底，这样足以抵御水力。在土山两旁，也必须向水底抛石，再在土山上筑起石墙，以阻挡土山的塌陷，这样河岸上的土才不致被河水冲刷拖带，河流才可能逐渐变清澈，水患自然日益减少。这就是治理黄河应做的紧要工程。

对于大的水流，应让它在河道中间流过，至于应在什么地方，采用什么方法，现在还不能预定。大约需要在河湾处的水底多建造挑水坝，以疏导水流。挑水坝应用树枝，还是用石块，则需随时斟酌实际情况来决定处理，只有秸料不能持久时，而且没力量，就不能用。减水坝也应该讲究，以防备异常情况下的河水

大涨，最好设在堤边。应该先测量好地势，勘察实际情形，由河流的方向，来确定坝口的方向。此坝必须用大石头并加上混凝土建造。坝后新开凿的引河，或者已存在的河流，应筑起坚固的堤坝进行约束，使所经过的水，不致对周边地带造成危害。此所挑的引河，其宽度深度也不能太弯曲，而且要低于黄河水面，其河身才能有容水的地方，这样才能使用。

黄河末流入海口处，地势凸起，且有拦门沙，使河水不能畅通入海。应用机器或挖土船来挑挖，先筑起海塘，再用机器挖掘，也许这样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海塘与长河堤接连入海，水力更加强大，能将泥沙冲到海水深处，是海口必不可少的工程。再用机器在拦沙处深挖一道，使水力更猛，这样可以冲刷掉剩下的淤沙。此项工程，需要花费巨资，然而各个国家的海口都有，为何唯独黄河没有？美国密西西比河海口，奥国的大牛白海口，先前也被泥沙堵塞，现在大轮船往来无阻，就是有力证明。法国仙纳海口，先前也有拦沙阻碍，行船危险，不久经过用大石块填海，筑起海塘，高出大潮水面，两塘相距九十丈，海塘建成那一天，海口深达二丈，至今船只随便行驶。比利时的麦司海口，也兴建了这样的大工程。此外还有多处，不胜枚举。

黄河绵延经过好几个省份，极大地关系着国计民生。现在上游的河水流到下游，不能马上知道。下游出现险情，事后上游才发觉，上下游间不通声气，防范不周密。应该按照永定河的治理办法，沿河设立电线，分段通电，时时事事，报告给治理黄河的各级官员。以预防水患。此事刻不容缓。

治理黄河的工程，既然已经启动，那守护黄河的章程，也应尽早制定，只有一律遵守，坚持照章办事，才不致前功尽弃。调查发现，现在的河防官员，虽能够做到克己奉公，但黄河边的百姓践踏堤埽、挑土砍柳、锄草等各种破坏堤坝的恶习还没得到全面禁止。应该妥善地制定律例，严格执法，周密巡查，对触犯者予以惩治。河堤上不准私搭乱建房屋，如果需要在上面行车，一定要在专门建起的马路上特别加厚加固，才不至于损坏河堤。治河官员们要随时稽查，发现稍有残缺不全处，立即修补。这样工程就可保持完整坚固，不致发生意外事故。

黄河上游，是否建设闸坝，用来拦沙；或是选择大湖，用来减少流水量，也要认真考虑。因治理黄河有此办法，所以我在此汇报说明。上游的山上，应都种上草木，以减缓水势。西方各国，因山上洪水暴发，屡次造成水灾，命令在源头及邻近河水的各座山上栽植草木，水势逐渐得到减缓。偶尔有一两处树木，被人私下砍掉，水势立即恢复猖狂，政府就严令禁止，并且设置官员专门管理树木。西方人对此如此重视，可作为参考。调查山洪暴发的原因有两个：一因山上的土松，不能吸水；二因山势陡峭，没有可阻碍流水的东西。如果在山上遍种树木，那树根既能坚固土壤，又能吸水，而且还可减缓水势，使水流从容而下，不至于如同倒立，倾泻而下。如果山上不适宜种树，也应种草，其作用虽不如树木大，但总比没有强。法国自从颁布实行了亚尔伯等山的种树律例以来，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四、现时应救急的事

前篇所述治河所应办的各件事情，既然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就要等到全河测量详细后，再估计工料，妥善筹措办法，才能臻于完美。只是担心河流汹涌，迫不及待，所以急待先办理紧急的事情，这样也许可保灾祸不生，将来治理起来也会容易些。救急的事情都有哪些呢？无非就是培修堤岸，加固险患工程，疏通河水。至于更改河流形状以畅通水流，展开还是紧缩河身以顺应其水性，保护堤岸以阻挡其土坍塌，各项工程应等日后从容办理，此时无暇顾及。

培修河堤的方法，前篇已介绍过，此处不再多言。只要百姓筑起的堤坝就可。如果是大堤，就有相距太远，河面过宽易造成水患；加上残缺不全，没法修，或者修了不起作用。各处的防险工程，应全部加固修筑，应派官员对整个工程进行勘察，估价预算。凡是在首当其冲的堤坝，已腐朽的料埽，务必全部保护，过低过薄的堤坝，也应加高加厚。堤内与水接触的坡面，应加上一层护泥，以种植青草，并在堤坝的根基处遍种树木，想办法严禁人践踏。这是最紧急的任务，最好迅速办理。有险情的堤根，要么抛石块要么编织箩筐围挡加固，也必须因地制宜。凡是堤上开通了人行道的，应立即修补，并在堤坝顶部筑起石子马路，以便车马往来，不至于损坏堤坝。黄河末流的入海通道，最好确定妥当的位置，因为铁门关、韩家垣现都已经淤塞，丝网口则水势散漫，并没有河道。

调查选择这些末流地区时，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有的说铁门关淤积处应挑通，让河水照旧河道入海；有的说应仍从韩家垣旧河道入海；有的说应从十六户挑引河直到铁门关，以避开盐窝的抢险工程；有的说应由盐窝挑一直河仍从丝网口入海；有的说应在薄台县三岔河引河水入海；有的说黄河应在大马家挑河到孔家庄，使河水并入徒骇河，然后入海。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的地方，调查发现徒骇河形状十分弯曲，孔家庄河面大约宽九十丈，小水流时河面大约宽六十丈，两岸很高，并没有修筑堤坝，大水流时大约离两岸还低八尺，其上游在禹城以下，全部淤塞了泥沙，海口大约距离孔家庄七十里，并没有拦沙门。我认为对黄河末流的治理，首先不能让它的水进入徒骇河，因为这样让浊流汇入清流，使原来的清流也变为浊流了，这未免太可惜了。如果想商量确定一处，就必须要在各处详细测量，比较各地地势的高低，观察水流的方向。

据了解，现在武备学堂测量专业的学生很聪明，又很勤奋，四处测量，不遗余力，只可惜时间太紧，不能详细测量，所画的图纸，也只能看个大概，况且各段黄河的水流量，以及各地的落差，也无从查考。至于引河的形状，只按照海口应地势平坦的原则，引河以越短越直越好。因为河流短了，水势就大，落差就可增大，流水就更有冲击力。河身以能容纳河水大涨为标准，两岸堤坝以能约束水流为标准，还需要格外加固，以防备河水决堤。那些海口处原有的旧河槽，最好不用，因为旧槽形状都曲折了，堤防也不完备，不如另外选择新地方，根据地势来办理为好。

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挑挖引河，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任凭河水自行冲

刷，因为黄河的病根没除，河沙没减，到处淤积的现象，仍不能免，这样恐怕新挑的河道，不久也像旧河道那样被泥沙堵塞不通。我认为引河的河形，以不能让河水畅通为标准，这样才不会有发生意外的担忧。减水坝是必不可少的工程，应该把它设在何处，还没作详细考察。有人建议说济南府下游十八里处，原来有一处阻止水流的滚坝，似乎可以使用。我监工回来的路上，顺便去那里勘探，看到此坝距离黄河还有五里，原来建造的目的，为引导济南各山的清水汇入黄河，想以此冲击泥沙，但一直没有启用。坝门很小，只有一丈四尺，又和各河流不通，如果想启用，还必须挑引河水，疏通小清河。调查小清河的河身，仅仅能够容纳自己的河流量，河水大涨时就已经漫延到两岸了，又没河堤约束，如果再将黄河的水灌入，势必会遍地浸漫，济南省城恐怕也被淹没。我认为要想减水，以汇入徒骇河为好，但仍需测量、筹划、计算等才能决定，而且徒骇河也需要加宽，两岸河堤也需要添补加筑，才可使用。

以上四大问题，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得当，等待圣上研究决定，以按指示执行。我这次担任勘探黄河，经常与司道大员及地方官员合作勘查。虽然各人看法不同，但和衷共济为国出力，为中堂效命，心怀国计民生，希望所想所做能一劳永逸，不约而同。无论中外，每个人都想成就这样利国利民的功业，心中不怀任何成见。

卢法尔谨上。

读后感悟

1．李鸿章一生所做多为大事，治理黄河这样的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即使治理黄河，李鸿章也与众不同，在治黄史上添上了自己独特的一笔。

2．应该说李鸿章治黄的与众不同，出于他做事鲜明的个性风格，也由于他的认真负责。

3．这篇治黄奏折，可谓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内容详尽，虽非李鸿章亲自所写，但从中也可看出他抓工作的认真负责，否则手下怎么可能写出这么细节生动、说理透彻的奏折呢？

雷厉风行总督两广

李鸿章总督两广时，接替的是前两任总督李瀚章、谭钟麟，百废待兴，省内盗贼横行，草寇遍地。

李鸿章到任后，雷厉风行，恢复了就地正法制度，用刚烈、严酷的手段执行法律，杀人无数，受到有道德之人的谴责。但各路盗贼也因此害怕其威名，他们不是被逮捕杀掉，就是逃往他乡，地方因此得以安宁。

最祸害两广人民的，是让赌博的人承担军饷。两广地区盛行偷盗抢

劫之风，其源头由赌博而起。盗贼中没有不赌博的，赌徒中没有不偷盗的。

李鸿章制止赌博，美其名曰筹集缉捕经费，就是通过抽取赌博的彩金，来作为治理盗贼的费用。但这和怕百姓不偷盗，来教唆他们偷盗有什么区别呢？既然教育之，然后再杀之，这种做法实在有失道德人心。孟子说：“不教育百姓，却使他们犯罪，然后再处罚他们，这是欺骗百姓啊。”不教育百姓而处罚之，就已经是欺骗百姓了，更何况是教唆百姓犯法再处罚他们呢？

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是李鸿章越老越糊涂了吗？否则，何至于人到晚年时，却做出这些败坏自己名声的事，授人话柄呢？有人说，李鸿章知道赌博之风无法杜绝，所以就利用它来筹集政务经费。

淫风固然难以灭绝，但没听说政府开妓院的；偷盗之风固然难以灭绝，但没听说政府教唆盗贼的。这个道理李鸿章不可能不明白，却还这么做，真是没有心肝了。

李鸿章到达两广地区，准备在省城广州施行警察制度，是因听了黄遵宪的建议。可惜没等做完，就离职而去了。

两广地区是中国人和西洋人杂居的地方，各色人等，良莠不齐。一些狡黠之徒，常以加入天主教会作为保护，鱼肉乡里；天主教及其他教会的牧师，常偏袒他们，纵容其滋事。近十年来，当地各级官员都庸碌腐败，害怕洋人如同老虎，更助长了这些人的嚣张气焰。

李鸿章到任后，教民还想故伎重演，想以此挑衅试探李鸿章。李鸿章就召集这些牧师，摆事实，讲道理，严格规定了其权限，不给一点方便。如此一两次之后，不再有人敢以教会为靠山做坏事了。

唉！对有着几十年磨砺的外交家李鸿章来说，对付大敌也许有些不足，应付此等小辈，实在不费吹灰之力的。现在的地方官员，以处理教案为最可怕之事，不免太无能可怜了。

李鸿章到两广时，正赶上康有为等人在海外频繁活动时，朝廷下令李鸿章镇压。李鸿章于是逮捕了康党海外志士的3名家属，并诛杀之，震惊一方百姓。真是野蛮政治啊！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有人说：这并非李鸿章个人的意思，是为政治服务的。虽如此，我也觉得他有责任。



李鸿章与李瀚章兄弟

读后感悟

1．为制止两广地区的赌博偷盗之风，如同在外交上采取的以夷制夷，李鸿章采取以恶处恶的办法，虽然也许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毕竟有失道德人心。

2．处理涉外教案，对李鸿章来说小菜一碟。李鸿章虽知道外国人强大，但从不惧怕外国人，善于周旋而不失天朝大臣的庄严风范，这正是他的厉害处，也是让外国人仰慕他之处，当然也是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才能和魅力所在。

3．本书作者梁启超曾是“康党”的重要一员，所以他对于李鸿章抓捕“康党”人士及其无辜的家属予以谴责，认为李鸿章的做法是有失道义的野蛮政治。但站在政治的角度，李鸿章作为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朝廷重臣，不可能不奉命行事。

4．李鸿章以军功出道立身，以外交闻名世界，以政治权谋著名。无论他做什么，都自有一套，不惜权谋手腕，而且雷厉风行，执行力超强。

第九章　沧桑垂暮年——晚年的李鸿章

八国联军进京，又受命议和

李鸿章开始当江苏巡抚时，只是个虚名，后来被授予直隶总督时，也是个虚名，没到任。

真是造化弄人，上天好像故意捉弄他。不由让人感慨，生英雄气短之叹。

李鸿章当两广总督不到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因何而起呢？是戊戌变法反作用的结果。当初，皇上因为施行新政触忤了太后。8月发生宫廷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逃到英国，梁启超逃到日本。顽固党们本来就视外国人为仇敌，又不懂国际公法，以为外国人要与康有为联合，于是更怨恨外国人。北方的人民，自天津教案和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已积蓄很久，于是，义和团运动借着迷信之术，趁机兴起。顽固党以为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可达到打击外国人的目的，因此不加制止。



义和团士兵

所以，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政府与民间势力的联合，但他们的目的并不一致：民间力量出于公心，只是愚昧无谋，可怜可叹；政府力量出于私心，狂悖无道，天下恨之。

当时如果李鸿章在直隶，那祸事也许就能避免，或者事发时，李鸿章先与袁昶、许景澄受其祸，也有可能。但上天偏不让祸事早日平息，偏不让李鸿章早死，专为李鸿章设此位，使其生命历程又发生一次转变。

进入6月，八国联军迫近京城，李鸿章又被授予议和大臣。



八国联军进北京

当时，有人为李鸿章出主意，建议他拥两广自立，开辟亚洲的第一个新政体，此为上策；率军北上，救君主而剿灭义和团，以谢各国，此为中策；受命进京，投身虎口，甘为顽固党利用，此为下策。

第一条，只有非常胆识和气魄之人，李鸿章不是这种人。40年前，他正当壮年时，尚不敢有破格举动，更何况现在将近80岁的老翁，岂能做到？所以，出这主意的人，真是不了解李鸿章啊。

第二条，较符合实际，但当时广东并没有兵力，并且此举也有嫌疑，万一朝中与李鸿章不和的人，给他冠以举兵犯阙的罪名，他就骑虎难下，陷于绝境了！李鸿章只想苟延迁就，以保全名声，所以他不会犯上作乱。

不过他倒认真思考了第三条意见。他怕单独进京会有意外，就故意迟迟不动。他逗留上海，几个月后才出发。

果然，皇上和太后逃到西安后，才开始和议。

此次和议虽然不如在日本马关时那么艰险，但麻烦一点不少。在整个和谈中，李鸿章保持清醒镇定，从容磋商，好在各国此时都厌倦战乱，朝廷也有悔过之意。于是，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签订和约如下：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大臣克林德男爵被杀害一事，先前已经在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任命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到大德国大皇帝面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表示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在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从北京起程。

二、大清国已经声明，在克林德遇害处竖立铭志之碑，与克林德的品位要相匹配，上面记叙有大清国大皇帝对死者表示哀悼和惋惜的圣旨，以拉丁文、德文、汉语三种文字书写。先前在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发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处（附件三）。现在可看到在克林德遇害处所建立的一座碑坊，几乎占满了那条街，已在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动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各个国家和人民的首要元凶。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的罪名，都列在后面（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被定为斩监候的罪名，并约定如果皇上认为可免其一死，就发配到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罪过；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都被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都被定为立即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都已经死去，又追加剥夺其原有官职，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一年激烈驳斥各国公法的极恶之罪被杀害，在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圣谕官复原职，以示平反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在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在二十四日，即初六日都自尽。毓贤已在二十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在二十六日，即初八日都行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上圣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等应得的罪名定下，一定要严加惩治。西历本年二十九日、六月初三日、□月□□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天发生的凶残案中所有确认有罪的各省官员，一一惩办。

二、皇上下旨公布所有各国人民遇害被虐待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级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应从优荣之典，已在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到大日本国大皇帝面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表达惋惜之情（附件

九）。

第四款　大清国答应在各国被污辱或被挖掘的坟墓之处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各国全权大臣商定，墓碑由各国使馆督建，由中国付给估算所需的费用，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白银，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已经付清。现将需要建碑的坟墓，开列清单如下（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政府不准将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材运入中国境内，已在西历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两年。之后如各国认为仍有必要继续禁止的地方，也可降旨将两年的期限继续后延（附件十一）。

第六款　大清国答应付给各国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白银，此款是西历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中第二款所记的各国、各教会、各人及中国人民的赔款总数（附件十二）。

甲、这四百五十兆是海关的银两，按照市值折变为黄金款。此市值按照各国的货币比价折合为黄金，比价是：海关银一两，合德国三点五五马克，合奥国克朗三点五九五，合美元零点七四二，合法国法郎三点五，合英镑三先令，合日元一点四零七，合荷兰弗罗林一点零七九六，合俄国卢布一点四一二。俄国卢布，按汇率进行合算，即多理亚十七点四二四。这四百五十兆白银，按年息四厘计算，本金由中国分三十九年还清，按后附的表格所列各章程还清（附件十三）。本息用黄金付给，或者按照应还日期的市价折合成黄金付给。还本于一九〇二年正月初一日起，到一九四〇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一年一次的频率付还，初次还款定于一九〇一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九〇一年七月初一日算起。不过中国也可将所欠的首六个月到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利息，延期到一九〇二年正月初一日起，在三年内付清。但所延期息款的利息，也应按照年息四厘付清。且这些利息，每六个月付一次，初次定于一九〇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乙、这项赔款的一切事宜，都在上海办理。之后各国分别派一名银行董事，会同在一起，将负责还款的中国官员付给他们的所有本金和利息全部收存，分给与此有关的国家或个人，由该银行出具付款的回执。

丙、中国将全数保票一纸交各国驻京钦差领衔大臣手中。此保票以后分为零票，每张票上分别由中国特派官员签字画押。此环节及发票等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提到的银行董事遵照本国的命令办理。

丁、付还保票财源各项进款，应每月交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所规定承担保票的财源，开列如下：

一、新开关税所进款项，等先前已经作为担保的借款各本钱和利息都付清后，剩余款项再加进口货税。进口税增加到百分之五，所增加的数额也相应加上。所有以前规定进口免税的货物，除外国运来的米及各种杂粮面粉以及金银各种钱币外，都应抽取百分之五的税。

二、所有常规海关的收入，在各通商口岸的各项目，都归新关管理办法。

三、所有盐政各类所进款项，除归还欧美借款一项外，剩下的一并归入，到进口货税增到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五。各国现在同意实行，只是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将现在按照估算价值抽取的各项进口税费，凡是能改的，都应赶快改成按件抽取税费。改办一层如后，作为估算各货物价格的基础，应以一八九七年、一八九八年、一八九九年卸货时各货物估算的价格为准，就是除去进口税及杂费之后的总价。在没改之前，各项进口税仍按照旧的估价征收。二是北河、黄浦这两条水路，都要改善，中国政府也应拨款相助。至于增税这一条，等此条约签字画押两个月后，就开始办理，除了在此画押之日期后，最迟不超过十天的已在途中的货物除外，一概不能免税。

第七款　大清国政府答应各使馆境内，是专为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并单独由使馆管理，中国百姓，一概不能在境内居住，各使馆也可自行防卫。各使馆的界线在附件的地图上标明（附件十四）：东面界线，是崇文门大街，图上所示之十、十一、十二等字样，北面图上是五、六、七、八、九、十等字的线，西面图上是一、二、三、四、五等字的线，南面图上是十二、一等字的线，这些图线沿城墙南址随城垛的形态而画。按西历一九〇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的条约，中国政府允许各国分立自主，可常驻部队保卫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政府答应将大沽炮台，及阻碍北京与天津的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在已在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九〇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的条款，中国政府答应各国分别可自主决定，并一起酌情商定几个屯兵驻守处，以保证京城和各海通道间的畅通无阻。现各国驻兵防卫之处有：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政府答应在两年之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下所述的通过皇帝圣旨通告颁行：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皇上下旨，永远禁止设立或加入与各国为敌的集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二、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皇上下一道圣旨，对犯罪之人如何惩办，都一一说明。

三、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皇上下旨，在各国人员遇害被虐待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级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皇上下旨，各省巡抚、总督和文武大吏及各部门官员，在所管辖的境内，都有保护一方安定的责任，如再滋生外国人被伤害的事情，或再有违背此条约的行为，一定立即给予镇压惩办，否则管辖的官员，立即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也不得为这些官员开脱或给予奖励（附件十六）。

以上谕旨要在中国全境内逐渐张贴布告。

第十一款　大清国政府答应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各国认为应商榷改善的地

方，及其他有关通商的事宜，都进行商议确定，以达到简单易行的效果。按照第六款有关赔偿的事宜规定，约定中国政府答应协助改造北河、黄浦两条水路，其协助各事项如下：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八九八年会同中国政府所兴建的各项工程，都由各国派遣人员修建。

二、等治理天津的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政府派员与各国所派人员一起办理，中国政府应每年付海关银六万两，以作为工程费用。

三、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的各工程所，派驻该局的各成员，都代表各国及诸国保护在上海的通商利益。预计在以后的二十年中，该局各工程及经管费用，需每年支用海关收入四十六万两白银，此数平分，一半由中国政府付给，一半由外国各相关国家出资。该局员工的责任、权力及工资收入等详细各节，都在后面的附件中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各国商定的意见改名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上谕内已委派外务部各王大臣（附件十八）。并且变更各国钦差大臣朝见的礼节，都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历次照会备案。此照会在后附的章节中说明（附件十九）。

这里特别声明，以上所述的各内容，及后面所附的各国全权大臣所签订的条约，都以法文为依据。大清国政府如果按照以上所述，西历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规定的文内各款办理，并按各国意见妥善办理，那就意味着中国愿意将一九〇〇年夏天所发生的变乱局势处理完毕，各国也将按照条约规定同时实行。为此各国的全权大臣奉他们本国政府的命令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说的用来防守各国使馆的部队外，各国军队都将在一九〇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全部从北京城撤退。并且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也在西历一九〇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从直隶省撤退。现在将以上各款缮写为十二份，都由各国全权大臣签字画押，各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读后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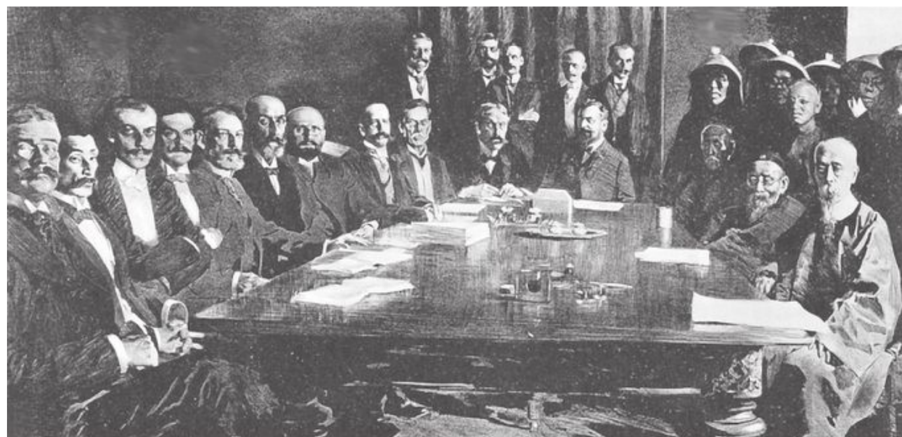
1．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年近八旬的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与十余个国家议和，如果说李鸿章不是人才，那么为何屡屡被临危授命呢？可见在外交上，当时的李鸿章是无可代替的。

2．李鸿章已是功成名就，加之年老，完全可以像曾国藩那样，全身而退，但朝廷需要他，而回家养老似乎也不是他的性格，他精力充沛，向来当仁不让。于是义无反顾地再次出头，并不理会是毁是誉，也不怕招来更多诋毁。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正是他一生追逐功名，热衷权力的表现。

3．以李鸿章的资历、能力和影响，也许可自立一方，但李鸿章不是那样的人，不仅因为他能力不足，已经年老，想保全名声，更因为他是一个忠于君主统治的封建官僚。他不会犯上作乱，也不会推翻自己的过去。

4．再次临危受命，忠君的李鸿章义不容辞，但他故意拖延，等到时机成熟后，他才动身，体现他熟谙官场、老谋深算的一面。

5．再进行一次敌强我弱的外交斡旋，李鸿章虽是能者多劳，义无反顾，但毕竟已年老体衰，况且责任重大，结果注定是悲惨的，今后注定会背负骂声不断，李鸿章的压力和苦楚可想而知。也许，这是命运之神对他老年心智和毅力的严酷考验吧？为此我们只有表示同情。



辛丑条约

中俄满洲条约

《辛丑条约》签订后，还有一件李鸿章没有了结的旧债，就是满洲事件。

《中俄密约》规定，俄国有驻军保护东方铁路的权力。义和团运动后，两国在疆界问题上开始失和，俄国以此为借口挑衅，进攻吉林、黑龙江，达到营口。当时，北京有八国联军侵入，无法顾及这边。

到议和时，俄国坚持这是中俄两国的事，需要另议，与北京议和不同。不得已，中国政府答应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满洲方面就出了问题。李鸿章是怕还是亲俄国呢？还是另有隐衷呢？我们虽不可知，但他的议和，无异于把东三省全部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现抄录《中俄满洲条约》全文如下：

第一条　俄国把满洲交还给中国，行政上的事务，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可留驻兵保护满洲铁路，等地方局面安定后，而且在本条约最重要的四条都履行后，才开始撤兵。

第三条　如果中国有事变，俄国可借给中国这支部队帮助镇压。

第四条　在中国铁路（可能是指满洲铁路）还没开通之前，中国不能在满洲驻兵。即使他日可以驻兵，其驻兵的数量也必须要与俄国商定，而且禁止往满洲输入兵器。



东交民巷原俄国大使馆

第五条　如果地方的官员处理事情上有不当之处，就必须按俄国方面的请求，将此官革职。满洲的巡察部队，也必须与俄国商量，确定其人数，不能雇用外国人。

第六条　在满洲、蒙古的陆军和海军，不能聘请外国人来训练。

第七条　中国应该将旅顺口的北金州的自主权放弃。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的铁路、矿山，及其他利益，没经俄国人许可，不能让给别的国家；或者中国自行使用，也必须经俄国同意。牛庄周围各地区，不能租借给别的国家。

第九条　俄国驻军所有的军事费用，一律由中国支付。

第十条　如果满洲铁路公司有什么方面的损害，中国政府必须与该公司商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的东西，中国应该赔偿，或者赔偿全部损失，或者以

一部分实际利益作为担保。

第十二条　允许中国从满洲铁路的一条支路修建一条铁路，以抵达北京。

此草约一公布，南方各省的官员和百姓都群情愤怒，纷纷发电报阻止，或开演说会联名抗争。而英、美、日各国，也利用各自的媒体发表意见，进行干涉。俄国公使不得已，做出让步。几个月后，修改前约数条如下：

第一条　同上

第二条　同上

第三条　同上

第四条　中国虽然可以在满洲驻兵，但驻兵多少，要与俄国人商议，俄国协定多少，中国不能反对，但仍然不能往满洲输入兵器。

第五条　同上

第六条　删除

第七条　删除

第八条　想在满洲开矿山、修铁路及其他各种利益的国家，中国不与俄国商议，就不能将这些利益答应别国。

第九条　同上

第十条　同上，并追加上“这是驻扎在北京的各国公使协议、并被各国所采用的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　同上

第十二条　中国需要从满洲铁路的支路修建一条铁路到达直隶境内的长城。

读后感悟

1．《中俄密约》已经是不平等至极，加上这个满洲条约，几乎把清朝祖宗的发祥地割让了出去。虽是迫于形势所逼，但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的确负有主要责任。

2．年近八十的李鸿章，已经因《中俄密约》饱受非议，加此《中俄满洲条约》，更是被谩骂无疑了，但后者是前者直接带来的结果，李鸿章难辞其咎，有再多无奈和委屈也只好忍受。可怜的老人啊！

3．以李鸿章的见识和眼光，怎么可能不知道俄国的觊觎和攫取的野心呢？但他是没有办法了吧？还是觉得俄国得罪不起？

4．李鸿章乐于接见外国人，并以坦率直言著称。据说有一次，英国和平协会会长文惠廉来拜访。文惠廉讲述了自己向各国宣传公平和正义事迹。李鸿章听后直说：你不应该向中国政府的官员宣传呀，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不会主动开战。并建议他不要向正义的一方呼吁，而应让罪恶的一方认识到并忏悔。他直接

说："为什么不攻击俄国的攫取政策呢……你应到圣彼得堡去呼吁公平与正义啊！"可见，李鸿章对俄国也是恨之入骨的。

死也哀荣

此时，李鸿章已病得很厉害了。他以近80岁的高龄，久经患难，到垂暮之年，又遭此变故，自然心情忧郁，积劳成疾，坎坷遭遇也算超越常人了。

这年来，他的肝病日益严重，时而大怒，有时如发疯；加上俄国公使，助天来行虐，恫吓催促，令李鸿章难以忍受。

及至听到徐寿朋的死讯，李鸿章抚胸吐血，此时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贤良寺。

据说李鸿章死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来催他签字。最终条约没能签订，现在已交付给庆亲王、王文韶。

李鸿章临终不曾谈及家事，只切齿愤恨地说："可恨毓贤把国家害到如此地步……"继而长叹道，"皇上和太后不肯回来啊！"随后，闭眼逝去，享年78岁。

在西安逃难的两宫得到李鸿章去世的电报，深为震痛。次日公布上谕：

我（皇上）谨奉太后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量不凡，学养深厚，才能过人，深谋远虑。

他以翰林的职位创建淮军，剿灭太平军、捻军等，居功甚伟，因此朝廷特别施恩，晋封他为伯爵。

他辅佐朝廷，服务国家，又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匡正时弊，补济时艰，与国外和睦相处，老成持重，深谋为国，用心良苦，忠心耿耿。

去年京城发生动乱，朝廷特派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善签订和约，都合乎时宜。

本想着大局都安定后，对李鸿章的功绩加以标榜，进行光荣奖赏，却不料听到他溘然长逝的噩耗，深表震惊悲痛。对李鸿章要特别加恩，按照大学士的规格进行赏赐抚恤，赏赐陀罗经被子。派恭亲王溥伟带领十名侍卫，前往祭奠。授谥号为"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为一等侯爵，入祭贤良祠，以表深沉思念忠臣之意。其他给死者尊荣的礼仪之事，另行降旨。钦此。

随后，朝廷赏赐5000两白银用于治丧，赏给李经述四品京官的职位，承袭李鸿章的一等侯爵；赏给李经迈候补京官的职位，其余子孙，

都给予不同程度的赏赐。赐令在天坛、地坛祭祀，又令在原籍、李鸿章曾立功的省份，及北京城建立专祠，每逢过年地方官都要去祭祀，并列入国家祠典。

朝廷给李鸿章的荣誉和奖赏也到极点了。一代风云人物，竟随同北洋舰队、津防练勇一道，与这个世界和国民长辞了。我闻讯那天，撰一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读后感悟

1．李鸿章在忙碌中逝世了，死前俄国人还在找他签约。就此意义说，李鸿章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李鸿章临终所言，体现出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且心有忧愤，死不甘心。其爱国之心，拳拳可表，又何必对他非功即罪，以“卖国贼”相称呢？

3．李鸿章生前已经功名卓著、位高权重、身份显赫，死后还能享受无上的哀荣，可说是福命不浅了。虽然李鸿章一生享尽荣华，备受争议，饱受诋毁，但生死皆显达，非一般人可比，令一般人艳羡，也算是成功人生了。

第十章　功罪任评说——留在后面的话

中外对比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是无可置疑的；李鸿章是19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也是无可置疑的。但他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位置？与中外历史人物相比，他的价值何在？在此一一论述。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历史学家们说霍光“不学无术”，我说李鸿章也是“不学无术”。但李鸿章与霍光果是同一类人吗？回答是：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地位，没人家有魄力。李鸿章是谨慎本分人，他不是一个待时而动，以实现自我理想的人。他一生不能充分实现自我志向，也在此，所以怎么能和霍光相比呢？不过他的学问比霍光高些。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历史上具备这五大身份并被后世所钦佩的，就是诸葛亮了。李鸿章的资本，远胜过诸葛亮，但他所得君主的信任远不如诸葛亮。最初他在上海起兵时，仅靠了3个城市，就在江南立下大功，在创业的艰难上，两人大体相似。但后来的军事成就，远超诸葛亮。但诸葛亮在崎岖的蜀国能使官员心地纯正，使百姓自强自立，李鸿章身为重臣几十年，却不能使国民团结友好、甘心为他效命。诸葛亮死时，家产只有成都的800株桑树；李鸿章却以富豪闻名天下，两人相差何其远也。他俩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犬马恋主般的忠诚，却是一样的。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有中兴国家、平定叛乱之功，与郭子仪很像，二人所享的福运也相似。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就没做什么大事；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只是他一生事业的一部分。如果二人调换一下位置，郭子仪也许不如李鸿章做得好。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安石因变法遭到诟病，李鸿章因洋务运动被诟病；王安石的新法与李鸿章的洋务，虽都不是很完善的新政策，但他二人的见识都不是那些诟病之人所能比的。所谓的贤人君子，不仅不支持他们，还群起而攻之，牵制掣肘之，在背后飞短流长，使他们不得不利用一些小人。二人处境相似，但王安石得到更多皇上的支持，更关注民生，筹划更宏大深远，比李鸿章要强。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有些腐朽文人骂李鸿章是秦桧。法越战争、

中日战争中，这种论调很多。如果出于市井平民之口，也就罢了，但出于君子士大夫之口，实在让人无语。不如就把此论调当成狗吠吧。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好比管仲之于鲍叔，韩信之于萧何。而且，李鸿章一生的学问、见识和事业，无不在曾国藩的提携之下完成的。所以，李鸿章其实就是曾国藩门下的人物，当然不能与曾相比，世人早有定论。但曾国藩毕竟是一位儒生，如果让他做外交，他的手段、智慧和机警，可能不如李鸿章。而且曾国藩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李鸿章血气刚强，无论多大困难，都会挺身而出，也算是他的特长了。



李鸿章头像银票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宗棠与李鸿章曾一度齐名，左宗棠善于张扬，李鸿章善于隐忍。左宗棠没有李鸿章的器量。一些骄狂的湖南人，把左宗棠尊为旧党领袖，想以此与李鸿章抗衡。其实，二人在对洋务的认识上不相上下，左宗棠固然不是守旧派，李鸿章也非维新人士。左宗棠早死十多年，所以有幸保住自己的名声，于是此后的艰苦和谤议，都落在李鸿章一人身上。所以左宗棠的福命高于李鸿章。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人都是人杰。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李鸿章忠于大清。一个被封忠王，一个谥号“文忠”，都当之无愧。李秀成在用兵、政治、外交等方面都不比李鸿章差，但他们一成一败。我遍览近代人物，要写两个人的合传，非他二人莫属。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他却杀了投降的8个王，这个是李鸿章失德之处。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近十年来，与李鸿章齐名的，就是张之

洞。其实，张之洞怎么能比得上李鸿章呢？李鸿章做实事，张之洞却华而不实。李鸿章不爱慕虚荣，张之洞喜好名誉。不图虚名所以能任劳任怨，追逐声名所以投机取巧。张之洞常在外交上给李鸿章制造麻烦，他所做的规划策略，都是说到做不到。李鸿章曾说：不料张之洞做官几十年，还是书生之见。此话可总结张之洞的一生了。张之洞骄傲清高，残忍苛刻，与李鸿章的见识和胸怀器量相比，还是相去甚远的。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步李鸿章后尘的人，也许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栽培起来的。袁世凯刚入中年，就担当重任。目前他的表现还不明显，所以不好妄下结论。但此人功名心重，气魄远大，敢为天下先，看去比李鸿章强。他的心术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但现在的百官中，论资历和才能，能步李鸿章后尘的，就只有袁世凯了。

第十一，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为19世纪的一大奸雄。在他当权的40年中，实行狡猾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了全欧洲，对内镇压民主党派运动。19世纪前半叶，欧洲大陆的腐败现象，实际与此人直接有关。有人说李鸿章和他很像。但李鸿章的心术不如梅特涅，才能也不如人家。梅特涅深知民众的力量所以压制，李鸿章对民众力量视若无睹；梅特涅外交上能操纵众多国家的首脑，李鸿章连一个朝鲜也安顿不了，所以他比不上梅特涅。

第十二，李鸿章与俾斯麦。有人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不是奉承也是胡说了。李鸿章凭什么与俾斯麦比？军事上，俾斯麦战胜的是敌国，李鸿章所杀的是一国同胞；内政上，俾斯麦能够联合各国成一个联邦体，而李鸿章却把偌大中国沦为二等国家；外交上，俾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并利用之，李鸿章联合俄国反落入人家圈套。三方面比较，二者何异于天壤之别？不是以成败论人，而是李鸿章的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与俾斯麦相比。所以他的成就不如俾斯麦。虽然他的际遇不如俾斯麦，但的资本却很强。当然他们都有困难，否则不足以成为英雄。李鸿章向俾斯麦说到自己的困难，岂不知俾斯麦也有自己的困难呢！如果两人交换一下位置，我想李鸿章还是失败。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人，实在是对他二人的误解。

第十三，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有人把李鸿章、俾斯麦和格兰斯顿并称为“三雄”。可能是就他们当权之久，地位声望之尊来说的。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没一点相似的地方。格兰斯顿擅长内政和民政，而且很专业，在军事与外交上表现一般。他还是一位有德有识的人，是民主国家的优

秀政治家；李鸿章却是个追求功名的传统东方人，是18世纪以前的英雄。二者相去甚远。

第十四，李鸿章与迪亚士。法国总统迪亚士，是巴黎被围攻时的议和大臣。他当时处境，与李鸿章在1895年、1900年时相似，存亡危急之际，忍气吞声，最难以忍受了。但迪亚士偶然遇到，李鸿章却是反复再三做这种事；迪亚士要面对的，只有一个国家，李鸿章要面对的，是好几个国家，所以李鸿章的遭遇也足以令人同情了。然而迪亚士在议和之后，能通过一场演说，立即募集了50多亿法郎，不过十年，法国就成为欧洲的一流国家；李鸿章却被赔款所困，补救无术，中国的危亡局势，因此更加严峻。这是两国人的爱国心不同？还是李鸿章的方法不当呢？

第十五，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的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身处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他洞察时势，知道闭关锁国不能发展，于是与欧美各国结成联盟，积极学习各国的长处以自强。但当时日本民间，尊王攘夷的论调高涨，井伊直弼就以强硬手段镇压民间力量，以效忠于幕府为己任，全国的怨愤，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最终，他被刺死在樱田门外。但日本的维新运动就此开始了。井伊直弼，是日本明治政府的大敌，也是功臣。其才能令人敬佩，其遭遇令人同情，日本人至今都在念叨他的好。李鸿章的境遇与之相似，但他的困难比井伊直弼还要多。井伊直弼被杀，横死街头，李鸿章死后哀荣巨大，其福命远远好过井伊直弼了。然而日本兴旺起来，中国却依然如故。

第十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中日战争中的两个英雄。如果以成败论，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强，但其实伊藤博文比不上李鸿章。日本人常说伊藤博文命好，有一定道理。他在日本维新之初并没建什么大功，比起李鸿章栉风沐雨的曲折经历，伊藤博文自然输了一截，所以伊藤博文对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二人调换位置，伊藤博文恐怕不如李鸿章。但有一点，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强，就是他曾游学欧洲，更了解政治的本质。所以他能为日本制定长治久安的宪法。李鸿章却只能添补缺漏，照猫画虎，东施效颦，最终无所成。但日本像伊藤博文这样的同辈人，也不下百人，而在中国，像李鸿章这样的人，难找一个，因此不能把中日之战的失败归咎于李鸿章一人。

读后感悟

1．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和近代世界的重要人物，作为史家的梁启超，在传记的末尾，很自然地对他做历史地位的分析评价，于是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重要人物作比，既是梳理自己的思想，也让读者在对比中更客观地认识李鸿章。可谓大手笔也。

2．作者本着客观主义的史学态度，对李鸿章做对比分析，分析其优劣得失，然后做出自己的评价，可谓有理有据，严谨到位，不偏不倚，褒贬中肯，史家笔法也。

3．在一个个对比背后，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对李鸿章的评价，也看到了李鸿章的优缺点，看到了他必然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4．李鸿章说不上有多大才能，也说不上有多伟大，但他毕竟是中国和世界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一个伟大人物，也许他有自身难以超越的缺点。但他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优点，他不是创造时势的英雄，但他确实以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而且，他无愧于这个时代。

李鸿章轶事

李鸿章工作时，案头不见没办理的公文，客厅不见待接见的客人，此作风也许遗传自曾国藩。

李鸿章的饮食起居很有规律，有西洋人作风。他严于律己，国人中很少能赶上他的。一年四季李鸿章都是五点起床，家藏宋代拓印的《兰亭序》，他每天早晨必临摹百余字，从不给外人看，他以此养心自律，跟曾国藩在军中时每天要下一局围棋一样。李鸿章每天午饭后，必须午睡一小时。他在总理衙门时，午睡起来时，就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然后伸出一脚，伸出一胳膊，身边侍候的人就会给他穿靴穿袍，一刻也不能耽误。



李鸿章的夫人和女儿

李鸿章喜欢用西方方法养生，每餐都要吃两只鸡熬成的羹汤，天天让医生检查身体，常用电气设备检测。

在天津时，戈登曾去拜访李鸿章，待了几个月。当时因伊犁纠纷，俄国威吓中国，两国关系紧张。李鸿章咨询戈登，戈登说："以现在的形势，中国难在世界立足，除非你自立为王，掌握大权，再大力整顿。如果你有此意，我愿效犬马之劳。"李鸿章脸色一变，不说话。

李鸿章待人接物，常有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还常戏弄人。但他对曾国藩，如同严父，恭敬有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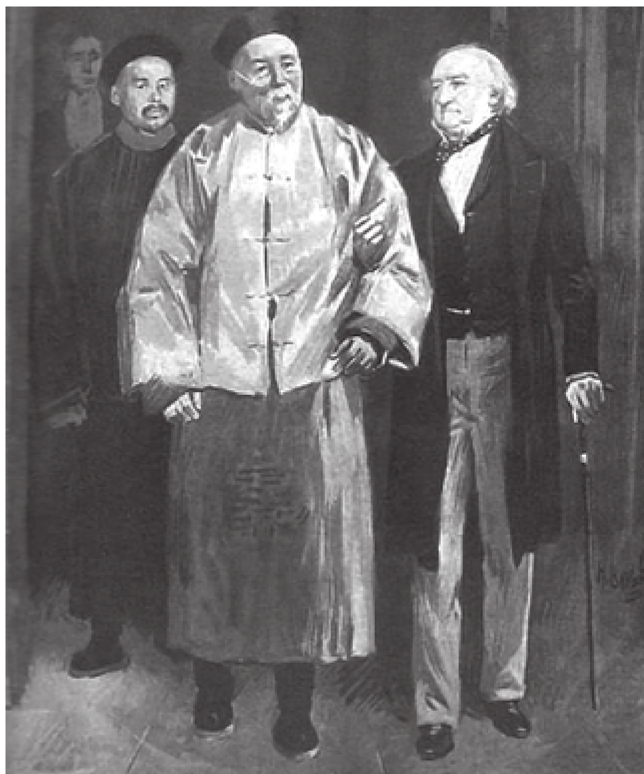
李鸿章对外国人，也是态度轻侮，视之如市井小民，说：他们皆为利来，我也以此应对。所以，李鸿章是绝不崇洋媚外的。

外国人中，李鸿章最敬重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将军格兰德。格兰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立有大功，他到天津时，李鸿章给予特别待遇。此后每每接见美国公使，都要问起格兰德的情况。他游历欧洲，路过美国时，听说美国为格兰德树起了纪念碑，就赠送千两白银

以表敬慕。

李鸿章办事十分认真周到，每遇到一个问题，总要再三询问，毫不疏忽，不轻易许诺，一旦承诺就必然做到，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多次问别人的年龄和财产。随行人员提醒他说：西方人忌讳这些问题。李鸿章却不理会——因为他瞧不起欧洲人。最可笑的是，他在英国时参观一个大工厂，忽然问一个工头：“你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厂，一年有多少收入？”对方答道：“只有薪水。”李鸿章却手指着人家的钻石戒指说：“那么，你这枚钻戒从哪里来的？”欧洲人传为趣谈。



强硬外交李鸿章

世人都说李鸿章富甲天下，其实未必。李鸿章大约有几百万两白银的产业。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里，都有他的股份。有人说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也有不少是他名下的产业。

李鸿章在北京，常住在贤良寺。曾国藩平定江南后初见皇上时，也曾住在这儿。将来，这座寺庙可能要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段佳话了。

李鸿章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戊戌会试那

年，李鸿章在京师，曾差点当上主考官，但最后没获得。哪怕在朝堂上当一回阅卷大臣，也没有，为此他耿耿于怀。以他的盖世功名，还恋恋于此，可见科举制度对他的深刻影响。

以上轶事，是我偶然拾来的，以使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李鸿章。我和李鸿章相交不深，了解不够，且因无关大体，记不胜记，所以对此不多记叙。

那么，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用两句话来评论：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缺点；不辞辛劳，不怕诽谤，是其优点。

唉！李鸿章走了，但中国仍然多难，比他死前还严重，以后的贤人君子，将怎么办呢？

读后感悟

1．作为人杰，李鸿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他真诚地工作和生活，勤于政务，严于律己，爱护自己，生活讲究，体现出他热爱工作和生活，并有高效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2．作为朝廷重臣，李鸿章可左右影响朝政大局，但他是一个笃守儒家文化和封建体制的官僚，所以他不可能犯上自立，所以他看不起外国人，所以他耿耿于没当一任科考官。这由他的价值观所致，也是他的忠诚所在。

3．所谓恃才傲物，李鸿章才能过人，功名盖世，难免骄傲，尤其对于外国人，他的骄傲是故意为之——中国虽落后，但他要代表天朝的尊严。他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武器装备，但并不欣赏外国的文化，自豪于中华的文化。学习外国之长，但绝不媚外，这就是李鸿章的独特魅力。

4．李鸿章是忠臣，但并不清廉，因为他名下财产巨大。敢作敢当，做实事，也从不回避对享受和金钱的追求，这也是他与一般官僚士大夫不同的地方。

5．作者评价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缺点；不辞辛劳，不怕诽谤，是其优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据说李鸿章创造了中国近代500多个“第一”，已经说明他的改革兴邦思想，已经算是行为破格了，他不可能触及封建体制和文化，这是他无法突破的局限。他晚年自称“裱糊匠”，似乎也深有一份自知吧。

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我看到日本一家报纸，有个叫德富苏峰的人撰文评价李鸿章，有些独到，译录如下：

中国的名人李鸿章逝世了，从此东亚地区的政局，恐怕有些寂寞了，不只为清朝失去一位栋梁之材而惋惜。

如果说李鸿章多么伟大，事功多么崇隆，不如说他的福命超过一般人。李鸿章早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名声地位高雅；太平天国之乱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僚，后来统率淮军，借戈登的洋枪队平定江苏；平定捻军，也是禀承了曾国藩的策略，才大功告成；做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后被法国要挟时，普法战争爆发，法、俄、英、美都回去处理西欧大事，天津教案事就不了了之。近25年来，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在天津开衙门行政，政府大权在握，在世界舞台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李鸿章的全盛时代。

虽然，李鸿章的地位和势力不是侥幸得来的，但他在中国的文武百官中，确实有卓绝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非常人可比。他看到西风东渐的大势，看到外国的先进文明，借鉴以自强。他的这种眼光，即使是他的前辈曾国藩，恐怕也不如，左宗棠、曾国荃就更不用提了。



晚年李鸿章

李鸿章在天津用西洋办法屯练淮军；他兴办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设防；他开办轮船招商局，方便沿海地区的交通；他开设机器局，制造兵器；他开办开平煤矿；他倡议修建铁路……他在军事、商务、工业等方面，无不留意。虽然，这些想法是否出自他本人先不说，权力是否全在他手上先不说，结果是否有成效先不说，但如果说是谁引导大清国前行并达到目前地步，不能不首屈一指说：是李鸿章。

世人都知道李鸿章，却未必知道北京的清政府。尽管清政府对他并不是很信

任，甚至常猜疑嫉恨他，但因为外界的压迫，为了排忧解难，不得不用他。而且各省总督、巡抚，以及朝中百官，到处都有与李鸿章不和的人。所以，即使在其全盛时代，李鸿章在内阁的势力，也已经很薄弱了，并非外人所看到的那样，有着无限的权力和风光。

中日之战，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最初就蓄意发动这场战争吗？对此我们不能明确。但看他在情势紧张、两国关系决裂时，他忽然与俄国公使喀希尼商量，想请俄国派兵干涉。从一开始就往朝鲜派驻了军队，大概是想威胁日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概他自视过高，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而对日本的了解不够，不知整个东亚的大局，所以有些失算了。这是他的一个错误。总之，中日战争是李鸿章孤注一掷的一大赌注了。只是此一掷不中，致使他多年积累的功绩、声名，几乎一扫而光。

寻常人如果遭此失意，不忧愤而死才怪。但73岁高龄的李鸿章，面对国内朝廷的诟病，在外仍努力支撑残局，挺身而出负责议和谈判事宜，不幸又被刺伤，却还能从容应对，不辱使命。后来，他又到俄国祝贺俄国皇上加冕，访问欧美各国，就像没发生什么不快似的，毫不介怀。他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也在于此。

李鸿章晚年萧条。他前半生亲近英国，后半生亲近俄国，所以英国说他卖身于俄国。李鸿章亲俄，是害怕俄国，还是信任俄国呢？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国家，宁愿以关外的土地相贿赂，以期得到俄国的保护，得到一时的安宁。应该是最大原因。他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满洲条约》，有人说他就像秦桧侍奉金国，是卖国的贼臣。这评论未免过头了。因为李鸿章的行为，事关利害得失问题，而非善恶正邪问题。

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李鸿章或者去山东治理黄河，或者到两广担任商务大臣和两广总督，直到义和团之事起，他才再次任直隶总督，与庆亲王一起担任议和大臣，刚办完，他就溘然长逝了。真是悲哀的晚年啊！但不能说是耻辱的晚年。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的雄心，至死没消磨殆尽。

如果李鸿章死在中日战争之前，那他就是19世纪的一个伟人，修世界史的人必然为他大书特书。他容貌堂堂，善于辞令，机警敏锐，收放自如，一看就知道是个伟人。他的血管中有没有英雄的血液呢？这个我不敢说。他没有格兰斯顿的高尚道义情怀；他没有俾斯麦倔强的男子汉气概；他没有康必达的爱国热忱；他没有西乡隆盛那样推心置腹的至诚之心。至于他的经历和见识，也不足以让我感动佩服。总之，李鸿章不能成为鼓舞他人令人崇拜的偶像级英雄。

尽管如此，李鸿章的大手笔，还是令人惊叹的。他是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不惊慌失魂，不恼怒生气，能忍别人所不能忍。对别人伤心失望的事情，对他如浮云。他内心怎么可能没有恼恨呢？但在他身上不留痕迹。铁血宰相俾斯麦，一朝失意下台，怒火中烧，如火一样直喷出来。但李鸿章面对大事，看上去无足轻重，不足挂齿，毫不忧虑，他的容忍性，令人崇敬

但不可企及。

如果李鸿章像诸葛亮那样做人做事，那他不可能生存于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的历史，正是中国封建王朝走向衰亡的历史，如剥离笋皮，日益紧急；与他同时代的人几乎都死去，他以前半生光明，后半生灰暗而告终。但他对此并不困惑。有人说：“他是个没脑没心之人。”但天下有几个这样没脑没心的人呢？没脑却做出这样的成绩，不是真正值得可敬可叹吗？

陆奥宗光评价李鸿章说：“说他胆量过人，才干卓绝，有决断力，倒不如说他聪明机敏，有大智慧，善于谋划，能预料事情的利害得失。”这话说得很对。李鸿章从不逃避责任，这是别人比不上的，也因此是清朝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当权人物，临死还身负重任，中外各界对他期望很高。有人说：“他无视这些责任，所以再大的责任，他也义不容辞地担当。”但正是这点，使他能成就大事。

李鸿章是中国的代表人物。他像个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唯强者是从，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容忍力之强，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倔强无私，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巧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狡猾和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自信自大，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识量，没有诸葛亮那种治国的忠诚，也没有王安石的学究气，但他能以逸待劳，机智周旋，虚心静气，面对百般的危难和纠纷，总能从容解决。遍寻海内外，实在找不到他这样的人了。

以上的评论，确实能一览无遗地摹写出李鸿章这个人的真面目，没过分褒扬，也没过分贬低，我没什么再多说的了。至于他以李鸿章为我国人民的代表人物，我四亿同胞不能不深加反省了。

读后感悟

1．通过外媒对李鸿章的记叙和评价，作为了解李鸿章的一个侧面。而外媒对李鸿章的记叙和评价还算客观中肯。这篇文章出于日本作者之手，可见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是多么深刻！

2．文章认为：李鸿章数十年位高权重，福命不薄；早年军功，后来又主持外交、行政，功高盖世，高超的手腕和卓绝的眼光使其脱颖而出，无可替代；以夷制夷，开明办洋务，引导中国自强，等等，均见他的大手笔。但甲午战败声名损，《楷行马关》、《楷行丑》、《中俄密约》等招来骂名和种种诋毁，但李鸿章从不逃避责任，从不介怀，不惧诋毁，容忍力超强，可见他的大胸怀。

3．成功越大，痛苦也越多。李鸿章风光显赫的表面背后，是皇上反复无常的态度和朝臣的嫉恨诋毁，是签约时的无奈和屈辱，是面对骂声的隐忍和委屈……李鸿章也是人，怎么没有感知？但他内心淡定，表现从容，不停止自己的事，除了意志容忍，更见一种大智慧。

4．文章指出，李鸿章虽是不可多得的英雄，但以他的才能和道德，他还不足

以成为值得崇拜的伟大英雄，这点和作者的观点是相似的。大概李鸿章失在对道义的某种伤害。

5．李鸿章虽然过世了，但直到生命尽头，还是心有不甘，雄心不已。他一生追逐功利，大胆务实，终生忙碌，任人评说。作为生命的李鸿章虽然过世了，但作为特定时期代表人物的李鸿章，至今仍在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绝非偶然现象。

6．文章最后指出，李鸿章是中国人的代表人物，他身上的冷漠、软弱、忍耐、固执、健谈、城府、自信自大等特性，也是中国人的普遍特性，实在是很深刻到位，所以警醒国人要深思。

我惜我叹李鸿章

我以前写过《饮冰室自由书》，里面有一篇文章是《20世纪之新鬼》，我把其中论述李鸿章的文字附录于下：

唉！星亨、格里士比真是豪杰啊！这五个人（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都是他们国家的栋梁。除了域多利亚是立宪国家的君主，不必负责任，不必多说外，像格里士比，麦坚尼，都让自己的国家焕然一新。像星亨，想改变国家面貌但没有实现。李鸿章相比这三个人，就逊色了。

李鸿章每每辩解说：“我被全国人牵制，有志却不能申。”虽如此，但比起星亨、格里士比排除万难、忍辱冒险，最终达到目的的人如何？真英雄不靠别人，而能自己营造势力。就像星亨、格里士比那样。而李鸿章只会在政府的统治下，安于荣华。如果他立志强国利民，以他这样一个掌权40年又功勋卓著的老臣，怎么不会赢得民心，战胜旧党呢？

可惜啊！李鸿章没有星亨有学识，没有格里士比有热情，资本多于他们十倍，但成就却远远不如他们。

根本来说，李鸿章真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啊！但是，偌大一个中国，有学识又有热诚，超过李鸿章的人又有几个呢？整个19世纪，各国都有英雄，唯独我国没有，所以我们怎能不指鹿为马，聊以自慰，自我解嘲呢？于是就把李鸿章推出来说：“他是我国的英雄。”

唉！他也只能算我国的英雄，是我国19世纪以前的英雄罢了。

总之李鸿章有才能而没学识，有阅历而没血性。他并非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只是弥补缺漏、苟且偷安。虽然他生前从不逃避责任，但从没有福泽后人的百年大计。



李鸿章手迹

谚语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上而下，中国人的心理，无不如此，李鸿章不过是个的代表。虽如此，现在满朝二品以上、50岁以上的高官，没人能比得上他，这个我敢断言。

唉！李鸿章时代的败绩，已经不少了。今后的内忧外患，会比以前更多，但现在还是难以找到像李鸿章这样一个人。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路在何方，终归何处。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读后感悟

1．相对于外国的英雄人物，李鸿章还是相形见绌，作者重申他不满于李鸿章的安于现状，依靠别人，不能突破性工作，缺少血性魄力，只能缝补缺漏，做一个“裱糊匠”。所以作者认为他只能成为中国的英雄，而且只能是19世纪以前的英雄。

2．在批评的同时，作者又肯定李鸿章在同辈人中的翘楚地位和无可替代。尤其肯定他临危不惧，从不逃避责任的敬业精神。

3．在评价完李鸿章后，又归于对中国现状的关注——李鸿章纵使不才，但遍

观眼下内忧外患的中国，却找不出第二个李鸿章来，心生惆怅，不免发问：中国的出路何在？又归向何处？热切呼吁政府不拘一格降人才，希望那个能救中国于水火的英雄能早日出现。忧国之思既深又长。

下　原文部分

序例

一、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

二、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论，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

三、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谬误之处，知所不免。补而正之，愿以异日。

四、平吴之役，载湘军事迹颇多，似涉支蔓；但淮军与湘军，其关系极繁杂；不如此不足以见当时之形势，读者谅之。

五、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沓，尽录入之。

六、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第一章　绪论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注：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读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

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盐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有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

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矣。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又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藉，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

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

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有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㧑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光绪十年至光绪廿—年；第四，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第五，刚毅、荣禄时代，光绪廿四年至今。

案：观此表，亦可观满汉权力消长之一斑。自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其后李文正，翁师传，孙、徐两尚书继之，虽其人之贤否不必论，要之，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一变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长，以不关此书本旨，不具论。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

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又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而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断断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于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时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飚，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贼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骚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

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面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适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阘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知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人，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军之骄汰腐败，更甚

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十年，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未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洊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纭，谤渎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扬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厄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
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
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
常胜军之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之关系
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而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而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升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甚。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忠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经历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朝廷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

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案：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必其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政府之腐败，久已为西人所厌惮，其属望于革命军者必加厚，亦情势之常矣。彼时欧美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外谙交涉，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戮，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之父也）。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弊之极，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沈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

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而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溯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件（薛焕，原江苏巡抚也）。

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劄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敌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

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势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广福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沪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沪也，曾国荃与杨载福（后改名岳斌）、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月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灾，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浸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

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巨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以后，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遂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急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洸拥众十余万犯北新泾（江苏地，去上海仅数里）。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溪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美国人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变，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藉。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力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江浙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江浙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殆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

案：自此役以后，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屯兵于坚城之下，兵家所大忌也。向荣、和春，即两度以此致败，故曾文正甚鉴之，甚慎之。曾忠襄之始屯雨花台，文正屡戒焉。及至此役，外有十倍强悍之众，内有穷困决死之寇，官军之危，莫此为甚。乃敌军明知官军之寡单如此，其疮痍又如彼，而卒不敢肉搏突入，决一死命，以徼非常之功于俄顷，而顾亏此一篑，忽焉引去，遂致进退失据，随以灭亡，何也？盖当时敌军将帅富贵已极，骄侈淫佚，爱惜生命，是以及此。此亦官军所始念不及也。曾文正曰：“凡军最忌暮气。当道、咸之交，官军皆暮气，而贼军皆朝气，及同治初元，贼军皆暮气，而官军皆朝气。得失之际，皆在于是。”谅哉言乎。以李秀成之贤，犹且不免，若洪秀全者，冢中枯骨，更何足

道。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殷鉴不远，有志于天下者，其可以戒矣。洪秀全以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金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株守一城，坐待围击。故向荣、和春之溃，非洪秀全自有可以不亡之道，特其所遇之敌，亦如唯与阿，相去无几，故得以延其残喘云尔。呜呼！曾、洪兴、废之间，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

又案：此役为湘淮诸将立功之最大关键。非围金陵，则不能牵江浙之敌军，而李文忠新造之军，难遽制胜，非攻江浙，则不能解金陵之重围，而曾忠襄久顿之军，无从保全。读史者不可不于此着眼焉。

李秀成之围金陵也，使其别将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绍洸等率众十余万，分道自金山、大仓而东，淮军诸将防之，战于三江口、四江口，互有胜败。敌复沿运河设屯营，亘数十里，架浮桥于运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来，进攻黄渡，围四江口之官军甚急。九月廿二日，鸿章部署诸将，攻其本营。敌强悍善战，淮军几不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士气一振，大破之，擒斩万余人，四江口之围解。

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滑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胁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资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之。

白齐文黜后，欲杀之，而为美领事所阻，遂放之。复降于李秀成，为其参谋，多所策划，然规模狭隘。盖劝秀成弃江浙，斩其桑茶，毁其庐舍，而后集兵力北向，据秦晋齐豫中原之形势，以控制东南，其地为官军水师之力所不及，可成大业云云。秀成不听。白齐文又为敌军购买军械，窃掠汽船，得新式炮数门，献之秀成。以故苏州之役，官军死于宝带桥者数百人。其后不得志于秀成，复往漳州投贼中，卒为郭松林所擒死。

先是曾国藩获敌军谍者，得洪秀全与李秀成手谕，谓湖南北及江北，今正空虚，使李秀成提兵二十万，先陷常熟，一面攻扬州，一面窥皖楚。国藩乃驰使李鸿章使先发制之，谓当急取太仓州以扰常熟，牵制秀成，使不得赴江北。鸿章所见适同。同治二年二月，乃下令常熟守

将，使死守待援，而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所部驾轮船赴福山，与敌数十战，皆捷。别遣程学启、李鹤章攻太仓昆山县以分敌势，而使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共攻福山，拔之，常熟围解。三月，克复太仓、昆山，擒敌七千余，程学启之功最伟。戈登自此益敬服学启焉。

五月，李秀成出无锡，与五部将拥水陆兵数十万图援江阴，据常熟。李鸿章遣其弟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分道御之。铭传、松林与敌之先锋相遇，击之，获利。然敌势太盛，每战死伤相当。时敌筑连营于运河之涯，北自北漍，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垒堡百数，皆扼运河之险，尽毁桥梁，备炮船于河上、水陆策应，形势大炽。

鹤章与铭传谋，潜集材木造浮桥，夜半急渡河袭敌，破敌营之在北漍者三十二。郭松林亦进击力战，破敌营之在南漍者三十五。周盛波之部队，破敌营之在麦市桥者二十三。敌遂大溃，死伤数万，河为不流，擒其酋将百余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称是。自是顾山以西无敌踪。淮军大振。六月，吴江敌将望风降。

程学启率水陆万余人，与铭传谋复苏州。进破花径港，降其守将，屯潍亭。七月，李鸿章自将，克复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使铭传攻江阴。敌之骁将陈坤书，与湖南、湖北、山东四大股十余万众，并力来援。鸿章、铭传亲觇敌势，见其营垒大小棋列，西自江滨，东至山口，乃定部署猛进攻之。敌抵抗甚力，相持未下。既而城中有内变者，开门纳降，江阴复。

时程学启别屯苏州附近，连日力战，前后凡数十捷。敌垒之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邱、观音庙者十余处，皆陷。而郭松林之军，亦大捷于新塘桥，斩伪王二名，杀伤万余人，夺船数百艘，敌水军为之大衰。李秀成痛愤流涕，不能自胜。自是淮军威名震天下。

敌军大挫后，李秀成大举图恢复，使其部将纠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处众八万余，船千余只，出运河口，而自率精锐数千，据金匮援苏州，互相策应，与官军连战，互有胜败。十月十九日（二年），李鸿章亲督军，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迫苏州城，苦战剧烈，遂破其外郭。秀成及谭绍洸等引入内城，死守不屈。既而官军水陆并进，合围三面，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其裨将部云官等，猜疑携贰，遂通款于程学启，乞降。于是学启与戈登亲乘轻舸造城北之阳澄湖，与云官等面订降约，

使杀秀成、绍洸以献，许以二品之赏。戈登为之保人，故云官等不疑。然卒不忍害秀成，乃许斩绍洸而别。

李秀成微觉其谋，然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乃乘夜出城去（十月廿三夜）。廿四日，谭绍洸以事召云官于帐中，云官乃与晓将汪有为惧，见绍洸，即刺杀之，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开门降。廿五日，云官等献绍洸首，请程学启入城验视。其降酋之列衔如下：

一、纳王部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此八将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苏州定，鸿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先是八酋之降也，戈登实为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案：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弑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

苏州之克复，实江南戡定第一关键也。先是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深入重地，彼此不能联络策应。故力甚单而势甚危。苏州之捷，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欲乘胜进入浙地，与曾、左两军互相接应，合力大举，是为官军最后结果第一得力之着。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拔之。擒斩其将黄子漋父子。于是鸿章分其军为三大部队：其（甲）队，自率之；（乙）队，程学启率之，入

浙，拔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迫嘉兴府。左宗棠之军（浙军），亦进而与之策应，入杭州界，攻余杭县，屡破敌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率之，与常胜军共略常州，大捷，克复宜兴、荆溪，擒敌将黄靖忠。鸿章更使郭松林进攻溧阳，降之。

时敌将陈坤书，有众十余万，据常州府，张其翼以捣官军之后背。李鸿章与刘铭传当之，敌军大盛，官军颇失利。坤书又潜兵迂入江苏腹地，出没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戒严，江苏以西大震。李鸿章乃使刘铭传独当常州方面，而急召郭松林弃金坛，昼夜疾赴，归援苏州。又使李鹤章急归守无锡，杨鼎勋、张树声率别军扼江阴之青阳、焦阴，断敌归路。时敌军围常熟益急，苦战连日，仅支。又并围无锡，李鸿章坚壁固守几殆。数日，郭松林援军至，大战破敌，围始解。松林以功授福山镇总兵。

先是程学启围嘉兴（此年正月起）极急，城中守兵，锋锐相当，两军死伤枕藉。二月十九日，学启激励将士，欲速拔之，躬先陷阵，越浮桥，肉搏梯城。城上敌兵死守，弹丸如雨，忽流弹中学启左脑仆。部将刘士奇见之，立代主将督军，先登入城。士卒怒愤，勇气百倍。而潘鼎新、刘秉璋等，亦水陆交进，遂拔嘉兴。

程学启被伤后，卧疗数旬。遂不起，以三月十日卒，予谥忠烈。李鸿章痛悼流涕。

嘉兴府之克复也，杭州敌焰大衰，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十九嘉兴克复），敌大队乘夜自北门脱出。左军以三月二日入杭州城，至是苏军（李军）与浙军（左军）之连络全通，势始集矣。

程学启之卒也，鸿章使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领其众，与郭松林会，自福山镇进击沙山，连战破之。至三河口，斩获二万人。鸿章乃督诸军合围常州，使刘铭传击其西北，破之；郭松林攻陈桥渡大营，破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槐等袭河边敌营廿余；皆破之。败军溃走，欲还入城，陈坤书拒之，故死城下者不可胜数。三月廿二日，李军进迫常州城，以大炮及炸药轰城，城崩数十丈，选死士数百人，梯以登。陈坤书骁悍善战。躬率悍卒出战拒之，修补缺口，官军死者数百人。鸿章愤怒，督众益治攻具，筑长围，连日猛攻，两军创巨相当。经十余日，李鸿章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身先士卒，奋战登城，敌始乱。陈坤书犹不屈，与其将费天将共率悍党，叱咤巷战，松林遂力战擒坤书，天将亦为盛波所擒。铭传大呼传令，投兵器降者赦

之，立降万余。官军死者亦千数。常州遂复，时四月六日也。至是江苏军（李军）与金陵军（曾军）之联络全通，江苏全省中，除金陵府城内无一敌踪矣。

自同治元年壬戌春二月，李鸿章率八千人下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斗各地，大小数十战，始于松江，终于嘉兴、常州，凡两周岁至同治三年甲子夏四月，平吴功成。

案：李鸿章平吴大业，固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不徒常胜军之战胜攻取而已。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而左宗棠平浙之功，亦得力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之徒甚多。本朝之绝而复续，盖英法人大有功焉。彼等之意，欲藉以永保东亚和平之局，而为商务之一乐园也。而岂料其至于今日，犹不先自振，而将来尚恐不免有大革命（Great revolution）在其后乎。

先是曾国荃军水陆策应，围金陵既已二稔，至甲子正月，拔钟山之石垒，敌失其险，外围始合，内外不通，粮道已绝，城中食尽；洪秀全知事不可为，于四月二十七日饮药死。诸将拥立其子洪福。当时官军尚未之觉。朝旨屡命李鸿章移江苏得胜之师助剿金陵，曾国荃以为城贼既疲，粮弹俱尽，歼灭在即，耻借鸿章之力，而李鸿章亦不愿分曾之功，深自抑退，乃托言盛暑不利用火器，固辞不肯进军。朝廷不喻鸿章之旨，再三敦促，国荃闻之，忧愤不自胜，乃自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将士猛攻地保城（即龙膊子，山阴之坚垒，险要第一之地也），遂拔之。更深穿地道，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隧道十余处皆成。乃严戒城外各营，各整战备，别悬重赏募死士，约乘缺以先登。

时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后，号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人曾营，纵火哗噪。时官军积劳疲惫，战力殆尽，骤遇此警，几于瓦解兽散，幸彭毓橘诸将率新兵驰来救之，仅乃获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坏廿余丈。曾军将叱咤奋登，敌兵死抗，弹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余人。众益奋发，践尸而过，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决死志，以所爱骏马赠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敌大小将弁战死焚死者三千余人。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城

中兵民久随洪氏者男女十余万人，无一降者。自咸丰三年癸丑，秀全初据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案：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左、李亦人豪矣。

金陵克复，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皆封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恩赏有差。国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诸将，咸嫉其功，诽谤谗言，蜂起交发，虽以左宗棠之贤，亦且不免，惟李鸿章无间言，且调护之功甚多云。

案：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捻乱之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之失机
曾、李平捻方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金陵克复，兵气半销。虽然，捻乱犹在，忧未歇也。捻之起也。始于山东游民。及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金陵，安徽全省大震，捻党乘势，起于宿州、亳州、寿州、蒙县诸地，横行皖、齐、豫一带，所到掠夺，官军不能制。其有奉命督师者，辄被逆击，屡败衄，以故其势益猖。及咸丰七年冬，其游骑遂扰及直隶之大名府等地，北京戒严。

今将捻乱初起以讫李鸿章督师以前，迭次所派平捻统帅列表如下：

人	官	任官年份	屯驻地
善禄	河南提督	咸丰三年	永城县
周天爵	钦差大臣	咸丰三年	宿州
吕贤基	工部左侍郎	咸丰三年	安徽
陆应榖	河南巡抚	咸丰三年	开封府
袁甲三	钦差大臣	咸丰三年	宿州（周天爵卒代之）
舒兴阿	陕甘总督	咸丰三年	陈州
英桂	河南巡抚	咸丰四年	开封府
武隆额	安徽提督	咸丰五年	亳州
胜保	钦差大臣	咸丰七年	督江北军
史荣春	提督	咸丰八年	曹州兖州

田在田	总兵	咸丰八年	曹州兖州
邱联恩	总兵	咸丰八年	鹿邑
朱连泰	总兵	咸丰八年	亳州
傅振邦	总兵	咸丰九年	宿州
伊兴额	都统	咸丰九年	宿州
关保	协领	咸丰九年	督河南军
德（楞）额	协领	咸丰九年	曹州
胜保	都统钦差大臣	咸丰十年	督河南军关保副之
穆腾阿	副都统	咸丰十年	安徽（副袁甲三）
毛昶照	团练大臣	咸丰十年	河南
僧格林沁	蒙古亲王	咸丰十年	
曾国藩	钦差大臣	同治三年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热河，捻党乘之，侵入山东，大掠济宁。德楞额与战，大败。始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追蹑诸捻，号称骁勇。同治二年，发党诸酋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合于捻。捻酋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各拥众数万，出没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州县，来往倏忽，如暴风疾雨，不可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捻党一股入湖北，大掠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处。舒保战死，僧王之师屡溃。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其时金陵新克复，余党合于捻者数万人，又转入河南、山东，掠城市。四年春，僧王锐意率轻骑追逐其酋，一日夜驰三百里。至曹州，部下多怨叛。四月廿五日，遂中捻首之计，大败，力战堕马死，朝廷震悼。急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而命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国藩粮运后援。

先是官军之剿捻也，惟事追蹑，劳而无功，间讲防堵，则弥缝一时耳。要之，无论为攻为守，非苟且姑息以养敌锋，则躁进无谋以钝兵力，未尝全盘打算，立一定之方略，以故劳师十五年，而无所成。自曾国藩受事以后，始划长围圈制之策，谓必蹙敌一隅，然后可以聚歼。李鸿章禀承之，遂定中原。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京畿，情形危

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寇，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明孙传庭谓剿流寇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后此大功之成，实由于是。

其年五月，任柱、赖汶洸等大股深入山东。鸿章命潘鼎新、刘铭传尽力追蹑，欲蹙之于登莱海隅，然后在胶莱咽喉，设法扼逼，使北不得窜人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六月，亲督师至济宁，相度形势，以为任、赖各股，皆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众，狡猾剽悍，未可易视，若兵力未足兜围，而迫之过紧，画地过狭，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窜，稍纵即逝，全局又非。于是定策先防运河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乃东抚丁宝桢，一意欲驱贼出境，于鸿章方略，颇多龃龉。七月，敌军突扑潍河，东省守将王心安方驻防戴庙，任敌偷渡，而胶莱之防遂溃。是时蜚谤屡起，朝廷责备綦严，有罢运防之议。鸿章复奏，以为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虽受蹂躏，然受害者不过数府县之地，驱过运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未便歧视也。乃坚持前议，不少变。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邱、潍县之交，大战获胜。二十四日，追至赣榆，铭传与马步统将善庆力战，阵毙任柱，于是东捻之势大衰。

二十八日，潘鼎新海州上庄一战，毙悍贼甚夥。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在潍县、寿光抄击一昼夜，敌众心撼，投降遂多。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继之，无战不捷。至二十九日，铭传、松林、鼎勋等，蹑追七十里，至寿光弥河间，始得接仗。战至十数回合，又追杀四十余里，斩获几三万人，敌之精锐器械骡马辎重抛尽。鸿章奏报中，谓“军士回老营者，臣亲加抚慰，皆饥惫劳苦，面无人色”云。赖汶洸在弥河败后，落水未死，复纠合千余骑，冲出六塘河防。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水陆马步，衔尾而下，节节追剿，只剩数百骑，逼入高室水乡。鸿章先派有统带华字营淮勇之吴毓兰，在扬州运河扼守。诸军戮力，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毓兰生擒汶洸。东捻悉平，东、苏、

皖、豫、鄂五省，一律肃清。

鸿章奏捷后，附陈所属诸军剿捻以来，驰逐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忧谗畏讥，多人生未历之苦境。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皆迭乞开缺，请稍为休养，勿调远役。并以刘铭传积劳致病，代为请假。三月。乃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大股，忽由山右渡河北窜，直逼畿辅。京师大震。初七初八日迭奉寄谕饬催刘铭传、善庆等马步各营，迅赴河北进剿，鸿章以铭传疲病正在假期，不忍遽调，乃率周盛波、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鼎字全军，及善庆、温德克勒西马队，陆续进发，由东阿渡河，饬郭松林、杨鼎勋整饬大队，随后继进。

西捻之役，有较东捻更难图功者，一则黄河以北，平坦千里，无高山大河以限之，张总愚狡猾知兵，窜扰北地平原，掳马最多，飙忽往来，瞬息百里，欲设长围以困之，然地势不合，罗网难施，且彼鉴于任、赖覆辙，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出，不容官军闲暇，次第施工，此一难也，二则淮军全部，皆属南人，渡河以北，风气悬殊，南勇性情口音，与北人均不相习，且谷食面食，习惯不同，而马队既单，麸料又缺，此二难也。鸿章乃首请饬行坚壁清野之法，以为“前者任、赖捻股，流窜中原数省，畏墟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气强悍，被害已久，逐渐添筑墟寨，到处兴城池相等，故捻逆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惟湖北、陕西被扰最甚，以素无墟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直、晋向无捻患，民气朴懦，未能筑寨自守。张总愚本极狡猾，又系穷寇，南有黄河之阻，必致纵横驰突，无处不流，百姓惊徙蹂躏，讵有已时，可为浩叹。（中略）自古用兵，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马多而我马少，自有不相及之势；彼可随地掠粮，我须随地购粮，贼常饱而兵常饥，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有苦劝严谕河北绅民，赶紧坚筑墟寨，一有警信，收粮草牲畜于内，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贼死命，云云。”西捻之平，实赖于是。

四月，奏请以刘铭传总统前敌各军，温旨敦促起行。使淮军与直、东民团，沿黄河运河，筑长墙浚壕以蹙敌。拣派各军，轮替出击，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须暂休息之军，即在运河东岸择要屯驻，俟敌窜近，立起迎击，以剿为防。又派张曜、宋庆分扎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扎陵县、吴桥一带，为运防遮护。左宗棠亦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军，自连镇北至沧州一带减河东岸分扎，与杨鼎勋等军就近策应，布置略定，然

后进剿。

五月，捻股窜向西北，各军分途拦击，叠次获胜。鸿章乃趁黄河伏汛盛涨时，缩地围扎，以运河为外圈。而就恩县、夏津、高唐之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里圈。逼贼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各军迭次大捷，敌势衰蹙，阵散渐多。六月十九至二十二等日，乘胜尾追，每战皆捷。二十三日，张总愚涉水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冒雨至高唐，敌已向博平、清平一带，图扑运河。而官军早于马颊河西北岸筑长墙数百里，足限戎马，敌方诇知已人彀中，窜地愈狭，死期近矣。是时各军已久追疲乏，鸿章乃派刘铭传生力马军助战，军势大振。二十八日，将敌圈在徒骇、黄、运之间，铭传调集马步迎击，追剿数里，值郭松林东来马步全军。拦住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陷，刘、郭两军马队，五六千人，纵横合击，擒斩无算。张总愚仅带数十骑北逃，旋自沉于河以死。西捻肃清，中原平。八月，李鸿章入觐京师。

李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虽曰天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其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哉！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之感而已。其平吴也，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掣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良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洋务之治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之由

“洋务”二字，不成其为名词也。虽然，名从主人，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二十余年之事业。

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今试取其平定发捻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所办洋务列表如下：

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二年正月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
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十月
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
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年四月
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正月
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五月
设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
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遣使日本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元年十二月
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三月
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二年十一月
始购铁甲船	光绪二年二月
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二年七月
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二年八月
请开铁路	光绪二年十二月
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四月
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六月
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七年十一月
筑旅顺船坞	光绪八年二月
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八年四月
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一年五月
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十四年
设医学堂于天津	光绪二十年五月

以上所列李鸿章所办洋务，略具于是矣。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盖彼以善战立功名，而其所以成功，实由与西军杂处，亲睹其器械之利，取而用之，故事定之后，深有见夫中国兵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其心力瘁于此者亦至矣。计中日战事以前，李鸿章手下之兵力，大略如下：

北洋海军兵力表（略）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复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

创或痍，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划，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臣斲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

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云：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沈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

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首先攻击（Cast the first stone）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跌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

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于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踌躇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

此两国各执一理，纠葛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贻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朝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

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朝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

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五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舵，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凤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坠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师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舰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驻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晨，瞭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群甫离，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

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水，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副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仁川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廿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崑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南江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

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阘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一、依克唐阿奉天将军满洲马队以光绪二十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提督新募军以光绪二十年□月派总统前敌各军。
三、吴大澂湖南巡抚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两江总督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咪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团练之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澂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一表，以志末路之感：

经远	铁甲船	沉	黄海
致远	钢甲船	沉	黄海
超勇	钢甲船	沉	黄海
扬威	钢甲船	火	黄海
捷顺	水雷船	夺	大连湾
失名	水雷船	沉	旅顺口外
操江	木质炮船	夺	丰岛中
来远	铁甲船	沉	威海卫
威远	练习船	沉	威海卫
福龙	水雷船	夺	刘公岛外
靖远	钢甲船	沉	刘公岛外
定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镇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平远	钢甲船	降	刘公岛中
济远	钢甲船	降	刘公岛中

其余尚有康济、湄云之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镇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炮船三，凡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有。其中复有广东水师之广甲、广丙、广乙三船，或沉或降。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

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制于人而不能制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阘冗恇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盲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或谓伯谦实为救火保船。海军兵机当尔云），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殉身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曾、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概，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崑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就，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澂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被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焰尤咻咻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嘻！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淮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

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此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呜呼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故于此事特留意焉。

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弥，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藉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而法人之心犹未餍，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落拔除摧烧，即此时也），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时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身价顿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所办交涉事件以十数，而其关系最重者，为法国安南之役、日本朝鲜之役。光绪八年，法国有事于安南，眈眈逐逐，思大有所逞。与中国既定约，而复借端毁弃之。于是中法战事开，法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海南，次踞台

湾，直捣福州，歼我舰队，其陆军则自越之东京，出略云南、贵州，如是，则水陆两者必大有所获，将来东方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达本国，请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乘福州之无备，轰我船厂，坏我兵船，一面以陆军迫东京。当时南方之天地，大有风云惨淡之观，李鸿章乃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时曾纪泽方充英使，受命办此事。虽未能成，而法政府因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格鲁比时方攻台湾之淡水，不能下，安南之陆兵，又为黑旗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决之报，大愤几死。法人乃先请和于我。李鸿章此役以后，其外交手段，始为欧人所注视矣。

当法事之方殷也，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纠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伊藤博文来津交涉。乃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盖得意时泄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仅约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而已，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虽然，此约竟为此后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呜呼！庄生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弈者每于至闲之着，断断不肯放过。后有当此局者，可无慎欤。战事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和外，更无长策。正月，乃派张荫桓、邵友濂讲和于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乃更派李鸿章。二月遂行，随带参赞李经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翌日首议停战条件，日本首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即便议和。伊藤言："既若尔，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以后不许再提及。"彼此磋磨未决。及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章，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画押。口舌所不能争者，藉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于是议和前一节，略有端绪。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须静养多

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遇刺后降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实一切自行裁断，虽创剧偃卧，犹口授事机，群医苦之。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将所拟和约底稿交来。十一日，李备复文，将原约综其大纲，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极力驳议。十五日，复另拟一约底送去，即拟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厅县地方等，日本亦条条驳斥。十六日，伊藤等又备一改定约稿寄来，较前稍轻减，即《马关条约》之大概也。是日鸿章创已愈，复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面议。刻意磋磨。毫无让步。惟有声明若能于三年内还清债款，则一律免息，及威海卫驻兵费，减一半耳。今将其条约全文列下：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定和约，俾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彼此较阅所奉谕旨，认明均属妥实无阙，会同议定各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界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　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

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均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第六款　日中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计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日中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第十款　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　本约奉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

观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一八七〇年法爹亚士之使于普。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时之意气，殆如昨梦。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诟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侩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论之，则李之误国，在前章所列失机之十二事，而此和议，不过其十二事之结果，无庸置论者也。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三国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骋欧洲
任外交官时代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役
李鸿章出总署

十九世纪之末，有中东一役，犹十八世纪之末，有法国革命也。法国革命，开出十九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二十世纪之亚细亚。譬犹红日将出，鸡乃先鸣，风雨欲来，月乃先晕，有识者所能预知也。当中日未战以前，欧人与华人之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二事。及战后数年间，而其关系之紧密，视前者骤增数倍。至今日，则中国之一举一动，皆如与欧人同体相属，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于内治之失政者半，由于外交之无谋者亦半。君子读十年来中外交涉史，不禁反而掩袖涕涔涔下也。

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于是。

当时中国人欲借欧力以拒日者，不独李鸿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张之洞时署江督，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报酬亦同"云云。当时所谓外交家者，其眼光手段大率类是，可叹。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

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

还辽事毕，喀希尼即欲将前此与李私约者，提出作为公文，以要求于总署。值物议沸腾。皇上大怒，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暂缓其请，以待时机。丙申春间，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乃改派李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复—面贿通太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太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

李鸿章抵俄京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巨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羡可畏哉！时丙申四月也。

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之数人外，几于无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报》竟于李鸿章历骋未归之时，得其密约原文，译录以登报上，盖闻以重金购之于内监云。其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前于中日肇衅之后，因奉大俄罗斯国大皇帝仗义各节，并愿将两国边疆及通商等事，于两国互有益者国商定妥协，以固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国钦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全权大臣，会同大俄罗斯国钦差出使中国全权大臣一等伯爵喀，在北京商定，将中国之东三省火车道接连俄国西伯里亚省之火车道，以冀两国通商往来迅速，沿海边防坚固，并议专条以答代索辽东等处之义。

第一条　近因俄国之西伯里亚火车道竣工在即。中国允准俄国将该火车道一由俄国海参崴埠续造至中国吉林珲春城，又向西北续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国境某城之火车站续造至中国黑龙江之爱珲城，又向西北续至齐齐哈尔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讷地方，又向东南续造至吉林省城止。

第二条　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

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国火车条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过期后，准由中国筹备资本，估价将该火车道并一切火车机器厂房屋等赎回。惟如何赎法，容后再行妥酌。

第三条　中国现有火车路，拟自山海关续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续至吉林。倘中国日后不便即时造此铁路者，准由俄国备资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为期赎回。至铁路应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国已勘定之道接续至盛京并牛庄等处地方止。

第四条　中国所拟续造之火车道，自奉天至山海关、至牛庄、至盖平、至金州、至旅顺口以及至大连湾等处地方，均应仿照俄国火车造，以期中俄彼此来往通商之便。

第五条　以上俄国自造之火车道所经各地方，应得中国文武官员照常保护，并应优待火车道各站之俄国文武各官，以及一切工匠人等。惟由该火车道所经之地，大半荒僻，犹恐中国官员不能随时保护周详，应准俄国专派马步各兵数队驻扎各要站，以期妥护商务。

第六条　自造成各火车道后，两国彼此运进之货，其纳税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陆路通商条约完纳。

第七条　黑龙江及吉林长白山等处地方所产五金之矿，向有禁例，不准开挖。自此约定后，准俄国以及本国商民随时开采，惟须应先行禀报中国地方官具领护照，并按中国内地矿务条程，方准开挖。

第八条　东三省虽有练军，惟大半军营仍系照古制办理。倘日后中国欲将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国借请熟悉营务之武员来中国整顿一切，其章程则与两江所请德国武员条程办理无异。

第九条　俄国向来在亚细亚洲无周年不冻之海口，一时该洲若有军务，俄国东海以及太平洋水师，诸多不便，不得随时驶行。今中国因鉴于此，是以情愿将山东省之胶州地方暂行租与俄国，以十五年为限。其俄国所造之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类，准中国于期满后估价备资买入。但如无军务之急，俄国不得即时屯兵据要，以免他国嫌疑。其赁租之款，应得如何办理，日后另有附条酌议。

第十条　辽东之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处地方，原系险要之处。中国极应速为整顿各事，以及修理各炮台等诸要务，以备不虞。既立此约，则俄国允准将此二处相为保护，不准他国侵犯。中国则允准将来永不能让与他国占踞。惟日后如俄国忽有军务，中国准将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处地方，暂行让与俄国水陆军营泊屯于此，以期俄军攻守之便。

第十一条　旅顺口、大连湾等处地方，若俄国无军务之危，则中国自行管理，与俄国无涉。惟东三省火车道以及开挖五金矿诸务，准于换约后即时便宜施行。俄国文武官员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处，中国官员理应格外优待保护，不得阻滞其游历各处地方。

第十二条　此约奉两国御笔批准后，各将条约照行。除旅顺口、大连湾及胶

州诸款外，全行晓谕各地方官遵照。将来换约应在何处，再行酌议。自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以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成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一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莫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莫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允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讫光绪廿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

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廿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有所闻。廿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吓，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于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廿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罢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款，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忽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镑，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俄人之愤愤，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于

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办无可办，欲诿无可诿，卒乃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藉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辩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时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争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廿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忽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线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磨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具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廿四日，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时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案：义和团时代李鸿章之外交于第十一章论之。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制人而不制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案：胶州以后诸役，其责任不专在李鸿章，盖恭亲王、张荫桓皆总理衙门重要之人，与李分任其咎者也，读者不可不知。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

两广总督

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其可称为闲散时代者，则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间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间凡两年而已。戊己庚之间，鸿章奉命治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在他人则为最优之差，而按之李鸿章一生历史，不得不谓为投闲也。

其闲之又闲者，为乙丙之间入阁办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无可论述，至其治河、治粤，固亦有异于常人者焉。附论及之，亦作史者之责任也。

中国黄河，号称难治。数千年政论家，皆以之为一大问题，使非以西人治密士失必河之法治之，则决不可以断其害而收其利。当戊戌八月以后，李鸿章方无可位置，于是政府以此役任之。此亦可为河防史上添一段小小公案也。今录其奏议所用比国工程师卢法尔勘河情形原稿如下：

一、雒口至盐窝沿河情形

河身。黄河自河南龙门口改道以来，水性趋下，由北而东，奔流山东，入大清河，遂取道入海。其始东奔西突，人力难施，至两年以后，河流已定，方筑堤岸。河流曲折，其堤岸亦因之而曲折。迨河流变迁，堤岸不能俱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然堤岸全无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河面宽处，水深仅四五尺，不便行船者，有河面忽窄，水深至三丈者。河流朝夕改道，旋左旋右，临流之岸，即为冲刷，带至流缓之处，又淤为滩。官民则任水所为，向无善策，惟于险处救急，决处补苴。而沿河常见岸土，于四五足高处，塌陷入水，际此隆冬，水小流缓，尚且如此，化冻之后，大汛之时，水大流急，更当如何？下游低岸如此，上游土山一带，不问可知。无怪黄河泥沙之多，为五大洲群流之最也。大汛时堤内沙滩，全为漫淹，因河底浅深不一，河身亦俯仰不一，故流水速率，处处不同。且下游之地极平，每里高低，不逾五寸，河流甚缓。容水之地，日益以隘，淤垫日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职此之故，堤外之地，较堤内之滩，有低一尺者，有低至七八尺者。监

工路过杨史道口时，曾将河面测量，计水面宽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二丈三尺，流水速率一秒钟约四尺。按此推算，每秒钟过水之数，约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容水面积约一万三千六百八十方尺。又在盐窝上游测量，计此处水面仅宽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一丈二尺，容水面积约九千一百八十方尺。斯时杨史道口尚未合笼，大留半归决口，不走盐窝，理合声明。至盛涨时，过水数目，言人人殊。按照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指示水志，计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系三万六千一百八十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方尺。因大水速率，无从探询，致过水之数，不能复计。然不知过水之数，断难定河面宽窄堤岸远近之数也。计自雒口至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滨河之堤，谓之民埝，系民所修，官所守，为现时东水最要之堤也。民埝距水，远近不等，有即在水滨者，有离水至三四里者，当时修造，任意为之，并无定理，甚至其弯曲有令人不可解者。其高低厚薄，亦各处互异，有高于现时水面九尺者，有高至一丈五尺者，高逾沙滩五尺至八尺不等，高逾堤外之地亦九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其堤顶有宽二丈四尺者，有宽三丈六尺者，新筑之埝则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其收坡亦斜直不同，良可异也。看守民埝，不甚周密，为水挖刷之处颇多，并无随时修理，积年累月，不至于决陷者几希。民埝皆以极松淤土为之，并无焦泥，入地不深。即有焦泥，不难挑取。埝顶可行大车、坐车、手车，轨道甚深，过路处或堤坡而上下，或截堤而低之。堤上筑盖民居，并不加宽培厚，凡此皆最易损堤者。查泰西各国堤工坡上种青草，不惮讲求，不惜巨费，盖草根最能护堤也。此处之堤，都不种草，一二处偶尔有草，为民芟除净尽，甚至连根拔起。据云系取以烧锅，或喂牲口，殊不知无草则堤难保，堤难保则水患不旋踵矣。愚民不思，其属可嗤。耙草之器，最能损堤，应悬厉禁，不准行用，此亦保堤之一道。盖草既拔去，堤复耙松，大风一起，堤土飞扬，堤顶遂逐渐而低，堤身亦逐渐而薄，此器为害，不亦大哉？沿河之堤，有种柳已成荫者，有初栽仅盈尺者。柳根最能固堤，应于沿河堤岸一律遍栽，设法保护，不准攀折。并行种藤，更为坚实，柳条藤条，俱可编埽，筑堤较秸料坚固远甚，且可随处就近取材，毋须更出资采买，一举两得，莫妙于此，何惮而不为之耶？

大堤。大堤系公家所修，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周，且多弯曲，殊不可解。现在此堤虽有如无，大不可恃。堤上居民鳞次栉比，全成村落，即取堤土以筑其居，致堤残缺不全。且过路之处，切与地平，竟成大口。堤上坡上，亦多种麦，颇能损堤。盛涨时民埝尚决，大堤未有不溃者也。该堤宽处，其顶尚有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然完整者绝少。闻杨史道口水决民埝竟能走溜入小清河，淹溺村落，贻害居民者，良以大堤旧口未修，使水有隙可乘耳，询诸河官，何以大堤之口不堵？据答百姓不愿，今若修大堤，则千余村之居民，必环起而攻等语。可见修大堤非特无益，且不洽舆情也。大堤之外，居民甚多，有数百十户成村者，有四五家自立门户者，或筑围堤自护，或建高阜而居，大抵皆预作防水之计。村外周围之地，颇属膏腴，居民即以之耕耘，以供饮啄。此外尚

有斜堤拦坝，皆以保此村田者也，然残废亦与大堤同。若民埝出险，不足恃也。

险工。沿河一带，险工最多。凡顶冲之处，或已决之处，皆有工程。其工程磨盘埽居，多以秸料覆土，层垒为之，形如磨盘，或紧贴于岸、或接连于堤，其形势纷歧不一，即高低厚薄，亦每埽不同，每埽错落参差，绝不相连，中仍走水，以使三面受敌，不知何意。鄙见数埽应一气呵成，不存罅隙，既省料工，更形坚固。且料埽入水，削如壁立，不作斜坡，适足以当冲，不能使水滑过，似非得法。至秸料亦非经久之物，因其中有心，质如灯草，最能吸水，使料易于腐烂，料烂则与沙土同。毫无劲力矣。监工曾见旧埽数处，虽形势相连，而根基已坏，一经盛涨，必即漂流，民埝定为所累，或云秸料为本地土产，用广价廉，舍此别无他料。诚能如监工前篇所言，多种藤柳，数年之后，便可足用，更毋须以巨万金钱造此不经久之事。或又云料埽原以挑水，一两年后，水已改道，料埽虽烂，亦复何虑。监工殊不谓然。若不改弦更张，恐抢险不过养疽耳。为今之计，虽无他料可用，其埽工应先行改式。傍岸者使之联成一片，作斜坡入水，以导其流，并须多用木桩，牵连于岸，以坚固麻绳系之，其护埽所抛之石，亦宜加粗加多，位置得法，方可御冲刷之力。监工曾见有以石块排于埽上者，镇压秸料，不使为风吹去，抑何可笑。此外尚有石堤，如北镇一带，尚称稳固，亦盐窝石堤，则已根底全虚，所未即坍圮者，赖尚有石灰粘凑，然亦不能久矣。

二、盐窝至海口尾闾情形

黄河尾闾，已由盐窝改道三次，首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今谨将三处情形次第言之，尚有新挑引河一条，亦并论及。铁门关海口此系大清河尾闾。黄河改道山东以来，由此入海，历三十余年，至韩家垣决口，舍东北而向正东。今铁门关一道，前半已淤垫甚高，河身成为平地，莫可辨识，左右两堤，尽成村落。铁门关以下，堤已尽矣，一派黄沙，地极瘠苦。约距铁门关下游八里，河形复见有水直通于海，河边之地，虽系沙滩，而沙下不深，便有混土。河中之水，平时深约二尺，大潮可涨至三四尺，可至萧神庙，若东北风大作，可增至五六尺不等，由三沟子起有船只可以出海，往来烟台。此次因河冻地潮，不能出海察勘，仅至三沟子以下十里，满地苇草，大潮所经，遂返辔不复前进。据土人言，往下八里，已见寻常潮汐，再往下十二里，便为海滨。海口有拦门沙，潮退时，仅深二尺。此沙共长宽若干，未曾复勘，揣度必不甚小。计自盐窝至铁门关海口约一百一十里。韩家垣海口，自韩家垣决口，黄河尾闾，取道于此，垂八九年，近复改道东南。韩家垣一带，已无黄河踪迹，惟自新萧神庙以下，距海约六十里之遥，复见河形，中亦有水，系最低之地，积水不消。闻距海约十一里，此河分为两溜，状如燕尾，然亦不深。海口亦有拦门沙，潮退时，直塞口门，不容河水泻出。此拦门沙露出水面，宽约二里。查韩家垣一道，并未筑堤。计自盐窝至韩家垣海口，约一百里。新挑引河，此河系于韩家垣决口之后，特于口门之下，挑挖一道，以便引水至萧神庙旧槽入海。然当时深仅四五尺，宽仅三丈，现在尚无此数。弯曲甚多，此河计长四十

里，若取直共有二十五里，大约系循原有水道挑挖节省工费之故。河底以萧神庙韩家垣两处，挖深三尺，便有泥土，亦有泥土竟见于地面者。周围各村，均有井，深一丈一尺，即可见水，泥在水中，不甚深也。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之窑。该处土质，概可想见。丝网口海口，现在黄河之由此口入海，漫散地上，并无河道。小水时分为多，溜底均不深，中有沙滩，正溜水底，深仅三四尺，有一两处最深，亦不过一丈。将近海口，则只有一尺四五寸，此处水面甚宽，约有三百丈之多。闻海口并无拦门沙，想系流缓溜浅，其沙已于地上停淤，无可再送入海也。查北岭子决口之时，尚有上游三处，同时开口，故丝网口水流不猛，北岭子门之树，至今犹竖水中，古庙一座，亦巍然独立，是其明验。若谓辛庄等处，房舍漂流，则系土屋不坚之故，非水力汹涌有以致之也。北岸于北岭子以下，并未设堤，惟以铁门关南堤为北岸，以护村落而已。南岸则由盐窝起新行接筑，一堤距水约远二里，计自盐窝至丝网口海口约九十里。

三、酌量应办治河事宜

治河如治病，必须先察其原。欲察其原，必须先按脉理，方知其病原之所在，然后施药。不特厥疾可疗，而且永无后患。若但按疮敷药，不问其毒发于何处，非良医之所为也。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若只就山东治黄河，何异于按疮敷药？虽可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作矣，盖其毒未消，其病根未拔也。夫水性犹人，初本善也，若不导之、教之，性乃迁矣。天之生水，原以养人，何尝以害人？乃人不知其性，不防其迁，遂使肆为暴虐，生民昏垫，国帑虚糜，终无底止。推原其故，良因治水仅就一隅，不筹全局。今若一误再误，恐徒劳无功耳。欲求一劳永逸、宜先就委窃原。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请详言之，溯黄河之源，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改道多次，始至山西，已挟沙而来矣，道出陕西，又与渭水汇流，其质更浊，再穿土山向东而出，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至披靡、水益浑矣。此即黄河之病原也。下游之病良由此，主治之宜在病原加意。盖下游停淤之沙，系从上游拖带而来。上游地高，势如建瓴，且两面有山约束之，水流极速，沙不能停，迨一过荥泽一派，平原水力遂杀，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河淤过高，水遂改道，此自然之理。证诸往事，已有明证。惟一河改道，万姓遭殃，转于沟壑，死于饥寒，从古迄今，不知凡几。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辟半径之路，于扬子江北中间千五百里扇形之地，任意穿越，虽齐鲁诸大峰，亦难阻制。河水所经之处，沙停滩结，民叹其鱼，防不胜防，迄无良策，补偏救弊，劳民伤财，其祸较疾病刀兵尤为猛烈。然天下无不治之水，虽非易事，尚非人力难施。其法维何？曰求诸算学而已。

治法，夫治法岂易言哉！黄河延袤中国境内，计一万余里之长。地势之高低，河流之屈曲，水性之缓急，含沙之多少，向未详细考究，并无图表。问诸水

滨，亦鲜有能答之者。今欲求治此河，有应行先办之事三：一、测量全河形势。凡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之浅深，均须详志；一、测绘河图，须纤悉不遗；一、分段派人查看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水性沙性，偶有变迁、必须详为记出，以资参考。以上三事，皆极精细，而最关紧要者，非此无以知河水之性，无以定应办之工，无以导河之流，无以容水之涨，无以防患之生也。此三事未办，所有工程，终难得当，即可稍纾目前，不旋踵而前功尽隳矣。若测绘既详，考究复审，全局在握，便可参酌应办工程，以垂久远，犹须各省黄河，统归一官节制，方能一律保护，永无后患，但照此办理，经费必巨。然欲使一劳永逸，宜先筹计每年养河之费若干，堵筑之费若干，蠲免粮钱若干，赈济抚恤若干，财产淹没若干，民命死亡若干，并除弊后能兴利若干，积若干年共计若干，较所费之资，孰轻孰重，孰损孰益，不至于犹豫矣。按照图志，可以知某处水性地势，定其河身。由河身，即可定水流之速率，不使变更；水面之高低，不使游移。凡河底之浅深，河岸之坚脆，工料之松固，均可相因，无意外之虑。此皆算学精微之理，不能以意为之。定河身最为难事。须知盛涨水高若干，其性若何，停沙于河底者几多，停沙于滩面者几多，涨之高低、速率不同。定河身须知各等速率，方能使无论高低之涨，其速率均足刷沙入海。河形弯曲，致生险工，亦须酌改，然大非易事，非详慎推算不为功。盖裁弯取直则路近，路近则低率，即地势高低之数增。低率增则速率亦增，速率增则过水之数亦增，于盛涨时尤宜并上下游通行筹算后，方可裁去一弯。盖裁弯能生他险，不可不虑，此亦非但凭眼力可为之事。

河堤所资以束水者也，须并河身一同推算。即入水斜坡，统须坚固，以御异常盛涨，方不致误事。至堤之高低、厚薄，则视土性之松实，料质之坚脆耳。至应如何造法，亦须视水线高低，水力缓急。所需材料，总以能御水挖为妙，不必尽用石堤，亦毋庸尽用料埽，盖土堤筑造坚实，护以柳树草片，亦足以御寻常水力。查各国护河之堤，多以土为之，并无全用石工者。但须推算合法，位置得宜，看守不懈，勿任践踏耳。其石堤料场，只于险处用之。总而言之，可省者宜省，不可省者必不宜省，然非测算精详不可。监工兹绘堤式两种，似与黄河合宜，何处应用何式，则俟临时查勘，因地制宜，非谓全河均应改用也。惟无论需用何种材料，均须采择上品者方能坚久。大水时河流至堤根，小水时河流在两岸之中。而堤与岸均系松土，常为急流挟之以去即化为沙，至流缓处，淤成高滩，积渐遂生危险。此固可虑，而尤可虑者，上游各土山随时坍塌入水，流至下游，为患甚烈。应行设法保护，于过水两岸，尽筑斜坡，先护以泥，再种草片，并多栽树木，以坚实之。有险之处，则宜于岸根打桩，以树枝编成筐，以泥土填成块，再叠石为墙，或砌石为坡，并抛大石块于水底，方足以御水力。其土山两旁，亦须抛石水底，再筑石墙于其上，以阻塌陷，如此则岸土不致为水拖带，河流可以渐清，河患自然日减。此系治河应办紧要之工程。

大溜应教常走河之中间，宜在何处设法，此时不能预定。大约须于弯处水底

多筑挑水坝，以导其流。挑水坝应用树枝，或用石块，则俟随时斟酌情形办理，惟秸料不能经久，且无劲力，则不可用。减水坝亦应讲求，以防异常盛涨，宜即设在堤边。应先测量地势，察勘情形，以河流之方向，定坝口之方向。此坝须以大石并塞门德土为之。坝后所挑之河，或已有之河，应筑坚堤约束，庶所过之水，不致以邻国为壑。此河亦须宽深不甚弯曲，且低于黄河，其河身实有容水之地，始能合用。

黄河尾闾海口高仰复有拦门沙，致河水入海未畅。应用机器挖土船以挑挖之，然先筑海塘，再用机器，或可事半功倍。此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益专，能将沙攻至海中深处，为海口必不可少之工程。再用机器于拦沙挖深一道，俾水力更激，可以自刷其余。此项工程，需费颇巨，然各国海口均有之，黄河何独不然？美国密西西比海口，奥国大牛白海口，前亦堵塞，今大轮船可以往来，是其明验。法国仙纳海口，前此亦有拦沙阻碍，行船最为险恶，旋经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面，两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二丈，至今船只称便。比国麦司海口，亦曾兴此大工。此外尚有多处，不胜枚举。

黄河延袤数省，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现时上游水至下游，不能即知。下游出险，上游事后方觉，声气不通，防范未能周密。应照永定河办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知全河官弁，俾患可预弭。此为刻不容缓之事。治河之工程，既已举行，守河之章程，亦宜厘定，俾一律恪遵，永远办理，方不致前功尽弃。查现在河防员弁，虽能克己奉公，而百姓践蹋堤埽挑土砍柳锄草诸恶习，并未广为禁止。应妥定律例，严行厉禁，周密巡查，犯者惩治。堤上不准搭盖房屋，如须行车，必专筑马路之处，格外培厚，方不至于损堤。官弁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即为修补。如此则工程可永远完固，不致生意外之虞。黄河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上游之山，应令栽种草木，以杀水势。泰西各国，因山水暴发，屡次为灾，饬令于源头及濒水诸山栽种草木，水势遂杀，偶有一二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即复猖狂，政府严行禁止，并设官专管树木。西人重视此事，是有效验之明证。查山水暴发，其故有二，一因山上土松，不能吸水；二因山势陡峭，无以阻水。若遍种树木，则树根既能坚土，又复吸水，且可杀其势，从容而下、不至倒泻。倘山上不宜种树，亦应种草，其功虽不及树木之大，亦终胜于无。法国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成效已大著矣。

四、现时应办救急事宜

前篇治河应办各事，既非旦夕之功。必俟全河详细测量，估计工料，妥筹办法。方臻美备。诚恐河流汹涌，迫不及持，亟应先办救急事宜。庶几现时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较易，救急之事维何？曰培修堤岸，固筑险工，并疏通尾闾而已。至于更改河形以畅其流，展缩河身以顺其性，保护堤岸以阻其倾，各工程应俟日后从容办理，此时无暇及此。

培修河堤之法，前篇已详言之，毋庸再赘。惟应以埝为堤。若大堤则相距太

远，有河面过宽之患，又复残缺不整，修无可修，即修亦无益。各处险工，宜全行固筑，应派员全工察勘，估计工程。凡当冲之堤，已朽之埽，务即一律保护，其过低过薄之堤，亦应加高培厚。堤内临水之坡，应加泥一层，以种青草，并于堤根遍栽树木，设法禁人践踏。此为最急之务，速办为妙。有险处之堤根，或抛石或编坝以固之，亦须因地制宜。凡堤有所开过路之道，应即行修补，并于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便车马往来，不至损碍。尾闾海道，最宜妥定，铁门关、韩家垣现均淤塞，丝网口则水势散漫，并无河槽。查此项尾闾，择地者主见不一：有谓铁门关淤塞处应挑通使水仍复旧道者；有谓宜仍由韩家垣旧道者；有谓应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盐窝险工者；有谓应由盐窝挑一直河仍由丝网口者；有谓应于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者；有谓黄河应于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之入海者。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之地，查徒骇河形颇弯曲，孔家庄河面约宽九十丈，小水水面约六十丈，两岸颇高，并未筑堤，大水约离岸尚低八尺，其上游于禹城以下，全已淤塞，海口约距孔家庄七十里，并无拦沙。鄙意黄河未治之先，其水不应走徒骇河，盖恐浊流入清，即使清者亦变为浊，未免可惜。如欲酌定一处，必须于各处详细测量，品地势之高低，察流水之方向。查现在武备学堂测量生颇具聪明，又复勤奋，四散测量，不遗余力，惜时日太促，未能详备，所绘之图，只能阅其大概，况各段河中过水之数，以及地之低率，无从查考。至引河河形，惟按海口之地甚平，引河以愈短愈直愈妙。盖河短势直，即低率亦增，流水较有力也。河身则以能容盛涨为度，两堤则以能束水为度，又须格外坚固，以防冲决。大约海口所有旧河槽，以不用为妙，以旧槽形皆曲折，堤亦不周备，不如另择新地酌量形势办理之为愈。今无论引河挑在何处，其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恃水自刷，因河病末除，河沙未减，到处停淤之病，仍不能免，恐新挑之河，不久亦如旧口为沙堵塞不通也。鄙意引河河形，以能容水畅流为度，庶无意外之虑。减水坝为必不可少之件，应设何处，尚未详考。有人指示济南府城下游十八里，原有滚坝之处，似可合用。监工于归途便道履勘，见此坝距黄河尚有五里，原造之意，系引济南诸山清水入黄，以助攻沙，然向未启用。坝门甚小，只有一丈四尺，又与诸河不通，若欲用之，尚须另挑引河以通小清河。查小清河河身，仅足自容，盛涨时水已漫岸，又无河堤约束，若再将黄河灌入，势必漫浸，即济南省城亦恐遭淹溺。鄙意如欲减水，以入徒骇河为宜，然仍须测量筹算方可定议，惟徒骇河亦须加宽添筑河堤，方可合用。

以上四大端，皆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有当，均候裁夺示遵。监工此番奉委勘河，常与司道大员及地方官合同查勘。虽各人看法稍异，而和衷共济，为国家宣劳，为中堂效命，以国计民生为怀，作一劳永逸之想，则不约而同。盖无分中外。咸欲赞成利国利民之大功，其胸中则毫无成见也。

卢法尔谨上。

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督李瀚章、谭钟麟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

贼纵横，萑苻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而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孟子曰："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扬汤止沸，托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节末路，乃为此坏道德损名誉之业以遗后人也。或曰：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夫淫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女闾；盗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山泊。此等义理，李鸿章未必不知之。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

鸿章莅粤，拟行警察法于省城，盖从黄遵宪之议也。业未竟而去。

粤中华洋杂处，良莠不齐。狡黠之徒，常藉入教为护符，以鱼肉乡里，而天主教及其他教会之牧师，常或袒庇而纵恣之。十年以来，大吏皆阘冗无能，老朽濒死，畏洋如虎，以故其焰益张。李鸿章到粤，教民尚欲逞故伎以相尝试。鸿章待其牧师等，一据正理，严明权限，不稍假借。经一二次后，无复敢以此行其奸者。噫嘻！以数十年老练之外交家，虽当大敌或不足，然此幺幺者，则诚不足以当其一嘘矣。今之地方官，以办教案为畏途者，其亦太可怜耳。

鸿章之来粤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云。鸿章乃捕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孥，骚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虽然，吾不敢为讳。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义和团之起
李鸿章之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薨逝
身后恤典

李鸿章最初之授江苏巡抚也，仅有虚名，不能到任；其最后之授直隶总督也，亦仅有虚名，不能到任。造化小儿，若故为作弄于其间者然。虽然，今昔之感，使人短气矣。鸿章莅粤未一年，而有义和团之事。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故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

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特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至六月以后，联军迫京师，于是李鸿章复拜议和全权大臣之命。

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阙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彼知单骑入都之或有意外，故迟迟其

行；彼知非破京城后则和议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数月不发。

两宫既狩，和议乃始。此次和议虽不如日本之艰险，而纠葛亦过之。鸿章此际，持以镇静，徐为磋磨，幸各国有厌乱之心，朝廷有悔祸之意，遂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定为和约十二款如下：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申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该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碑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念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于念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念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念九日、六月初三□月□□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确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二、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墓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合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甲）此四百五十兆系海关银两，照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零七九六，即俄国一卢布四一二。俄国卢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丙）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驻京诸国钦差领衔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戊）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改办一层如后，以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及杂费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亦应拨款相助。至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

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二、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裁明。三、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各省抚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尽由诸国派员兴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以养其工。一、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及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国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复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

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年月□□日由直隶省撤退。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均由诸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联军和约既定，尚有一事为李鸿章未了之债者，则俄人满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约》所订，俄人有自派兵队保护东方铁路之权。至是义和团起，两国疆埸之间有违言焉，俄人即藉端起衅，掠吉林、黑龙江之地，达于营口北。东方有联军之难，莫能问也。及和议开，俄人坚持此事归中俄两国另议，与都中事别为一谈。不得已许之。及列国和约定，然后满洲之问题起。李鸿章其为畏俄乎？为亲俄乎？抑别有不得已者乎？虽不可知，然其初议之约，实不啻以东三省全置俄国势力范围之下，昭昭然也。今录其文如下：

第一条　俄国交还满洲于中国，行政之事，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留兵保护满洲铁路，俟地方平静后，并本条约之枢要四条一概履行后，始可撤兵。

第三条　若有事变，俄国将此兵助中国镇压。

第四条　若中国铁路（注：疑指满洲铁路）未开通之间，中国不能驻兵于满洲。即他日或可驻兵，其数目亦须与俄国协定，且禁止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若地方大官处置各事，不得其宜，则须由俄国所请，将此官革职。满洲之巡察兵，须与俄国相商，定其人数，不得用外国人。

第六条　满洲、蒙古之陆军、海军，不得聘请外国人训练。

第七条　中国宜将旅顺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权抛弃之。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之铁路矿山及其他之利益，非得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为之，必亦须经俄国允许。牛庄以外之地，不得租借与他国。

第九条　俄国所有之军事费用，一切皆由中国支出。

第十条　若满洲铁路公司有何损害，须中国政府与该公司议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之物，中国宜为赔偿，或以全部利益，或以一部利益以为担保。

第十二条　许中国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以达北京。

此草约一布，南省疆吏士民，激昂殊甚，咸飞电阻止，或开演说会，联名抗争。而英、美、日各国，亦复腾其口舌，势将干涉。俄使不

得已，自允让步。经数月，然复改前约数事如下：

第一条　同

第二条　同

第三条　同

第四条　中国虽得置兵于满洲，其兵丁多寡，与俄国协议，俄国协定多少，中国不得反对。然仍不得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同

第六条　删

第七条　删

第八条　在满洲企图开矿山、修铁路及其他各等之利益者，中国非与俄国协议，则不许将此等利益许他国臣民为之。

第九条　同

第十条　同并追加“此乃驻扎北京之各国公使协议，而为各国所采用之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　同

第十二条　中国得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至直隶疆界之长城而止。

至是而李鸿章病且殆矣。鸿章以八十高年，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积劳，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喝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促画押云。卒之此约未定，今以付诸庆亲王王文韶。临终未尝口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翌日奉上谕：

朕钦奉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今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定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钦此。

其后复赏银五千两治丧。赏其子李经述以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以京堂候补，其余子孙，优赏有差。赐祭两坛。又命于原籍及立功省份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祠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而此一代风云人物，竟随北洋舰队、津防练勇，同长辞此世界、此国民。吾闻报之日，成一挽联云：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划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

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撂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嫱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

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三，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四，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Thiers），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士于议和后，能以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

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

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骋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倩。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见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人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雕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

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形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统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

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彼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男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忍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分怜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部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舍胜海舟外，殆未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纪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附录于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注：指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

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何如？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